

无耻的洋人

作者： 徐沛

德国科隆，2010年夏草，2012年夏定

由作者授权 [E书在线](#) 出品

目 录

自序.....	- 6 -
五毛与我	- 6 -
“无耻的洋人”与我.....	- 8 -
第一章 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对中国的赤化	- 11 -
与宋庆龄同行	- 12 -
从牛兰到左尔格.....	- 16 -
红色鼯鼠危害各国.....	- 20 -
来自德国的鼯鼠李德.....	- 21 -
沦为鼯鼠的“国母”	- 24 -
受共产国际操纵的红色文化战线.....	- 27 -
共产国际操纵的红色战线.....	- 32 -
扶持、吹捧和利用鲁迅.....	- 37 -
蹊跷的鲁迅之死.....	- 41 -
被宋庆龄告状	- 49 -
挨贺子珍打骂	- 53 -
红色恶果	- 60 -
第二章 王安娜和“七君子”的报应.....	- 65 -
国际共运的简况.....	- 66 -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	- 68 -
王炳南的活动	- 72 -
“七君子”的作为.....	- 75 -
为毛战斗过的王安娜.....	- 80 -
“七君子”的下场.....	- 86 -
第三章 毛泽东的洋鼓手斯诺及其他.....	- 93 -
共产党的根源	- 94 -
第三国际各国分部.....	- 95 -

二人工作队	- 98 -
红色谎言贻害无穷.....	- 103 -
自欺欺人的斯诺.....	- 108 -
两任妻子两种选择.....	- 113 -
第四章 毛妾江青的洋知己维特克	- 118 -
第二个斯诺	- 120 -
鲁迅、毛泽东的同类.....	- 125 -
“乒乓外交”的主角.....	- 129 -
《江青同志》的谬误.....	- 132 -
第五章 《天安门》的红色烙印	- 143 -
《天安门》与柴玲.....	- 145 -
抹黑柴玲扭曲史实.....	- 148 -
美化凶手掩盖罪恶.....	- 150 -
卡玛（Carma Hinton）的表弟阳和平（Fred Engst）	- 156 -
父亲韩丁（一九一二－二零零四）和曾祖母伏尼契（一八六四－一九六零）	- 159 -
中共专制的乱象：一对副部级待遇的洋奶农.....	- 164 -
第六章 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	- 169 -
斯诺的变种	- 171 -
商业教会的头目.....	- 172 -
卖身投靠中共	- 174 -
欺骗叶永烈炮制《江泽民传》	- 177 -
《江泽民传》的失败.....	- 180 -
洋吹鼓手的角色.....	- 185 -
中共媒体的宠儿.....	- 188 -
第七章 德国的五毛党.....	- 192 -
德国之声的“丹红门”	- 194 -
小骂大帮忙的花久志（Georg Blume）	- 197 -
被张丹红热捧	- 201 -
诋毁默克尔	- 204 -
投靠中共的黑伯勒（ Thomas Heberer 中文名王海，随其岳	

父姓)	- 206 -
配合中共不遗余力.....	- 208 -
与张丹红荣辱共存.....	- 211 -
貽笑大方的“中国通”弗兰克·泽林 (Frank Sieren 又译名 弗兰克·西仁)	- 214 -
支撑“丹红门”的洋五毛.....	- 215 -
响应新华社的召唤.....	- 219 -
背叛导师的桑德施奈德 (Eberhard Sandschneider) -	221
在德国之声的表现.....	- 221 -
中共高级统战人员.....	- 225 -
第八章 中共在德国的老朋友施密特.....	- 228 -
赞美与希特勒、斯大林齐名的罪魁祸首.....	- 229 -
与大陆名人的对话秀.....	- 234 -
被新华网删改和利用.....	- 239 -
粉饰“六四”屠杀讴歌元凶邓小平.....	- 243 -
与共产奴才沆瀣一气.....	- 248 -
象毛分子一样亲共仇美.....	- 253 -
第九章 与狼共舞的施罗德.....	- 260 -
德国五毛的唯一代表.....	- 261 -
与同党前辈施密特相比.....	- 264 -
与共党同辈李嘉廷相似.....	- 267 -
为强权和金钱折腰.....	- 272 -
与德国之声的女五毛唱和.....	- 275 -
聪明反被聪明误.....	- 279 -
第十章 鲁迅的洋徒弟顾彬.....	- 283 -
通过“丹红门”输入大陆的“垃圾论”	- 284 -
步鲁迅后尘	- 287 -
顾彬吹捧者	- 292 -
静观顾彬反思鲁迅.....	- 293 -
象鲁迅一样是共运的获利者.....	- 296 -

对洋鲁迅的反应.....	302 -
第十一章 与共党一起糟蹋奥运的萨马兰奇	311 -
来自西班牙的墙头草.....	313 -
从内部颠覆奥委会.....	316 -
背离奥运精神	318 -
与中共共同流合污.....	322 -
助中共入奥委会.....	324 -
互相利用的大小黑帮.....	326 -
萨马兰奇的罪责.....	331 -
第十二章 中了美人计的沙博理 (Sidney Shapiro)	336 -
美人计	336 -
笼中鸟	340 -
后记 身在夏天心系梅花.....	344 -
非我族类	345 -
中华儿女	347 -

自序

“洋人”作为新词最迟一百年前就出现在中国，因为在一九零六年出版发行的小说《恨海》中“洋人”就与“华人”并行使用，没有贬义，只是表明两者外表不同。

在英特耐特时代，出现了新词“五毛”，用以讽刺为了蝇头小利向中共当局出卖良知的小人。其实当中国人学唱“英特耐雄纳尔”时，就出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五毛。他们为了卢布而投身国际共产恐怖主义运动。

苏共垮台后，中共继续为非作歹。在海外各界奋起反抗中共的过程中，“五毛”与“五毛党”一起进入外语世界。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促使德国之声的“丹红门”曝光后，这两个中文词经我之口上了德国的《明镜》周刊。“洋五毛”作为新词也应运而生，因为五毛中有不少洋人。

五毛与我

在抵制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沦为中共之声的过程中，我亲身体会了共产党及其五毛党的无耻，他们可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二零零九年，中共借法兰克福书展大撒民脂民膏，在德国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掩盖六十年的共产暴政。为了抵制中共的宣传秀，用行动支持德国人权组织关注被中共

囚禁的大陆作家，我以艺术家严正学为榜样，扮演“红牢女囚”，第一次置身法兰克福书展，对五毛党有了进一步的切身体会。

从书展回来后，我批评的对象从正在为中共评功摆好的洋五毛扩展到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洋五毛。

中共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革命导师”，靠以俄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的支持，颠覆中华民国后，强行赤化老百姓，用马恩列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在大陆上了十五年学，被共产党借学校强行灌输的都是违背史实的红色宣传，比如，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小学课本里就有“地主的斗血淋淋的口”等抹黑地主的“革命文学”。反传统反道德的鲁迅则被毛泽东封为“新中国的圣人”，成为语文课本的重点。学生被迫背诵鲁迅的白话，接受他对中华文化的诬蔑。毛泽东死后，我才上初中，可英语课学的还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我上大学，入的是德语系，但即使是德语语法书，用的例句还是马列术语。好在无论共产党如何全面毁坏中华文化，监控大陆社会，生长在四九年前的中国人还是传统文化的活载体，他们的言传身教足以抵消共产党的那一套歪理邪说对我的毒害。即使我在学校学的是被中共改得面目全非的简化字，但吸引我的还是《西游记》和《红楼梦》，而不是毛选或鲁集。深得我心的是中华古文化，而非中共党文化。

“六四”屠杀促使我在德国留学时开始了写作生涯。二零零二年，我从大陆回来后，才开始上网。从此我不得不开始研读与鲁迅、毛泽东和马克思相关的红色宣传或曰五毛文学，因为我想支持中华精英比如黄金秋和申有连对鲁迅和马克思的批判。他们都因此遭受中共迫害，先后落入红牢……但中共企图用鲁、毛、马割断中国文化的血脉，让中国人都沦为马列子孙还是徒劳的。身为海外华人，我乐于支持大陆同胞争取人权民主，抵制共产暴政；身为中华文人，我乐于促使华人从思想上摒弃马列，回归中华。而五毛却试图掩盖共产党是个马列政党，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无关，是祸国殃民的邪党等等真相。

“无耻的洋人”与我

“无耻的洋人”专指为共产党混淆视听，欺骗世人的西方人。他们有的是共产国际间谍比如史沫特莱；有的是见利忘义的洋毛分子比如斯诺；有的是投机商比如库恩；有的与鲁迅气味相投比如顾彬。无论他们区别多大，共同点是都在为共产党涂脂抹粉，评功摆好，虽然他们的智商不低，足以获知共产党在世界各国造成的祸害与各个时期犯下的罪行。

七、八月是德国人的假期。二零零二年前，我也入乡随俗跟着度过了十三个游山玩水的暑假。可是上网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份闲情逸志。毫无疑问，这是我的中国心在起作

用。就是说，我在西方生活的时间虽然已比在四川长，但我没有西化，而是在西方才开始有意识地了解中华文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罪行。

马克思的原著我读过，但不用多读，我就知道他象鲁迅一样不能给人提供营养，而是危害健康。诗为心声，读几首马克思的诗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心怀仇恨的自大狂、失意者，与鲁迅是一丘之貉。“亲君子，远小人”是我遵循的古训。我不会自愿去读不能扩展胸襟，开阔视野的作品，无论作者是谁，名气多大。

汉字虽然遭到以鲁迅为首的五四狂人诋毁，中共破坏，但在海外让无数洋人惊叹万分。而我也是到了海外才学会读正体字，获知汉字是中华文华的根。汉字的全息性举世无双。我在海外的时间越长，越了解中华文化，越不能容忍一个马列政党一边剥夺大陆同胞的人权，糟蹋祖国的山河，一边强行代表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为文人，我只能奋笔疾书，把我在自由世界获知的各种真相输入电脑，比如共产国际如何派间谍潜入中华民国，伙同以鲁迅为首的文痞，滥用民国的自由误导爱国学生，把各个民族与共产国际的矛盾，转化为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挑起中日战争，然后趁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扩张势力，最后在大陆颠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共产党靠间谍、宣传和武力在中国大陆篡夺政权后，如何祸国殃民，在《无耻的洋人》中也有披露，但它的重点是以洋五毛为主线展示共产党颠覆民国，祸乱中华的史实和

不同时期产生的五毛言论及其文学。

西历2012年夏 德国科隆

第一章 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对中国的赤化

中共官方称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上个世纪史沫特莱不仅与斯诺和斯特朗一样上了红色邮票，而且因与朱德有不明不白的关系成为红色宣传片的男女主角；还有大陆作者把史沫特莱与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一起视为宋庆龄的洋秘书加以美化；这个世纪，史沫特莱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红色宣传片的配角，不仅当选中共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且还名列自称凤凰的中共海外电视台宣传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

这十人除史沫特莱、斯诺和斯特朗外，还有俄国人鲍罗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马海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人爱泼斯坦和德国人李德。但无论他们来自哪国，以什么为业，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操控，为共产党篡夺中国政权出过力，是共产党的走卒，而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中国人都遭受赤祸，即使身为共产党的功臣在红色中国也无不饱尝苦头，唯毛泽东例外。

在共产党的外国走卒中，史沫特莱尤其无耻。即使是凤凰台播出的红色宣传片也不得不承认，史沫特莱违背常理，在被强奸后，居然公开宣称她因此有了“性的觉醒和满足”。就是说，史沫特莱缺乏羞耻心，乐于被虐待，是个洋贱货。

她投入共产国际的怀抱不奇怪，因为共产党是恐怖组织，需要虐待的对象。

通过以史沫特莱为首的无耻之人，可以了解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和相关人员。

与宋庆龄同行

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姨妈是妓女；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亲是暴发户，母亲是大家闺秀，家境富裕。表面上，她们的区别很大，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都属反传统反道德的红色女性。

史沫特莱自己的婚姻破裂后，到纽约结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成为其情妇。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没有因为新欢而抛弃老妻。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们也都是红色恐怖主义的帮凶。

《史沫特莱的多重生活》的作者普莱斯在专文《史沫特莱，为谁的事业而奋斗？》中，讲述了自己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史沫特莱时，觉得她受到不公正对待，同情她，试图为她写传，帮她申冤。好在普莱斯有职业道德，面对各

种事实，比如苏共当局对史沫特莱作品的高度评价等等，她“愿意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普莱斯还发现，“虽然我知道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为共产国际和中国的苏维埃军事情报做出重大贡献，俄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承认她为他们做的秘密工作。”是啊，中共官方包括大陆学者都不承认史沫特莱是共特。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控违法，入狱六个月。虽然罪证确凿，她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普莱斯断定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成为欺骗高手”。

二十七、八岁时，史沫特莱随恰托移居欧洲共运的中心柏林。在那里她结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俄国人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是共党在德国的宣传员，曾于一九二五年以“帮助在饥饿中罢工的中国工人”等口号募得二十五万美元。后者的官方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马娄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议派史沫特莱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间谍网。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莱就到过莫斯科。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莱再次去苏联，并从那儿与一位小秘兼情夫进入中国。对此凤凰台的史沫特莱宣传片也有披露。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写作的英文自传《大地的女

儿》发表。从中可以断定史沫特莱与鲁迅一样都是属于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到纽约后，面对他人的财富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

一九三二年，这本宣扬仇恨、斗争与性解放的自传就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杨杏佛（杨铨）虽然认识到作者是个“完全未受宗教势力和道德观念熏陶的野女子”，但并不影响他给此书的中文译本写序，可见这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品位低下，难怪他会支持剥夺他人财产的共产主义，赞成视贞操如敝屣的女性主义。此书还由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另一名共产国际间谍尾崎秀实译成日文出版。

宋庆龄则在国民党清党剿共后，与曾代孙中山与俄共联络的陈友仁一起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苏俄，受到厚待。邓演达于十月抵达莫斯科后，他们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底，在南京政府因苏联支持在南昌等地的共产恐怖活动而与其断交时，他们又一起谴责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第一次相见并合作。

当时外界报道陈友仁与宋庆龄象蒋中正和宋美龄一样结婚。但史料证明陈友仁去了巴黎，而宋庆龄则于一九二八年五月追随邓演达（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到了柏林。据《最后的女皇》的作者帕库拉（Hannah Pakula）称，有人认为邓演达与宋庆龄相恋。试图以武力倒蒋的邓演达宁死不屈可能是宋庆龄全力支持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原因。史料显示宋、邓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邓演达有离婚的打算。

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资巨大、历时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道国葬。

应共产国际操纵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宋庆龄又发表对国民政府的谴责。宋庆龄宣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宋庆龄已堕落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庆龄的赤色宣言没有得到多大反响，于是，宋庆龄又离开中国，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夏宋庆龄才以奔母丧为由回到中国，从此投身于支持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这年十一月，共产国际乘“九·一八事变”让国民政府穷于应付之机，分裂中国，在江西成立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牛兰到左尔格

最迟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一直在“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共产国际于一九二八年春派以化名牛兰著称的红色间谍到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亚洲各国共党从牛兰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据杨奎松的相关论文透露，在一九三零年八月至下一年五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二点五万美元。

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共产国际的远东局就从海参崴移到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主要秘密设在上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才被迫迁往共产党割据的江西瑞金。

史沫特莱被派到中国后，以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定居。凤凰台说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宋庆龄的得力助手，还对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提供帮助，也提到左尔格是史沫特莱的情夫，但没有提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操纵，在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

一九二七年，在南昌搞暴动失败的周恩来奉命于十一月潜伏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九二八年，周恩来从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并化名伍豪从事非法活动，包括搞暗杀、安排共党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等。史沫特莱和周恩来都与一九三零年一月被派到上海的共产国际间谍左尔格有密切合作。

左尔格（一八九五－一九四四）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的祖伯父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组建第一共产国际。他自己则投身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共。一九二四年，左尔格投奔莫斯科后又加入苏共。一九二九年他就开始以德国记者身份在中国为莫斯科效劳。

美国独立中文媒体《黄花岗》季刊第二十二期发表曹维录的研究成果《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用确凿地史料论证，以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阻止了日本对苏作战，为保卫苏联和挽救中共挑起了日本与中华民国的战争。

在中共的暴政下，大陆媒体都受监控，作者多带着中共的思想枷锁在写作，但从他们的作品中还是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比如，杨国光名下的《周恩来秘会左尔格》等相关作品。杨国光虽然在传记《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二零零五年版）中声称左尔格是“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他透露的事实却只能证明，左尔格是中共的朋友。在史沫特莱和周恩来的协助下，截止一九三二年八月，左尔格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由国际组和中国组

构成的共产国际间谍网，有近百人，而且还向苏联保送了一批批青年学生去接受间谍培训。被周恩来介绍给左尔格的共产党员中有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双重亲家的张文秋（那时化名张一萍）。一九零三年出生的张文秋二十八岁时成为左尔格的助手，她与共产国际第四局负责人之一的吴照高假扮夫妻。

杨国光透露，左尔格在上海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五百九十七份急电，其中有三百三十五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共苏维埃政府及其红军。一九三二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筹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将他窃取的相关情报一一电告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左尔格把这一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使红军在国民党‘围剿’苏区前作好了准备”。杨国光引用前苏联国家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说，左尔格搞到的情报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开放的自由世界，上海等地都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既接纳躲避红祸的苏共占领区的居民，又接纳逃避德国纳粹的犹太人，还是国内外不安分守己者如鲁迅和斯诺的乐园。各国的共产党徒包括遭到本国共党开除的南非共产党人格拉斯也在上海找到用武之地。

共产国际则以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红色渗透。共产国际出资在中国出版过上千种宣传刊物，比如史沫特莱

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中文名为伊罗生的红色美国人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它们专门发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鲁迅等的作品。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国论坛》创刊后，伊罗生与史沫特莱一起于五月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专号，抹黑国民政府，大搞红色宣传。可是，《中国论坛》没有因此被封杀。倒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在“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专号上，因为伊罗生没有讴歌斯大林而被迫停职。从此伊罗生也象遭斯大林迫害的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一样被排斥。伊罗生带着红色情结离开中国。一九七四年，伊罗生还在美国出版四十年前由鲁迅和茅盾编选的红色宣传品《草鞋脚》。

不过伊罗生却证明，斯大林曾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演讲时表示，他企图把国民党“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及时奋起反抗，让斯大林的阴谋没有得逞。可惜宋庆龄却支持斯大林，反对国民党，好象吃了迷魂药。宋庆龄既然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就应该支持国民党在中国实现尊重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才对。而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不相容。这就是国民党要清党剿共的根本原因。

可惜宋庆龄却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象史沫特莱一样甘当共产国际间谍。

红色鼯鼠危害各国

宋庆龄身为孙中山的遗孀在中华民国位高名重，本来可以为在中国实现孙中山治国理念而奋斗。可是她却鬼迷心窍，沦为共产国际间谍，为共产党颠覆奉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发挥了无人能够替代的作用。

在戴季陶、蒋中正、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相继认清共产党的危害后，国民党不再是共产国际成员的保护伞，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势力也象在德国一样遭到毁灭性打击。

到了一九三一年剩下的地下共产党人也接二连三被国民政府抓获。曾在苏联接受间谍培训的顾顺章也是在这年四月被捕。据杨奎松说，顾顺章在被捕后招供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

顾顺章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负责过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特科红队”，暗杀过多人的，尤其是那些弃暗投明的共产党员。顾顺章招供后，五月，周恩来就亲自带领康生等人组成的红队将顾顺章家属、访客等多人全部杀害。如此红色恐怖活动自然不得人心。同年底，周恩来就不得不逃离上海，潜入共党在江西的占领区瑞金，与被时人称为“猪毛”的朱德和毛泽东会合，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顾顺章被捕两个月后，牛兰夫妇也落网。为了让牛兰夫妇不招供，帮他们逃脱惩罚，共产国际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援救运动。左尔格建议用美元贿赂有关人员。共产国际于是派出两名德共党员携带几万美元前往上海。其中一个就是后来以化名李德进入中共党史的奥托·布劳恩

（Otto Braun）。李德交了钱后，在上海为共产国际收集军事情报。

左尔格与日本共产党人尾崎秀实通过史沫特莱相识后成了搭档，在参与协助牛兰夫妇逃脱惩罚后怕暴露，于一九三二年被一起派往日本。

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共党占领区瑞金。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博古（秦邦宪）在征得莫斯科同意后，派共特把李德秘密护送到瑞金，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正是李德导致了被中共美化成“长征”的大溃退。

来自德国的鼯鼠李德

李德不仅在军事上是个庸才，在常人眼中还是下流痞子。史沫特莱乐于被强奸，敢于“在第一届中国苏维埃大会中和学生狂饮大醉后除了戴一顶红帽子外一丝不挂高唱国际

歌”（普莱斯），李德则一到瑞金就因性骚扰而出名。在骚扰了至少两名女性后，“党组织”强迫萧月华为共党献身，做了与她语言不同的“德国毛子”的性奴。萧月华比贺子珍惨，因为她们都沦为共匪头目泻欲的工具，但贺子珍不挨打。李德享受特权，有小灶可吃，可是给他生下一个孩子的萧月华却会因吃他一点东西而被拳脚相加。萧月华一直到李德把共军指挥得几乎被歼灭而失势才得以解脱。李德则转身去勾引有夫之妇李丽莲，并获得成功。一九三九年，李德被召回莫斯科。李丽莲便成为没有休书的弃妇，虽然她因李德而与欧阳山尊离婚。

李德十九岁就加入共产党，曾经为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并被捕。在被派到中国前至少有两个所谓的革命伴侣，其中一位曾组织红色恐怖分子把李德从柏林监狱里劫持出来。在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帮助下，两人逃离德国，潜入苏联。一九三一年，这对“革命伴侣”因李德有新欢而分手。

李德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后，受到严厉地审讯后被释放，但被告知不得泄露他在中国的七年半非法活动。一九五四年他被派到苏联的殖民地东德并负责翻译出版《列宁全集》的德文版。一九六一年，他还出任东德共产作协第一书记。苏共和中共论战时，他象德共一样站在苏共一边痛斥中共。一九六九年，苏共和中共在边境上开战时，李德在东德的周报《地平线》上发表文章《从上海到延安》，透露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后参与的“革命活动”，包括“长征”，矛头直指毛泽东。他明确写到，“这些记录对我来说就是

武器”，“用以揭露毛分子对历史的篡改和与毛主义作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去世前一年，李德发表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讲述他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从事的七年半颠覆活动，进一步批判毛主义。不过，李德的回忆录也象所有共产党员的回忆录一样文过饰非，只讲允许讲的。他敢讲他在民国的红色岁月，但对他在莫斯科的经历却缄口不言。李德对中共的各方面情况缺乏了解，出现的错误可以原谅，但他对共产邪恶主义毫无反省，也不反省自己的过错，比如对萧月华只字不提。不过李德却提到象江青一样从事过红色文艺活动的李丽莲。李丽莲被李德说成是想和他一起去莫斯科的中国妻子。洋五毛沙博里为马海德立的红色传记《一个美国大夫在中国史诗般的经历》中透露马海德帮李德与李丽莲传递情书和解决同居处。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当他找上李德的窑洞时，李德还用手枪威胁他，如果不是马海德劝阻，李德“无疑是会开枪的”。

李德在回忆录中透露是后来护送过斯诺的“王牧师”送他到达中央苏区。这位王牧师是董健吾的化名。董健吾的女儿董霞飞说，董健吾在他的同学浦化人的邀约下，以牧师身份赤化过冯玉祥的部队。“当时，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担任该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浦化人也是背叛基督的假牧师。经他俩介绍，董健吾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他曾以牧师的名义借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彼德教堂从事非法活动，甚至参与暗杀。大陆出版的《红色牧师—董健吾》称他是“宋

庆龄的联络员”和“潘汉年的得力助手”。他像无数共产党人一样，没有受到敌人的惩罚，却在红色中国，“含冤辞世”。《李德〈中国纪事〉史事考订》一文称董健吾甚至将李德也化装成一个牧师，胸前挂一个银质十字架。

沦为鼯鼠的“国母”

以记者名义在民国从事非法活动的爱泼斯坦则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宋庆龄传中证实：“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爱泼斯坦还介绍说，“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由专以保护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在宋庆龄年谱中，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夏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庆龄在地下工作中训练有素，因此，宋庆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接受过秘密培训。毕竟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已经被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秘密档案证实。

共产国际由宋庆龄出面从瑞士请来红色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共产国际的另一名中国成员陈翰笙在宋庆龄与瑞士律师之间传递信函。宋庆龄在史沫特莱等的协助下，一边为象她们一样从事违法活动而被捕的共产国际鼯鼠奔走，一边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宋庆龄再次以孙中山遗孀的名义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诬蔑国民党。这份声明与她在 一九二七年《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和上面提到的她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对国民党的谴责就足以证明宋庆龄完全沦为共产国际的传声筒。而这些声明也都由史沫特莱等红色记者向各界传播。

宋庆龄深知中共的一切活动都由共产国际资助，但她却公开诬蔑，“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国民政府象英、美、日、德等国政府一样反共，是在抵制共产国际赤化本国，不让本国人民沦为马列子孙，但宋庆龄却象鲁迅一样混淆是非，兜售来自苏联的红色宣传，抵制国民政府的正当行为。

对此杨天石在相关著述中有详实介绍，他还引用了蒋中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说明宋庆龄的行径：“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

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撓吾怀也。”

于是，共产国际为了与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门唱对台戏专门于一九三二年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员发展到三十一人，其中自然有鲁迅。宋庆龄为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史沫特莱为英文秘书。史沫特莱便以此名义联络国内外的红色势力包括反对暴力革命的萧伯纳等国际名人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欺骗民众。被捕的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丁玲等都因此被释放并潜入苏区。

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拒不认罪，一九三二年被判无期徒刑。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宋庆龄、杨杏佛和沈钧儒特意到南京狱中探望牛兰夫妇。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近卫文麿出任日本宰相，尾崎秀实成为他的顾问兼私人秘书，而一个月后就相继发生“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中日关系象共产国际希望的那样恶化后，宋庆龄们借机促使相关部门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牛兰夫妇，让这对共产国际间谍回到苏联，继续助共为虐。

放牛归苏不过是史沫特莱、宋庆龄等共产国际间谍滥用中华民国的自由盗取的红色成果之一！

受共产国际操纵的红色文化战线

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特委”后，又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成立领导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是潘汉年。中共媒体称潘汉年是“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他的统战对象。潘汉年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

在这些由红色代理人领衔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无数共产国际组织中，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最为出名。“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一共十二个人，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共产党员。夏衍还在自传《懒寻旧梦录》中称赞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并呼吁，在谈到“左联”历史时，“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一九二一年就加入共党的茅盾在“左联”成立后，从日本回来出任行政书记，创办《北斗》，并于一九三三年响应共党号召，发表《子夜》，用小说鼓吹阶级斗争。

一九一八年，鲁迅在钱玄同的鼓动下，开始为“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落脚点《新青年》撰稿，从此开始发出“听

将令”的“呐喊”，诋毁中国文化，主张废除汉字。

在大陆每个学生都学过的《纪念刘和珍君》也算“听将领”的产物。中共在苏共的扶持下成立后，一直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搞赤化活动。“五卅运动”（一九二五）、“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一九四八）等无一不是共产党操纵的名为爱国的整人运动。一九二六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发起所谓爱国大游行，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居然企图解除卫兵的武装，导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刘和珍等人的惨死。刘和珍们可以算共产党的第一批牺牲品。

在惨案发生后的十二天内，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的邵飘萍在他主持的《京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报道，歪曲事实，制造舆论。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纪念刘和珍君》只是其中之一。“六不总理”段祺瑞被诬蔑成“民族的罪人”，被迫引咎辞职，自愿终身食素。《中国历史上的捧人与杀人》的作者张耀杰认为，“段政府的垮台其实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并不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彻底垮台”。

无论如何，最迟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就可算作共产国际的笔杆子。后来以笔名鲁特·维尔纳（一九零七 - 二零零一）在东德发表回忆录（中译本名《谍海忆旧》）的左尔格女助手透露，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五年她在中国从事地下活动时，联系人中有鲁迅。

鲁迅在他的日记中称这位十九岁加入共产党的德国女间谍为“汉堡嘉夫人”，因为她当时的革命伴侣姓Hamburg。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八百五十页（一九八一年版）上的注释称位于静安寺路的“瀛环书店是汉堡嘉夫人办的西文书店”。维尔纳没开过书店，鲁迅提到的这家书店可能是与她有联系的一个红色书店。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鲁迅在红色刊物《北斗》上发表《我们不再受骗了》，强词夺理地为苏联辩护，此文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

鲁迅被时人称为“文妖”，一点不错，因为文妖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以言惑众。鲁迅一边撰文表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边辱骂不休。这次，在他声称“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时候却在骗人骗己。鲁迅在此文中针对有关苏联的真相，比如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等逐一驳斥。鲁迅断言，“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的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鲁迅无视事实，一再撰文为苏联辩护，是否是为了卢布，暂且不谈，但史料显示，鲁迅兜售斯大林的宣传，也受到共产势力的扶持和吹捧。民国女作家苏雪林在其专著《我看鲁迅》中也表示，鲁迅与共匪互相利用。

鲁迅对苏联及其文学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败类，因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比如徐志摩不会相信和兜售苏联的宣传。鲁迅的方向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反传统的共产党文化的方向。这也是鲁迅诋毁梅兰芳等传统艺人的原

因。

以鲁迅为首的红色笔杆子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各种笔名搞红色宣传，还给其他刊物比如《申报》副刊等投稿，影响舆论。

继“左联”后，共党还于一九三零年八月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组长的电影组。夏衍是一九二七年入共的地下党员。

被鲁迅在病逝前两个月指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不仅是地下党员，还是“文委”成员。后三者是导演红色话剧，拍摄红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们误导的观众不知有多少。

田汉以爱国的名义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挑起和渲染对日本的仇恨，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华民国的矛盾。这首红歌借助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中国，对共党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转嫁矛盾，掩盖真相，为共党摆脱当时的危机起了难以估计的误导作用。

共产国际一边在中国边远地区搞武装斗争，一边在心脏地带搞文化斗争，因此，夏衍有“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的提法。岂知夏衍们让共产党起死回生的“左翼十年”则是他们遭受生不如死的“文革十年”的前因。当年“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和参与者，都被打成了“黑帮”。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四条汉子”先成为红色中国文艺界的领导，领导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迫害行动，比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后，害人者自己先后沦为受害人，他们都失去在中华民国享有的自由并遭到残酷迫害。夏衍、周扬和阳翰笙分别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汉则在迫害中死去。夏衍出狱时“双腿折一，两目近盲”。而潘汉年一九五五年就被打成“内奸”，因被潘汉年牵连而遭受迫害的人数超过“胡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夫妇在迫害二十二年后先后含冤去世。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些跟随他们的红色艺人比如赵丹（一九一五—一九八零）同样不得好报。赵丹一九三二年加入“左翼剧联”，成为红星。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赵丹与叶露茜，蓝苹（即江青）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集体结婚，沈钧儒专程去杭州做他们的证婚人。鉴于他们都是接受共党领导的红色艺人，这个婚礼应该象一九三零年由史沫特莱出面举办的鲁迅五十岁生日活动一样，是个由共党组织的红色宣传秀！

一九六七年底，赵丹等十八名三十年代在上海参与过红色文艺演出的蓝苹同事全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

黑线代表人物”，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迫害。赵丹留下两大捆被他的第二任妻子黄宗英称为“在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材料。赵丹饱尝“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共产党的苦头。赵丹曾因其赤化活动在新疆被盛世才投入监狱五年，后被混迹国民党将领中的红色鼯鼠张治中释放。在“旧社会”坐牢没让赵丹留下伤痕，但在“新中国”坐牢后，赵丹满身伤痕，包括两只耳朵。

赵丹加入“左翼剧联”后，在“旧社会”拍了至少三十二部电影，但在他为之奋斗过的“新中国”，他演主角的《武训传》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被枪毙的影片，从此，赵丹失去演戏的自由，饱尝作践自己的痛苦。

共产国际操纵的红色战线

共产国际不仅渗透了文艺界，科研部门也一样遭到渗透。上面提到的陈翰笙也是史沫特莱到中国后有直接联系的另一只鼯鼠。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从此共产国际通过陈翰笙掌握了这个研究所。陈翰笙以请史沫特莱搞社会调查为名，抹黑中华民国的现状，为受到惩罚的共产党猿鸣冤叫屈。一九三三年，陈翰笙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红色

报告和论文，在理论上配合共党进行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社会根基的“土地革命”。

马克思的歪理邪说也在三十年代前期，被地下党徒大量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发行。郭沫若则在一九三零年就写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哈哈镜扭曲中国历史的红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邹韬奋原本是黄炎培创办的《生活》周刊的主编，在红色鼯鼠们的影响下，谈论个人修养、职业道路的《生活》周刊变成了赤化青少年的红色刊物。一九三二年七月，邹韬奋又出面创办了生活书店，出版大量红色书籍，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文化阵地之一，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

这与内山书店的情形大同小异。一九一七年，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开办一家书店。鲁迅从一九二七年迁居上海后，就在书店结识内山完造。从一九三二年内山书店就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内山完造与内山书店》一文透露，内山书店供应三百三十种红色读物。一九三五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东京也开了一家书店，专门出售鲁迅的著作和其他红色毒物。内山书店现在还在日本东京存在，门楣横匾由郭沫若题写。

时人对鲁迅和内山完造（一八八五—一九五九）的质疑在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中有反映，其中包括《内山书店与左联》一文，文中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

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郭沫若等“左联”成员“亦以内山书店为唯一避难所”，“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对此论文《鲁迅与内山完造友谊质疑》的作者孙乃修认为，鲁迅对时人的披露“半承认半掩饰”，“避而不谈自己多次逃入内山家和内山书店以求庇护，不谈内山为他传递各种机密消息”。孙乃修论证，“内山完造是鲁迅的靠山和保护人”。

一九三五年，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大溃退后被捕并伏法。曾把瞿秋白的文章以他的名义发表的“鲁迅由不愿参与出版瞿氏纪念集到积极参与出版瞿氏译稿，而且由日本出版、由内山操办”。这一切都证明，内山是有特殊任务的书商。当时的日本政府反共，雇佣的侦探不可能有助于共产党的事业。而中共媒体承认，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共作了很多事。内山完造不仅是鲁迅的靠山，还救援过郭沫若、陶行知、周建人、许广平等。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对鲁迅的态度与共产国际一致。

从中共后来与内山完造的关系和对他的态度就可以断定，内山完造是共产党的走卒。一九五零年，内山完造参与创办“日中友好协会”；一九五二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相互承认；一九五四年参加接待红色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一九五九年内山完造被中共邀请参加“国庆大典”后，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宋庆龄陵园。一九八零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中共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场所。所以，内山完造一家应该象尾崎秀实兄弟一样是日本共产党人。他们借日本

人的特权在中国从事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华民国的非法活动。

邹韬奋与内山完造一样都可以算共党在出版界的代理人。宋庆龄、史沫特莱和鲁迅则分别算共产国际在政界、新闻界和文坛中的代言人。红色鼯鼠遍布中华民国的各界，连我这样的研究者有时都会被搞糊涂，更别说那些还不知共匪为何物的民国公民。同时代的人中，谁能想到或相信“国父的遗孀”是共产国际间谍，谁又能想象蒋中正的心腹张治中会听命于共产国际，挑起“七·七事变”？共特滥用亲情，暗中为共党卖命，破坏人们的信任和社会的和谐，却诬蔑国民政府被迫采取的反共措施包括设立的反共机构。

总之，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各国鼯鼠利用中国的各种自由大搞红色宣传，成功渗透社会各界，包括各国在华势力范围。在日本被赤化的王学文一九二八年被派回上海。一九三零年，王学文在培养日本“中国通”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开办政治经济学讲座。曾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的王学文趁机为共产国际间谍网发展日本成员。杨国光透露，“精通日语的王学文通过讲座对日本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革命道路”。王学文还组建了一个秘密的“日中斗争同盟”，在日本士兵和侨民中开展活动。为首的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杨国光说，中共高层特殊部门的档案中记载：“中西功，一九三一年四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五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西里龙夫则是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共的。他

们入团入党后被王学文发展为中共特科成员”。

从夏衍发表的《“左联”成立前后》一文中可以获知，一九三零年五月召开的“左联”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是在尾崎秀实为他们提供的日本俱乐部秘密举行的。

红色鼯鼠在中华民国可谓畅通无阻，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反共机构侦破左尔格在日本的间谍网后，才在中国的日本势力范围内破获“中共谍报团案”，抓捕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向莫斯科出卖本国利益的各国红色鼯鼠，数目超过三百。日本《时事画报》的创办人西园寺公一被捕，但内山书店的老板却漏网。

莫斯科很快获知以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网被破获，然而斯大林否认他们为苏联效力，反而说这是一起“反苏阴谋”。一九四二年九月，斯大林以“德国间谍”之名逮捕左尔格的第二任妻子俄国人卡嘉·马克西莫娃并判处五年徒刑，第二年六月，曾是左尔格俄语老师的马克西莫娃死于西伯利亚，终年三十八岁。

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经过三年调查，才在“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纪念日把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以向苏联提供军事机密之罪，绳之以法。

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在看了西方拍摄的《左尔格博士，您是谁》后，才为左尔格“平反”，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一九七六年，东德为这位可悲的“苏联英雄”出了

一枚邮票。中共媒体则把左尔格吹捧成“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

扶持、吹捧和利用鲁迅

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就与鲁迅取得联系。鲁迅与母亲、原配本来住在北京，因与学生许广平的奸情，于一九二七年起定居上海。

鲁迅在上海与内山完造和冯雪峰等中外红色卧底关系密切。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冯雪峰也象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一样遭到迫害。冯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交代”材料中，为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红色劣迹，提供了如下佐证：

“从三零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三零年时，我好象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

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鲁迅五十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冯雪峰也证实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红色间谍积极宣传鲁迅，传播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的作品。共党利用鲁迅从思想上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道德反人性的共产主义开辟通道，打下根基。因此，“欺骗高手”史沫特莱会宣称：“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零年前后，鲁迅参与翻译共产国际在民国推出的“科

学的艺术论丛书”，其中包括“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艺政策”，对此梁实秋当时评论说，“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译者并未述明他自己对于这个‘文艺政策’的态度，我们也无须加以推测，但是我们若对这书的内容稍加思索，便可发现目前中国所谓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颇多与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国目前的‘普罗作家’‘左翼作家’是与俄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怕还是一般人把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当作文艺的圣旨，从而发挥赞扬罢？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作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中国，未必是有益罢？并且以鲁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译笔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罢？”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党内讧，借刀杀了“左联”的五位成员后，史沫特莱将鲁迅所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发表，误导和欺骗了不少读者。被鲁迅们吹捧的“左联五烈士”实为鼓吹暴力的劣士。对此《黄花岗》季刊主编高尔品（辛灏年）有专文论述《所谓左联五烈士》。辛先生为了抗议六四屠杀，辞去一切职务和头衔；九十年代中期，为了不写假话，论证《谁是新中国》，流亡美国。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莱到苏联十个月，这期间她将新旧宣传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象鲁迅一样“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目的就是误导读者投入共产恐怖主义运动。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莱经美国重回中国，在鲁迅家里寄居一年。

鲁迅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归。”

史沫特莱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的红色刊物《文学》月刊上发表《追念鲁迅》，描述了鲁迅的五十岁寿辰，情况与鲁迅的自述区别很大。鉴于《鲁迅日记》也没透露多少与许广平的奸情就足以知道鲁迅的日记并非真实生活的记录，所以，史沫特莱的回忆可能夸张，但比较翔实。因为，冯雪峰佐证了“左联”由史沫特莱出面借鲁迅生日搞红色聚会。鲁迅不必从下午聚会开始就到场。史沫特莱称生日活动人数不下两百人，可能夸大，但她的描述证明这个活动如冯雪峰所说不仅仅只是给鲁迅祝寿。史沫特莱还说那是她第一次会见鲁迅，但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可以确认是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吹捧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虽然鲁迅是个赞颂苏共“把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像粪一般抛掉”的“小人之尤”（苏雪林语）！。因为史沫特莱自己缺乏教养，所以，鲁迅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毕竟人以群分，鲁迅象史沫特莱一样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人品和作品都缺乏诚信和善心。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在另一红色刊物《中流》半月刊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莱，“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而帮助鲁迅刊印珂勒惠支版画的则是上面提到的另一名共产国际女间谍维尔纳。

无论是《追念鲁迅》，还是《死》都透露，鲁迅与史沫特莱互相唱和，一起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思想通道。《死》发表一个月后，鲁迅病逝。

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承认，他与领导“救国会”的沈钧儒们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共产国际的阴谋是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鲁迅的葬礼被共产势力借用来向国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国”，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自己承认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居然被共产国际成员哄抬成中国的“民族魂”。

蹊跷的鲁迅之死

鲁迅死后，家属一直怀疑死因，因此，至今存在“鲁迅之死疑案”。鲁迅的独子周海婴还以此为题于二零零六年九月撰写专文质疑日医须滕。文中透露：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滕的称呼）看下去的’”。冯雪峰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就是说，那时鲁迅看病请谁，由共产党负责，而须滕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的。周海婴象许广平和周建人一样怀疑须滕，“這個態度不僅從來沒有改變，而且我們從來也沒有放棄探查求證。我們還通過組織向中央匯報過，並請求中央幫助查證。沒想到這種觀點有一天忽然被上綱為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國際問題’”。一九八四年，大陆学术界首次有人發表《魯迅之死謎釋》，日本魯研界也很快有了反應，但作者紀維周却因此“無端遭受種種責難，並被迫公開檢討”。这表明，中共不仅不帮助解疑，还阻止真相大白。与此同时，中共专门組織了有九個醫院二十三名專家參加的“魯迅先生胸部X線讀片和臨床討論會”，得出了一个与須藤診斷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可惜这未能解答周海婴的疑问，所以，他在文章末尾表示“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鲁迅于十月十九日凌晨过世后，日文《上海日报》晚报第二天就发表了《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此后又在十一月十五日报出的中文红色刊物《作家》杂志发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日本研究者北冈正子指出，两篇文章内

容不同。第二篇文章不仅吹捧鲁迅，而且还透露说，“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足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须藤身为医生在病人辞世后有如此举动和谈及上述对话偶然吗？

内山完造则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鲁迅先生》，二十年后发表《忆鲁迅先生》，从中可获知，鲁迅的绝笔是致内山完造的短信，内山被称为“老板”，鲁迅请他打电话给须藤。须藤的文章在鲁迅死后一年被收录在中共地下组织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出版《外国友人忆鲁迅》，作者除了须藤、内山完造外，就是已证实的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和象斯诺一样的红色奴才。

为二零零零年出版的《周海婴回忆录》作序的王元化，一九三二年上初一时，就有老师在学校教他们学鲁迅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果然他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并于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加入共党。在中共夺取政权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遭受二十四年迫害。“平反”后，于一九八三年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两年后离休。对周海婴的怀疑，王元化表示，“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

究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就发现“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而如果共产国际需要鲁迅死，鲁迅自然活不了。

鲁迅病逝当天，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就到中央研究院，告诉蔡元培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他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同一天，上海《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 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荪、周建人、周作人。

负责鲁迅丧仪的冯雪峰私自把这个名单删改为含毛泽东的名单，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上发表。内山完造与史沫特莱都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虽然其时史沫特莱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蒋中正中计。

独具慧眼的巾帼英雄苏雪林“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莠为薰者，乃勃然不能复忍”，挺身而出专门写信给蔡元培，用证据指出“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并质问蔡元培“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

她还洞彻到，“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

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薪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醵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视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治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苏雪林深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

可惜蔡元培没有如此见识，沦为共党的马前卒，甘愿被共党利用来宣传鲁迅。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就已经编定。在蔡元培和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共特邵力子的支持下，于第二年六月出版。蔡元培不仅为《鲁迅全集》作序，还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宣称：“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

而梁实秋则发现《鲁迅全集》“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善良的梁实秋不知共产党的阴险狡

诈，不知共产国际这么做就是要借民国的出版自由，以鲁迅的名义兜售红色宣传，赤化民国青少年。没有王元化们上当受骗和浴血奋战，共产党何以能颠覆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

当时苏雪林还把上述意见写信告诉她尊敬的胡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毕竟胡适既是名人，又被共党视为敌人，遭到诋毁。比如，一九三三年三月，鲁迅在他名下发表瞿秋白对胡适的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诬蔑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可惜胡适没有苏雪林的高明和深刻。他不但不声援，还回信批评苏雪林的义正词严是“旧文字的恶腔调”。胡适象鲁迅一样反孔反传统，与鲁迅一右一左，不可能起到抵制共产邪恶主义的作用。共产党篡夺政权后，胡适五十年代在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作序时，自己承认，“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就这样，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硬是把一个民族败类包装成了“民族魂”，毒害了无数象王元化一样的热血青年，让他们为共产党卖命，让中国落入共党的魔掌，自己则失去在民国已拥有的自由。共产国际间谍都是鲁迅的推手，因为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被他们当成“反法西斯‘地下火’”。这在徐秀慧的红色论文《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1925—1949）——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与台湾光复初期“鲁迅战斗精神”的再现》中可以找到证据。共产国际打着反法西斯的口号，迷惑世人，掩盖共产党比法西斯更邪恶的本质。

尾崎秀实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活动时也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大陆出版的《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一书则透露，五名主张暴力革命的“左联”成员被自己人借刀杀害后，“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就把《阿Q正传》的出版，与悼念死难烈士，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结合起来。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编排的《阿Q正传》的日译本、书名是《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除收入《阿Q正传》外，还收入中国左翼作家的其他小说，左联烈士小传……尾崎秀实的序文赞扬了左联五烈士的光辉业绩和作品成就，对鲁迅极为推崇”。因此，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把尾崎秀实、山上正义和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

被鲁迅诬蔑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的梁实秋随国民政

府撤退到台湾后写过《关于鲁迅》。即使中华民国已被共产国际靠间谍、笔杆子和枪杆子赶到台湾，梁实秋还在文章中反对国民政府禁止鲁迅。不过梁实秋认识到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就是说鲁迅因为“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失去了知识人的独立性，沦为共产党的马前卒。

所以，鲁迅死后，到中国后就积极配合共产国际搞宣传的斯诺名下的悼联为：“译著尚未成功，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下联：“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他还在英文的红色刊物《民主》上发表《向鲁迅致敬》（《外国友人忆鲁迅》）。斯诺声称鲁迅“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自从我来到中国，七年中从未感到一个中国人的死，像鲁迅那样真正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从《胡乔木书信集》中却可以获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带去壮大声势的。当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当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只是这些误人子弟的地下党员之一。斯诺还把章乃器当作上海有名的金融家加以引用，表示章乃器认为，“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替被压迫者说话，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写作并不是为了泻私愤，也不是为了使有闲的人们欣赏，他只是写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整个世界都在哀悼鲁迅，在他的墓前，来自各国的人民一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一和中国的民众聚集在一起，鲁迅的精神将永存”不过斯诺也证明，“哀悼鲁迅具有双重的意义，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动。每本杂志，每份报纸都开辟专栏公开赞美鲁

迅”。仅此可见共党的渗透和宣传何其厉害。

鲁迅活着与死后都为共产国际制造舆论，颠倒黑白，误导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堪称共产党的头号中文笔杆子，深得与他“心灵相通”的毛泽东的赞赏。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鲁迅吹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宣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共有两支军队，一支由“朱总司令”指挥，一支由“鲁总司令”指挥，缺一不可。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只不过毛泽东没有提他们的靠山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滥用中华民国的迁徙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自由渗透了社会各界。共产国际渗透和炒作的结果就是在打造了“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后，又把邹韬奋、沈钧儒和章乃器等共产走卒包装成“七君子”，目的都是颠倒黑白，迷惑世人。与此同时，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变”也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被宋庆龄告状

史沫特莱在上海还接触和掩护过从苏区到上海治病养伤的共匪头目。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莱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写作

《中国红军在前进》，美化共匪。刘小莉在论文《〈中国红军在前进〉——回应“左联”前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焦虑》中说，“史沫特莱在《中国红军在前进》中所记叙的中央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并非是坚守新闻报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有血有肉的记录’，而是抹除了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灾难性后果，创造了‘红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这部作品不仅在实际上成为王明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而且为江西苏区的‘左’祸提供了佐证。”

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宋庆龄介绍给张学良当副官的共产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了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温泉招待所，在蒋中正来到前，搬进西京招待所。

王安娜的回忆录《我为毛战斗过》里面有一章专门写史沫特莱。从中可以获知王安娜与史沫特莱都为“西安事变”做过统战和宣传工作。回忆录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之中——其中只有少数人曾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见过面——对她的评价很差，特别是对她的性格大加抨击。在那些传教士眼里，她简直成了魔鬼的化身。一九三六年秋，艾格妮丝到西安休养，直到十二月还住在临潼的硫磺温泉，因而那些传教士认为她有策动革命之嫌。也许他们甚至认定，整个西安事变是她组织的呢”。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实例，就凭此王安娜就该算接受共党领导的“红色娘子军”。她象维尔纳一样先在中国当红色间谍，后回德国当红色笔杆子。而维尔纳对史沫特莱也有记载，其中说到“史沫特莱在这里（指上海）生活得并不轻松。欧洲人拒绝跟她来往，因为艾格妮丝彻底伤害了他们。”

史沫特莱就如此“偶然”地成为共产国际策划多时的“西安事变”的参与者。周恩来到西安后，很快与史沫特莱取得联系并安排她搞红色广播。

史沫特莱在完成了“西安事变”的宣传任务后，得到去延安的邀请。岂知她却促使宋庆龄留下了一封把她们俩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密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庆龄从上海写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潜入延安的史沫特莱的密状。此信证明这三人都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封告状信已于七十年后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卷发表。

这封信透露了宋庆龄滥用其身份，秘密违反家规国法，象史沫特莱一样为共产国际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莱不是宋庆龄的洋秘书，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庆龄的秘函。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并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

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正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王全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

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答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宋子文与宋美龄最迟在“西安事变”之后就从周恩来处获知他们的姐姐秘通共匪，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但是他们纵容了宋庆龄的谎言和违法行为。为此他们付出了从一九四九年起就丧失家园故国，父坟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代价。善恶必报，纵容邪恶也要遭报。

对于史沫特莱而言，这封信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史沫特莱与正常人无法相处，现在宋庆龄也与她决裂，她无法再以“国母”的秘书身份活动。

挨贺子珍打骂

史沫特莱在全程参与了中共通过张学良逮捕蒋中正，强迫国民政府放弃剿匪计划的“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请和安排下进入延安。

《纽约时报》则分别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

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报道了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起的负面作用。

共产国际则于一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答曰，“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这当然是撒谎，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是周恩来的话筒，如果她违背了周恩来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请到延安。

放荡不羁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得到了男同类的青睐。正是她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事后，史沫特莱写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是否也有奸情，不好判断，但康克清与贺子珍都因此吃醋却有据可查。史沫特莱还与贺子珍打起来。

陶铸的革命伴侣曾志在其回忆录中说，她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

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其实史沫特莱与毛虽打情骂俏，但双方没有奸情，毛看上的是为他俩翻译的吴光伟（英文名Lily Wu），而史沫特莱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怀和朱德。

史沫特莱不光乱谈情，还借钱不还，凡此种种让史沫特莱在延安引起众怒。最好笑的是这位“共产共夫”主义的实践者却被吃醋的贺子珍扣上了“帝国主义分子”与“破坏共产党党风、红军军风的坏女人”的共产大帽子。

史沫特莱不仅被拒绝加入令她如鱼得水的中国共产党，她的延安行还因贺子珍到吴莉莉（吴光伟英文名的音译）的窑洞捉奸而被中断。贺子珍负气去了苏联后，吴莉莉与史沫特莱也难以再在延安停留。

史沫特莱九月离开延安，先跟随朱德当了九个月的“随军记者”，这可能是掩盖中共假抗日的宣传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莱镜头的原因。这期间史沫特莱与朱德分别向印度的孙中山—尼赫鲁写信求援，促使尼赫鲁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样死在中国的柯棣华。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借抗日之名为共军向国内外募捐和申请各种援助。有资料称，“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

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美国对华政策在中共篡夺政权中起关键作用，所以，不难想象史沫特莱会对上述美国要人施加影响。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莱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并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国，开辟红色阵地，继续为中共宣传。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莱写成《中国的战歌》，借国民党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产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最迟从这时起，史沫特莱就投入在美国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宣传战，她写信告诉“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嘱我相信中国人民，你还指出你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你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一九四六年九月，老舍在免费招待艺术家创作的雅门

(XADDO) 与史沫特莱相遇。史沫特莱住在美国富人的庄园里为谋害了无数中国富人的朱德立传。她“无时无刻不给当时的中国的解放区与苏联作宣传。在作这种宣传的时候，她还是针对着对象，适当的发言，不犯急性病。比如，有两次她到新从战场上退役的士兵里去活动，教他们不要追随着老退伍军人作反动的东西，她就约我同去，先请我陈诉蒋介石政权是多么腐烂横暴，而后她自己顺着我的话再加以说明”。

还有资料透露，史沫特莱与冯玉祥一起，开着车身贴满宣传画和标语的汽车在纽约四处演讲，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援助中华民国。象共产党一样不仁不义的冯玉祥，最迟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在美国协助红色势力抹黑蒋中正。冯玉祥骂蒋中正为“帝国主义之狗”，其实他自己已沦为共产国际的狗。这个“大老粗”还在红色势力的支持下，写出《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竭力抹黑蒋中正。因此毛泽东不惜花大价雇苏联客轮去纽约接冯玉祥回国，岂知客轮失事，冯玉祥葬身大海。

史沫特莱则继续在美国为中共混淆是非，欺骗世人，比如，她在芝加哥作“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时宣称：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史沫特莱滥用言论自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受到调查。

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

奉命调查左尔格间谍网疑案，毕竟日苏双方各执一词。调查结果被编写成《远东国际间谍的真相》的小册子，又名“威洛比报告”，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公布。可是面对事实，史沫特莱一如既往地撒谎并质问麦克阿瑟，“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利用豁免一切民事诉讼的特权，诋毁一个无职无权、连政治组织背景都没有的一个弱小的美国公民的名誉，该当何罪！”

共产国际在美国的走卒比如斯诺竭力支持史沫特莱撒谎。杨国光在左尔格传中，引用斯诺说，“最后迫使美国陆军部不得不作出书面道歉。它向一介平民道歉，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还透露，陈翰笙受命向史沫特莱转达中国共产党对她访华的邀请，并为此留下了盘缠一千美金。陈翰笙其时也潜伏美国，他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史沫特莱是中共篡夺政权约一个月后收到访华邀请的。

一九四九年深秋，史沫特莱想从英国转道投奔红色中国，于一九五零年在英国病死。死前，史沫特莱指定朱德为其稿费接受者并表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因此，史沫特莱在伦敦去见马克思一周年时，中共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上述老舍对史沫特莱的回忆，就是他当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红色宣传。那时老舍没想到，十五年后，他会作为北京文联主席被打得遍体鳞伤而投湖自尽。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

宝山中共烈士陵园，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被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史沫特莱显然只是中共之友，或曰朱德的“白肤女皇”。

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象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都是洋奴美化共匪及其头目的代表作。

然而，即使是朱德也没有在红色中国免遭迫害。红色暴政建立后，朱德开始享有特权，一个人就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在毛泽东打倒高岗、饶漱石以及彭德怀后，朱德被迫作过两次检查。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其时他虽然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但已没有任何权力，身边也只剩下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

“文革”中，“批判朱德大会”虽临时被取消，但康克清则被打成走资派，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被卡车拉着，在北京游街、批斗。后来她还被迫扫厕所，七十年代后才官复原职。朱德的子女则被禁止进入中南海。连朱德纪念康克清的前任伍若兰而养的兰花，用朱德孙子朱和平的话说，“也同样遭到厄运。”

值得一提的是，康克清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听了有关罗马尼亚的红色暴政轰然垮台的文件后中风，清醒来后她的第一句话，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怎么样了”？

侵扰了全世界，占领半个世界的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各国

都被人民推翻，中国人也必然会解体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史沫特莱这样的共产间谍到时自然会成为反面教材。

红色恶果

综上所述，史沫特莱在二十年代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华民国，以记者身份从事红色宣传和渗透活动。史沫特莱象约翰·里德（John Reed）一样是在莫斯科的文学档案中有文章保险柜的两个美国人。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的铁证如山，但她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一再蒙混过关。

史沫特莱在中国活动的十二年间，“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红色头衔先后出笼。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进攻苏联的打算，可是随着“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和“皖南事变”的相继发生，战祸就被转嫁到中国。而“共匪”也变成了“红军”！从此事实被歪曲，正邪被颠倒。

以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与民国政府作对，误导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民国政府改变了剿共政策，承认了反传统反人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莱亲自参与了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尾崎

秀实则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纨绔子弟西园寺公一创办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发表评论，宣称中国国民党将会放弃过去的“反共”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毛泽东等携起手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此断言让他一鸣惊人，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共领导的红军视为“共匪”而不屑一顾。（杨国光）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也断定，“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可看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共。毛泽东本来想杀害蒋中正，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蒋中正抗日。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叛变、反对政府，绑架蒋介石”，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与此同时，苏共发电报给中共，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透露，宋庆龄曾告诉他，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苏共还借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诬蔑汪精卫，说

“张学良是受了汪精卫的影响，或者是汪精卫利用东北军中的反日情绪，发动了这次政变，绑架了蒋介石。”汪精卫认识到，共匪之抗日，为第三国际而战，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国崩溃。因此他反共主和，所以，苏共诬蔑他“主张对日妥协，是卖国贼”。这是共产国际的统一调子。过了两天，苏联政府还通过驻中国的使馆发表声明，谎称“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对张学良发动的这次政变。”

君子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不会信口雌黄，也不屑使用阴谋诡计。

共产党却为了篡夺各国政权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边渲染甚至制造中日矛盾，一边挑起民众的抗日情绪，目的就是要国军停止剿共。共党制造了“西安事变”后，发生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于是，国民党中央社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周恩来七月十五日拟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党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共党在第二条中自己承认了国军剿共的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共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产国际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的阴谋却得逞了。

上当受骗的国民政府只好退居台湾，对共党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态度。国共两党谁正谁邪，从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和大陆的状况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让木偶廖承志出面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后，宋美龄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开信。对照两封信，就能获知中共的伪善与邪恶。在此摘录宋美龄信中的一段，以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褻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

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第二章 王安娜和“七君子”的报应

王安娜当选无耻的洋人是因为这个德国人象史沫特莱一样投身于共产国际对中华民国的赤化和颠覆活动。王安娜甚至假扮过沈钧儒的德国儿妻，通过她在中国的活动和相关回忆，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如何通过“七君子”等共产头衔与“西安事变”等红色诡计欺骗世人，争取民心，篡夺政权。

一九六四年，当王安娜在西德发表回忆录《我为毛战斗过》，宣传毛泽东，糊弄德国人时，我还没有出生。四十六年后，因共产暴政流亡德国的我，才在揭露红色宣传时，注意到王安娜等一系列外国人曾投身于共产国际赤化中华民国的文宣武斗中。不过王安娜虽为中共出了不少力，但没有完全失去自我，因而不得不与王炳南离婚并在一九五五年独自离开红色中国，回到苏联在德国的殖民地东德。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闹僵，东德站在苏联一边，王安娜受到排挤，于是移居汉堡。

王安娜的自传在翻译中文时被改名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于一九八零年在北京出版。二零零九年又被改为《嫁给革命的中国》再版。在由中共操纵的一切媒体包括史书中，不缺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王安娜（一九零七－一九九零）以及把她带到中国的王炳南（一九零八－

一九八八) 的宣传资料，但相关的史实一般读者却难于获知，因此值得介绍。

国际共运的简况

共产主义从问世后就因其邪恶在各国遭到抵制。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列宁趁机在与俄国沙皇打仗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支持下，成功掠夺了“二月革命”的果实，在俄国建立起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或曰红色暴政。列宁收买里德等美国笔杆子伪造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光辉形象，然而真相只能暂时隐瞒。列宁的劣迹与死于梅毒的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

一九一九年，列宁在莫斯科第三次成立共产国际后，为了迷惑世人，打击敌人，开始散布诸如，苏维埃政府要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之类的谎言。

德国共党也于一九一九年就成立。在德国的红色势力已强大到既差点就武装夺取政权，又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地步。蔡特金就是那时红色势力的名人，希特勒借助反共势力上台后，德共被驱逐出议会，蔡特金逃到苏联，并死在那儿。

但在中国，这一时期却主要有因嫖妓伤妓被媒体曝光而遭

北大开除的陈独秀在利用《新青年》诲淫诲盗，宣扬歪理邪说。

一九二零年二月，俄共夺取中西伯利亚，打通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上海建立红色据点，促成陈独秀等于八月成立中共。

一九二二年，经过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战争，列宁得以巩固红色暴政并赤化俄国的几个邻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除苏联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林堪称国际共运的枢纽。无数第三国际间谍比如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都曾在柏林活动；而不少中共高干比如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在柏林认贼作父，加入共党。

只有张申府是先与陈独秀、李大钊有联系后才出国“亲共简学”。张申府到了欧洲后，不象一般的留学生一样专心上学，而是按陈独秀的要求积极在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发展邪党成员。张申府先把与他同居的刘清扬发展成第一个女共党徒，然后两个“革命伴侣”共同把周恩来等拉上贼船。

一九二二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书记是张申府。十月，到欧洲寻找出路的孙炳文和朱德就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中共旅欧支部及其青年团的共产活动遭到曾琦、李璜等正派人士抵制，

他们于一九二三年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宣扬国家主义，用以抵制无视国家、民族和个人利益，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或曰马克思主义，但中共党徒的活动受到各国共党的支持，尤其是莫斯科的经援。苏联对中共的经援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才中断。

欧洲各国和日本对列宁夺取俄国政权并企图赤化世界都加以抵制，包括武力干涉。苏共占领西伯利亚后致力于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自然遭到北洋政府的抵抗。吴佩孚等各方要员都要苏共军队撤出外蒙古。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

孙中山想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列宁的宣传所吸引，双方开始接触，商讨合作事宜。一九二二年六月，孙中山因坚持发动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与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分裂后，在蒋中正的支持下，决定正式要求苏共从西北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派蒋中正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并落实西北军事计划。在苏联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访问之后，蒋中正失望地回到中国。蒋中正无法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因为苏共已视外蒙为自己的领地，

不容孙中山染指。蒋中正也因此对苏联有了亲身感受。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就在致廖仲恺的信中认识到，“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孙中山在困境中，不择手段，饮鸩止渴，同意“联俄容共”。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对外公布《孙文越飞联合声明》。越飞是苏联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是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马林。鉴于三民主义与各国政治经济秩序一致，而共产主义或苏联则与此对立，孙中山在声明中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一九二三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先去苏联，然后回国。一九二四年，列宁死于梅毒，但黄埔军校在苏联提供师资、经费、装备等援助下在广州成立。张申府也因此得以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在他的推荐下，二十六岁的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成为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暗中从事赤化工作。

一九二五年，中共开始打着反帝爱国的幌子在全国各地搞类似“五卅运动”的赤化活动。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支持，孙炳文便在其中。而朱德则在同年因参加非法游行被捕后遭到德国政府驱逐。朱德便带着贺治华投奔苏联，先学马列，后学军事。一九二六年，朱德被派回国，赤化四川要人杨森。留在苏联的贺治华生下朱德之女朱敏后与另一共产党人霍家新同居。他俩后来象顾顺章一样被共党

视为叛徒遭到其“红队”暗杀。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领导人，固守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为了继承孙中山的意志，准备用“北伐”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曾任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等人，聚集在孙中山的灵柩所在地北京西山碧云寺，达成反苏、反共等决议。这是国民党内第一批识破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西山会议派。

蒋中正可能因“联俄容共”的实惠一时被迷惑，公开反对西山会议派。然而三个月后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中正就因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未与汪精卫商量，便采取拘捕听命于苏联顾问季山嘉的中山舰舰长共党成员李之龙等一系列反苏反共行动，导致汪精卫辞职出国，蒋中正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但蒋中正一年后才在英美法意日五国于四月十一日发出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惩罚北伐军针对外国人的暴行后，被迫清党剿共，通缉鲍罗廷等共产党人。对此生长在中国并创办燕京大学的美国基督徒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写到，孙中山“恳求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美国）援助他，但是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苏联派去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鲍罗廷和加伦（Galen）带领的顾问们和其他援助。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他们就以苏联的方针组建国民党。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后，这个改组仍在继续。他们策划了‘北伐’。他们编在从广州到汉口铁路的那个支队，在汉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那次进军

中，伴随着许多毫无约束的放火和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惨杀。”而且“强烈亲共产党的武汉领袖，为了使蒋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困境，派了一队士兵，去谋杀在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多数是传教士”。那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的赛珍珠（Pearl Buck）则在北伐军进入南京后一度离开中国。她的父母象司徒雷登的父母一样都是从美国到中国的传教士。

汪精卫在亲自读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弃国民党，武装夺权的《五月指示》后，才明白共产党的邪恶。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起，被迫开始用武力清除共党后，汪精卫也于七月十五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职。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共产党在南昌、广州等地举行暴动，导致国民党在南京的临时政府于一九二七年底与苏联断交。

蒋、汪等识破苏联企图赤化中国的阴谋后，开始领导各界奋起抵制赤祸。德共在一九二七年发起“五·一”游行，抗议中国清共。同年春夏，在各国共产党组织支持下，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分别在德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等国支援中共的集会上作报告，为共产党赤化中国搞宣传。共产党赤化中国的企图在以蒋中正为首的各界要人的抵抗下破产后，旅居欧美的中共党徒分别加入了所在国的党、团组织，后来成为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继续支持共产国际颠覆新兴的中华民国。

王安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柏林碰到曾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的王炳南。

王炳南的活动

王炳南之父王宝珊与杨虎城是军中战友。一九二六年，杨虎城在吴佩孚手下任师长时，王宝珊是杨虎城部下的参议。王炳南秘密入共后，于一九二八年到杨虎城军中从事赤化工作，遭到追查后，在杨虎城的保护和资助下，一九二九年先到日本，一九三一年转到德国柏林。

王炳南象张申府一样，出国不是留学，而是以留学的名义从事“国际联络工作”。所以，当年也曾留学柏林的北大德语教师程远后来对学生赵鑫珊说，“那时他还是个热衷于跳舞的公子哥儿”。其实不然，王炳南象周恩来一样，一边干违反欧洲各国宪法的赤化工作，一边与王安娜之流的女人来往。

王炳南被派到柏林后，在二十五岁那年认识了王安娜。对此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是党员。他为了使自己的

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王炳南象周恩来等一系列共产党猿一样在德国没有吸收西方的文化，而是自愿接受列宁的赤化。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反共势力的支持下合法上台。希特勒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对非犹太国民有利，红色势力在德国遭到毁灭性地打击。王安娜于一九三五年在伦敦与王炳南结婚，获得中华民国护照。

当王炳南带着德国妻子一起回国完成共党交给的新任务时，别的中共党员比如萧三在奉命回国时无法携带德国妻儿同行。周恩来则撇下其德国情人，留下一私生子接受任务回国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王炳南与王安娜从柏林到苏联接受命令。其时，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已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换言之，共党利用中日矛盾，借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嫁矛盾，摆脱几乎被歼灭的困境。

王炳南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驻地，接受代表中共中央的王明、康生的命令后，便带着王安娜回到西安，进入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

从此王炳南在王安娜的帮助下，大搞赤化活动。其时，蒋

中正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政府早已得到各国承认。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一直密切。在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党剿共时，在他的部队中，有中共党员十六人。杨虎城不仅不清除他们，还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党徒谢葆真获准给杨虎城做妾。从史料来看，杨虎城完全符合中共地下党员的标准。一九三四年，仅杨部警卫团共党成员就有两百余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向杨传达中共的所谓《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十二月，毛泽东、彭德怀派人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事宜。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

王炳南、张文彬等都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被共党派到杨虎城身边促成西安兵变的共特。与此同时，别的共特比如史沫特莱等也以各种名义来到西安。

从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可以获知，一九三六年九月，王炳南夫妇还陪同杨虎城以疗养为名到上海活动。王安娜因而结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沈钧儒等。

“七君子”的作为

章诒和的回忆录被中共禁止，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从中初步了解共产党与沈钧儒等人的关系。从相关史料中不难断定凡被中共称为君子者，均小人也。沈钧儒不幸就是“七君子”之一。与别的伪君子不同的是，沈钧儒只共了别人的产，没与他人共妻。沈钧儒的履历上只有一妻，一九三四年就去世，那年五十九岁的沈钧儒没有再娶。与陈独秀、毛泽东等相比沈钧儒算正人，但不是君子，因为史料证明沈钧儒在爱国的名义下，干的是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勾当。

沈钧儒有四子一女。他们是沈谦（一八九五）、沈诚（一八九八）、沈议（一九零九）、沈谅（一九一一）和女儿沈谱（一九一七）。其中沈议留学日本，别的三子留学德国。沈谱就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九三九年在大学期间，由邓颖超介绍入共，成为地下党徒。

沈谱表示，她父亲沈钧儒“的一生是和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史料也证明从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认识到共产党的危害开始清共起，沈钧儒就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一九三二年，沈钧儒与陶行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共党外围组织，为处于国民政府围剿中的共匪排危解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一九三三年，沈钧儒参与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阻碍国民政府依法惩罚听命莫斯科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些名不符实的违法活动最终导致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七个“救国会”要人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捕。

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厅起诉沈钧儒等被告“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罪在“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勾结军人，图谋不轨”、“组织和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等。这些指控现在已被历史证明。

可是当时沈钧儒们却加以诡辩，当审判长说到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说沈钧儒是被共产党利用时，沈钧儒声称：“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

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没有利用沈钧儒抗日，而是利用他颠覆了新生的民主中国！对此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自己泄露说：“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而曾担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则表示，“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却，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

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沈钧儒们则在“爱国”的名义下“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因此沈钧儒们自然要被红色宣传谎称为“爱国人士”、“七君子”。

即使在中华民国的监狱，沈钧儒们也享有任何人在红色中国都无法享有的自由。沈钧儒自述：“我们终日谈笑快乐”，每天“阅书写作”，自由交流，一起锻炼身体，如打排球，“在院内东西以一绳代网界，三人分南北对打，乐此不疲”。此外，他们还实行狱中自治：“乃器主管会计，造时主管文件，千里主管卫生，公朴主管事务，韬奋及余则仅于各事负补助之责。”

沈钧儒在家书中，披露杜重远、黄炎培、钱新之、王晓籁、杜月笙等皆为他们逃脱惩罚而出力，坚持执法的则是吴铁城、潘公展等。

共党地下组织为了借此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大搞红色宣传。王安娜在回忆录中透露，她为了给一美国记者提供素材，特意假冒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前去探监。就从这件小事上就足以明白为何中华民国能被共产党颠覆。共产党猿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可以撒谎，可以杀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中华民国的监狱与红色中国的监狱堪称有云泥之别。

王安娜在回忆录中表示，“我在监狱里待了一整天。监狱里相当舒适”。她可以自由地与沈钧儒们交谈，唯一的遗憾是，她是以儿媳探视公公名义去探监的，只能与沈钧儒等六个男被告接触，不能到处乱串，没能探望史良。

但这不影响王安娜“将狱里‘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

王安娜们将为共产党效劳的七个被告包装成爱国人士骗取了民意，获得了支持，也为杨虎城们发动兵变提供了借口。由地下共党促成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杨、张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在各国共产党徒的暗中参与下，已快被剿灭的共匪被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所挽救，蒋中正被迫顺从伪造的民意放弃剿匪的计划，将共产党合法化，导致中国最终被赤化。

唯独连政敌比如章伯钧都认为人品无可挑剔的汪精卫有先见之明，认识到“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汪精卫宁可背负“汉奸”的污名也要与日本讲和，共同反共。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寄语日本》，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

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可惜汪精卫既不能阻止沈钧儒上共产党的贼船，也无法阻拦蒋中正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沈钧儒的女儿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八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父亲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

蒋中正一直到沈钧儒们跟着中共在日本投降后抵制首次民主选举后，才明白沈钧儒领导的民盟是“跟随中共，掩护共匪的颠覆工作，且为共匪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应声虫”！即使如此，沈钧儒还是得以于一九四七年，出走香港，继续作中共的应声虫。

共产党依靠各国共产党的支持，颠覆了中华民国后，以蒋中正为首的反共人士只是退居台湾，而被共产党操纵和吹捧为君子的沈钧儒们无不在红色中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为毛战斗过的王安娜

王安娜既为毛战斗过，也吹捧过鲁迅。她在回忆录中有一章为鲁迅唱赞歌，声称：“鲁迅则用当时被认为是不文雅的大众化的语言写文章，他把长期以来束缚中国文学的封建枷锁砍断了”。王安娜不懂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但她会用共产术语。中国文化讲究文以载道，鲁迅反其道而行之，对古典文学宣扬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道理竭力讽刺、大加挞伐，与反传统反道德的共产党完全一致，自然会得到共产党的吹捧。

王安娜在鲁迅病入膏肓时到过他家一次，在回忆录中她写到：“我告诉鲁迅，我在一位中国女朋友的帮助下，正开始把《祝福》和他的其他小说译为德文”。这再一次证实，共产国际那时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翻译鲁迅，推广鲁迅。

最好笑的是王安娜在回忆录中透露，她在一九三八年，“收留了一个中国朋友住在家中……她叫胡关露，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关露是北方人，说的是中国最漂亮的、我认为是最理想的北京话。炳南得知她住在我们家里，非常高兴地说难得难得。”

不知王安娜是真傻，还是装傻，总之，她的回忆录表示她对自己面对的人事都知之甚少，比如，她似乎只知道谢葆真“和杨结婚时是一个才十五岁的女学生”，而不知谢葆真和关露一样都是地下党员。关露在潘汉年策划和安排下，

打入汪精卫组建的亲日反共政府，为共党搜集了大量情报。王炳南与关露有恋情，一九四五年，王炳南与王安娜离婚后，王炳南曾有意与关露结婚，可是周恩来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因为关露是名声在外的“汉奸文人”，中共惧怕世人获知关露是中共党员。为此关露深受打击，后来终身没嫁。在红色中国，关露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十年之久，出狱时仍然背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黑锅。一九八二年，关露随着潘汉年平反后，服安眠药自杀。对此曹汉撰写的《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一记中共党员关露的生与死》有详尽地披露。

不过获准嫁给王炳南的张浴云更不幸，她在六十年代就因王炳南被打成特嫌受到牵连而上吊自杀。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学者坎鹏（Thomas Kampen），曾发表《两个德国人在西安：王安娜和赫尔伯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从中可以获知，这两个德国人都与史沫特莱有联系，都是为共产党效劳的德国人。与王安娜同龄的赫尔伯特学过牙医，于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进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间谍网。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下，他于一九三六年夏天到西安开诊所，以此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丁玲也曾以厨娘名义隐藏在这个红色诊所。然而，不过半年赫尔伯特就把命丧在他自己促成的“西安事变”的乱枪中。

从王安娜的自传中可以获知，最先在“西安事变”中替共产党搞英语广播的是史沫特莱，后来接替她的是受斯诺影响的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当英国领事馆给贝特兰打

来电报，要求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后，王安娜便接替了混淆黑白的红色宣传。红色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唯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咸鱼翻身，颠覆中华民国的关键一步。张学良、杨虎城都是历史罪人。对此连闻一多当时也表示：“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在当时多么不得人心。而蒋中正却深得人心，对此司徒雷登在一九五四年为他的回忆录撰写的前言中写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在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或计划中，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里，尽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战争，但是国家统一的进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圣诞节那天，他从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释放，我对委员长和他那能干的夫人有了忠诚的敬意，并且和中国的人民一道，感到欢欣鼓舞”。

促成张学良和杨虎城绑架蒋中正不是王安娜参与的唯一红色活动。

王安娜协助斯诺等进入延安后，一九三七年春，还自己陪

她称之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从西安到延安，途中列夫对王安娜表示，“埃德加·斯诺给他写的书取名叫《红星照耀中国》”，“我的书就叫《苏维埃月下的爱情》”。由此可见红色记者多么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可以还没抵达延安，就罔顾事实，为了美化匪区而凭空幻想。斯诺的榜样有多坏，从中可见一斑。如果列夫到了延安能够自由采访，那么任何一位红军女战士都可能向他透露，她们在苏维埃与“月下”，与“爱情”无缘。贺子珍饱尝怀孕生产之苦后被抛弃；康克清则还不到十八岁就被可以当她父亲的“朱军长”看上，于是由妇女组的组长曾志出面告诉她：“组织上希望你能跟他结合”；萧月华则在二十三岁时被“党组织”分配给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饱受“德国毛子”地摧残……

而王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也用下列描述，掩饰上述事实：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窑洞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毡，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颇有住家的雅致。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中国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

“1929年，当时43岁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时，她只有17岁，但两人真诚相爱，被视为模范夫妻”；“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

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

北京青年报上一篇题为《八路军的洋“少校”王安娜》称，王安娜后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千里行军，坚持不骑骡子；长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说明来自德国农村的王安娜还不如毛妾江青有教养。至少江青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蓝苹之名在上海《大沪晚报》上发表文章《家庭里的事》，明确表示“清洁卫生，是必须讲究的”。王安娜甘愿被毛泽东欺骗，也帮着毛泽东骗人，实在可悲可叹！

从王安娜的回忆录和曾当过王炳南秘书的程远行的相关著述来看，王安娜在大陆的十九年，主要协助王炳南、周恩来和宋庆龄，以诸如“保卫中国同盟”代表和“八路军少校”的身份，为共产党做联络、宣传及统战工作。王安娜也曾负责把国际援华物资偷运给躲在后方的共军，为共产党趁机发展壮大出了不少力。

中日战争时期，王安娜在上海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位在柏林结识她的日本人出面安排她去了一趟东京。王安娜没有因“日本之行”改变其亲共立场，但这趟没有请示中共的自由之行却激化了共党对她的不满与猜疑，本来她就被怀疑为“双重间谍”，这下给王炳南带来更多麻烦。程远行写到，“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遵照周恩

来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敌占区、跑前线，从来就没有一句怨言；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
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决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最迟一九四一年又回到重庆，因为红色卧底冯亦代在回忆录中表示那年在重庆结识她。毛泽东制造了借国军之手，清除党内异己项英的“皖南事变”后，王安娜积极配合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中共媒体对王安娜的赞美，从中可以得知，王安娜一直被中共利用来散布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红色谎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同情和支持中共，但没有加入中共的王安娜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在上海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向红区运送紧缺物资。

一九五五年，王安娜离开红色中国。王安娜不是斯诺，毛泽东不需要她，从此她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无法与唯一的儿子见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红色中国的大门才为民众开启。王安娜才得以作为中共的朋友到中国参观访问，受到她在延安结识的邓颖超和康克清接见。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时，王安娜和我都在德国，或许她也象我一样从此看穿中共，总之，她一九九零年才病逝。

王安娜自己说：“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新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王安娜不仅属于挑动支持杨虎城与张学良武力绑架蒋中正，要挟国民政府停止剿匪计划的红色势力，而且为国际共产势力打着爱国救亡的旗号混淆视听，暗中发展势力，最终颠覆中华民国发挥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与萧三的德国妻子叶华相比王安娜还算幸运。“文革”中，叶华和萧三被以“苏修特务”等罪名关押了七年多，出狱后又被软禁了四年多。而王安娜只是饱尝了与儿子分离的痛苦，没有尝过红牢的滋味。不过王安娜的中国丈夫王炳南和她在回忆录中赞美的林彪们与沈钧儒们就没她在西德这么幸运了！

“七君子”的下场

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就提出：“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可惜沈钧儒们对此浑然不知，等到他们中的章伯钧们明白这点时，已经晚了。

章伯钧们刚开始象“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一样被中共任

命为非要害部门的部长。章伯钧意识到：“民主人士担任部长是形同虚设”。即使如此，十年不到，他们及其亲属都遭到残酷迫害。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沈钧儒们主动解散了所谓的“救国会”。从史料来看，“救国会”叫“救共会”才名副其实。一来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变”后，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国会”的工作；二来，“救国会”在王炳南们的操控下没做过救国之事。在此仅举一例。一九四一年，苏联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时，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前苏联先与北洋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与民国政府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背信弃义，不是中国的盟友，最迟在《苏日中立条约》公布后，每个真正的爱国知识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抵制。

“救国会”的宗旨本来是抗日救国，但“救国会”却以补充为由收回了交给中央社发表的由王造时执笔起草的《致

斯大林元帅的信》，因此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中共刚上台时，除王造时外，还在世的“七君子”全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沈钧儒的女儿说，“在那个时期，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不过八年，那些跟他一起为共党奋斗过的人“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主席崇拜得太厉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胡愈之在列宁死后，在《东方杂志》上以“愈之”等笔名发表了五篇文章，吹捧梅毒患者列宁，讴歌他的红色恐怖，是专门暗中赤化个人和组织的共特。

对此章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胡愈之不需要出卖沈钧儒，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却为了自保出卖了章伯钧。史良在红色中国名高位重，可象宋庆龄一样只是共党的摆设。章伯钧在被史良出卖后断言：“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即使出卖了良心，史良也没能保住自己，同样落到被迫弯腰挨批斗的地步。连她昔日的情书都成了罪证。史良孤独的死后，留下的漂亮首饰全是无人

要的假货。

沈钧儒年老糊涂，逃过共党的迫害，但他的盟友与后代却不得不承受恶报。对此章诒和写到：“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象共匪头目，既共人产，又共人妻。章乃器在民国时期，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每月补助共军三万银元，但在红色中国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业绩就是印发了在中国历史上从不需要的粮票！五年不到，章部长就被打成右派，失去官职。时年七岁的小儿子章立凡被安派在批斗会上发言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章乃器被红卫兵打成重伤，第四任妻子王者香是中学老师，死于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七年章乃器含冤病逝，三年后，中共才给他“平反”。

王造时在《致斯大林元帅的信》中批评《苏日中立条约》出卖中国利益。因此，当沈钧儒们被调到北京时，学位最高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工作单位也没有。一直到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目睹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教授。

中共“反右”时王造时被打成“右派”，中共搞“文革”时王造时又首当其冲。一九六六年，“七君子”被捕三十周年之际，王造时被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关进上海第一监狱。一九七一年，反对国民党的王造时就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比国民党的监狱！九年后，王造时被凶手“平反”。

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则因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

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和其丈夫范长江也一样不得好报。

沈谱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日在重庆与范长江结婚。中共在中华民国办的《新华日报》于第二天专门报道了他们的婚事，“这没有仪式的婚礼，因此不同凡响。宾客没有特别的馈赠。我们都看到了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先生的贺诗，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新婚夫妇‘同心同德’。”

范长江（一九零九—一九七零）曾是民国时期自由媒体《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美化共党占领区比斯诺还早。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其报道中公开称共匪为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到西安采访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与毛泽东一夜长谈。从此，范长江便象斯诺一样成为毛泽东的吹鼓手。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

在《大公报》发表震动朝野的政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接着他在《国闻周报》发表《陕北之行》的连载，令毛泽东欣喜万分，三月二十九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没有他和斯诺的生花妙笔，韦君宜们恐怕不会把匪区当“圣地”而投奔。

《大公报》是中共一直渗透的自由媒体，一九三一年在《大公报》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身份泄露，但他只是被胡政之安排去日本留学，并兼任驻日记者。一九三八年，范长江参与发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也象“左联”一样，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其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就是中共地下党徒。范长江则于一九三九年经周恩来介绍在重庆秘密加入共党。

一九四一年，蒋中正命令逮捕范长江，李济深却把他放走了。范长江等人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继续充当共产党的喉舌。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就不需要这位红色名记了。

“文革”期间，范长江、沈谱夫妇都遭到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范长江就被关押，受尽折磨。一九七零年，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庆祝中共国庆不久，比斯诺小十四岁的范长江就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沈谱用了八年时间，为丈夫的冤死而奔走呼号。一九七八年中共为范长江召开了追悼会，其后，又建立了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表彰他的红色劣迹。

沈钧儒的大儿子沈谦的儿子沈人骅娶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的父亲，也就是周恩来的三弟周同宇，在“文革”时被周恩来亲笔批捕，关了七年。

在王炳南身边工作了近八年的程远行与友人一致认为王炳南是共党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红色中国外交的创始人之一。在共党颠覆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王炳南做了大量赤化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在重庆时他不仅是周恩来的右手，还是周恩来的耳朵和嘴巴。一九五四年，王炳南担任中共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次年出任波兰大使。在中共为了获得民主国家承认的过程中，王炳南又以大使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包括代表中共和美国代表会谈，达成了“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的协议。一九六四年，王炳南被调回大陆，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但也免不了于一九六六年被打成“国际间谍”，遭到迫害，妻亡家破。

综上所述， 违背天理人伦，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的洋人与华人都没有好下场！

第三章 毛泽东的洋鼓手斯诺及其他

德文专著《被忽视的中华民国》（作者中文译名韦唐仕）用史实证明，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毛泽东趁日本侵华之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靠暴力、宣传加共特颠覆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一九零五－一九七二）可与《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里德（一八八七－一九二零）相提并论。里德是共产国际收买和利用的红色笔杆子，他罔顾事实地宣传不仁不义的列宁和“十月革命”与理想无关，是私欲的作用。

张威在专文《一九三六：斯诺赴红区采访的台前幕后》中则证实经济诱因是斯诺冒险去苏区的一个原因，这之前斯诺早已是共产国际间谍的亲密战友。但一直到美国的麦卡锡时代，斯诺才被公认为“共产党的走狗”、“卖国贼”，“左翼记者中最成功的一个”、他的报道“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毛泽东则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一点。”正是斯诺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伪造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硬是把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灾星包装成了大救星。

里德在苏联死后，是三个受到苏共厚葬的美国共产党徒之一。斯诺则与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零）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斯诺还象里德一样也为苏共作过宣传，于一九四七年发表过《斯大林需要和平》。张戎夫妇的研究成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则透露，在莫斯科禁止毛泽东再接待斯诺后，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斯特朗遵命写作文章《毛泽东思想》和书《中国的黎明》，宣称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断言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

正是因为有这些洋奴才的存在，被正人君子视为赤匪的共产党才得以颠覆以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为宗旨，以宪政为目标的中华民国。介绍洋奴才的所作所为，是希望读者明白共产党的宣传多么狡猾，多么害人。

共产党的根源

《共产党宣言》于一八四八年出版。主要作者德国人马克思对世界充满仇恨。“我剩下的只有仇恨”之类的独白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与他一起在伦敦搞过第一国际的俄国同类巴枯宁（Bakunin）表示：“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共产党宣言》不是马克思的自由创作，而是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交给他的任务。马克思靠恩格斯的协助才得以完成这一欺世大谎。《共产党宣

言》蔑视天理人伦，把有产阶层视为敌人，号召用暴力剥夺私有财产，砸烂社会秩序，推翻现有制度。《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开始，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对心怀不满的青年极具煽动性、诱惑力！《共产党宣言》蔑视人权，宣传暴力，美其名曰“革命”，自然会被正人君子视为祸害而遭到抵制。所以，马克思在伦敦死时，还是个不受欢迎的文痞。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产党宣言》获得各国痞子的共鸣，导致共产暴力到处蔓延。一九一七年，以列宁为首的共产暴徒终于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篡夺俄国政权。一九一九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受苏共掌握的第三共产国际，企图颠覆别国政府，赤化世界。

第三国际各国分部

第三国际成立后，开始在各国秘密组建分部，妄图夺取各国政权。里德在同年成立第一个美国共产党。在中国，反传统反道德的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始宣传外来邪说。一直到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荷兰共产党徒马林被派到中国，才于一九二一年召开了只有十五个中外共产党徒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给中共提供经费不说，还给中共培训职业干部比如王明和康生。中国共产党也象美国共产党一样，

从一开始就听命于第三国际或曰苏共。

在苏共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都在本国搞恐怖活动。比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企图暗杀保加利亚皇室，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然而保加利亚皇帝及其部长却得以幸免于难，诸如此类。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等的兴起与共产党搞无视私有财产、民族文化和国家利益的国际恐怖活动密切相关。

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七年曾组织三千人的红色纵队前去西班牙支持西共的暴政。白求恩等外国共产党徒则在西共失败后到中国支持中共。

鉴于共产党在美国的违宪活动，里德被起诉后逃亡苏联。遗憾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麦卡锡为代表的政要才得以逐步促使美国政府调查和清除红色势力。一九四七，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发表了对外政策咨文，声明：世界已分成两个敌对营垒，苏联的极权主义“危害着美国的安全”；美国要承担责任，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支持各国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一九四九年宣布，美国共产党是“教唆人们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阴谋组织”。美共转入地下，直到一九六六年，美共才在改头换面后，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美共从成立起一直接受苏共的经费，在一九八七年达到三百万美元。一九八九年，美共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后，才失去苏共的经援。

在美国秘密加入共产党的也有华人比如冀朝鼎。这些红色华人都算共特，都暗中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而出力。冀朝鼎于一九四一年被派回中国，成为中华民国财经界的要员，他利用其职务和地位，“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冀朝鼎一边领取国民政府的俸禄，一边破坏中华民国的经济，堪称民族败类。他的弟弟冀朝铸一九五零年回到大陆，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可悲的是冀朝铸也只能在美国才能出版英文回忆录《毛的得力助手》。这本书因不够客观，且无深度，替自己说话而被平宽译室的主持人中断翻译。一九七零年，斯诺到中国为毛共的国庆捧场，在天安门上与毛匪亮相时为他们翻译的就是冀朝铸。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到北京，周恩来身后的翻译也是冀朝铸，然而在中共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却被抹杀了。这位毛助手九十年代还出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

一九四三年，斯大林为了与美国和英国联合抵制德国纳粹才宣布解散第三国际－这个违背各国宪法的国际恐怖组织。

第三国际没能颠覆美国和英国，但却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颠覆了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党及其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匪赶到了台湾。共党霸占中国后，血腥整人运动不断，至少八千万大陆人死于非命。当台湾人可以象各国人一样在公园炼法轮功的时候，大陆人却会因为信仰法轮功而惨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以牟取暴利！

第三国际的各国成员对中共夺取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在中共当局对外国共产党员的态度上也可得到印证。比如，中共在一九八五年特别发行了一套邮票以“中国人民之友”纪念对中共贡献最大的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这三个红色笔杆子都为了第三国际在中国篡夺政权，颠倒黑白，抹黑民国政府，美化苏区共匪。与他们相关的扭曲真相的红色宣传品无数，其中以斯诺名下的《红星照耀中国》造成的效应最大。中共媒体宣称，它“一个月之内，五次再版，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是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二十本必读书之一”，凤凰卫视网站上还有文称“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红星照耀中国》调整了对华政策”。

二人工作队

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斯诺靠混船票跑到繁华的上海寻找出路。他很快成为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罗的笔杆子。斯诺在上海的红色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一九一七—一九五三）上发表了不少报道，影响了不少读者，其中之一叫海伦（一九零七—一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伦到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特意带着剪辑的一大本斯诺报道约见作者。对海伦的一见钟情让在上海的美国人中感到孤立的斯诺打消了离开中国的念

头。海伦拒绝了斯诺的二十一次求婚，直到斯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书稿《远东前线》后，他俩才于一九三二年圣诞节结婚。

凤凰卫视的斯诺宣传片采访过的武际良在海伦百岁冥诞时发表纪念长文《绵绵不绝中国情》，其中表示，“海伦称：她和斯诺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时期，是一个‘二人工作队’，一个‘工合’式的成就，而且为不少人和历史事件提供过动力”。“工合”全名为“美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是在海伦的建议下由另一个国际共运成员路易·艾黎出面于一九三八年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红色经济组织，打着迷人的旗号，暗中支持共党。海伦为此写作宣传品《中国为建立民主而奠基：工合运动纪实》。

一九三三年春，斯诺夫妇迁居北平。不懂中文的斯诺从一九三四年初春至第二年深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邀请，任燕大新闻系客座讲师，以教师身份搞红色宣传。而燕京大学本来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团体依靠他们的财力和人力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就是说在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教会大学，红色鼯鼠也能出任教职，宣传违背基督的邪说，可想而知红色势力如何无孔不入了。

第三国际为了阻止民国政府消除共产共妻的红色恐怖主义，一再挑动幼稚的爱国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将共产国际与民国政府的矛盾转嫁为中日两国的矛盾，混淆视听，欺骗民众。斯诺夫妇把中共地下党员撰写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译

成英文，打印数十份，分送给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通过他们制造国际舆论和压力。在斯诺的家还密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具体步骤。海伦写了造成一百多人受伤的“一二·九”的系列报道，连续发表在红色周刊《密勒氏评论》上达半年之久。

参与“一二·九”的燕大学生黄华和龚普生、龚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诺的家，都受到红色宣传的迷惑。黄华和龚澎于一九三六年，龚普生于一九三八年分别加入共产党。斯诺夫妇协助发起的所谓“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导致一大批爱国青年象黄、龚一样误入歧途，成为马列子孙。对此武际良写道，“由于海伦当时表现得十分活跃，北平学界不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学者胡适曾在一次教职工会上诬称：‘这次运动是由斯诺夫人发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钱，就是得了罗斯福总统的资助。’”

如果说鲁迅是宣传苏共的头号中文笔杆子的话，那么，斯诺就是宣传中共的头号英文笔杆子。也因此最迟从一九三三年二月起，斯诺就开始着手配合共产国际宣传鲁迅，准备翻译出版英译本鲁迅小说选集。鲁迅日记在二十一日记载：“晚晤施乐君。”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起，斯诺就可能通过赛珍珠在她第二任丈夫主编的英文月刊《亚洲》上发表评论和译作，吹捧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为了把鲁迅等其同类当作“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推向世界，斯诺在翻译姚克的陪同下采访鲁迅。同年由斯诺夫妇在杨刚等红色文人的协助下编译的《活

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就在共产国际的老根据地伦敦出版。此书推介了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包括杨刚的自传性小说《日记拾遗》。此前海伦就在杨刚的帮助下，以“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为名发表论文，推荐接受中共领导的红色笔杆子，这篇论文作为附录编入《活的中国》。然而在红色中国，杨刚于一九五七年就被迫自杀身亡。

对《活的中国》斯诺在他的自传《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中承认：“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外国友人忆鲁迅》，第四十六页）然而当时鲁迅们“听将令”写出的宣传品让斯诺夫妇深受误导，海伦在回忆编译《活的中国》的体会时写道：“一个人只有亲身领教了这种严酷、落后、充满迷信与残暴制度，才能识别共产党人努力从基层改变中国的了不起的进步性。”因此，武际良断定，“两个斯诺通过编译《活的中国》，为他们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冒险访问陕北，探索中国革命的真相，写作《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思想背景作了铺垫。”

斯诺不仅积极配合红色势力颠倒黑白，吹捧鲁迅，还歪曲事实，宣传“共匪”，欺骗世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庆龄按毛泽东的指示，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在假牧师董健吾地带领下，通过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刘鼎，违背国民政府的禁令，秘密潜入共产国际在中国割据的苏区。斯诺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马海德则是苏区的第一个外国医生，从此分别成为中共的洋鼓

手和洋帮手。

海伦随后想到延安，但只抵达西安，于是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采访张学良后，在《密勒氏评论》等红色媒体上发表《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这之后又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喉舌《中国呼声》上发表《东北军想打回老家去！》的宣传报道。对此武际良称，“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最早向国内外公众透露出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呼声”。就是说，海伦不仅协助斯诺包装毛泽东及其共党，而且还参与共党为发动“西安事变”而搞的红色宣传。

一九三七年，海伦通过黄敬（俞启威）获知延安五月要举行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于是与去开会的黄敬于四月赶到延安。海伦象斯诺一样在苏区受到四个月的款待，采访了斯诺没能见到的朱德等共匪头目，补充了斯诺名下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和照片。海伦在延安期间，又名“七·七事变”的“卢沟桥事变”发生。

海伦协助中共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迷惑世人，她还把毛泽东对她撒的谎以《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题，先在北平出版的红色杂志上发表，后被巴黎出版的红色《救国时报》转载，为毛泽东误导国内外民众。海伦宣称，“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国的缩影。”

红色谎言贻害无穷

毛泽东借斯诺夫妇传播了无数的谎言，比如被张戎夫妇证伪的“飞夺泸定桥”和“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毛泽东此地无银三百两，居然表示，第三国际不是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外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统治。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以被通缉之身大言不惭地宣称，“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斯诺的相关宣传比如《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的照片等便在多家媒体发表。斯诺竭尽美化毛泽东，宣传共产党之能事。在中外地下共产党员比如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邵力子的协助下，恶棍与匪区被漂白，斯诺们以不同方式美化毛泽东和苏区，其中包括于一九三七年初，在北平出版发行《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也在伦敦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地下共产党员胡愈之等翻译后在上海发行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迷惑世人，改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的宣传在“西安事变”后，通过尾崎秀实在日本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以《五千英里的大进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记录》和《毛泽东自传》为题发表。

对此，张戎夫妇在《毛泽东：鲜为认知的故事》中写道，“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可是斯诺却称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和第二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不仅如此，“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

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先被地下党员译成中文加以传播，后于一九三九年在海外发行。为了混淆视听，海伦还用了匿名：尼姆·威尔斯。斯诺夫妇的红色宣传迷惑深远。外国人能被迷惑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人、中华文化充满好感，但缺乏了解，让洋鼓手能借机偷梁换柱获取他们对中共的认可。

这些借洋奴之手炮制的红色宣传品误导了中外无数的热血青年，让他们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语）的共军占领区误作自由圣地而投奔。斯诺们为中共迷惑世人，颠倒黑白，诋毁领导国军保卫中华民国的蒋中正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斯诺再次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并在报道中表示：“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寻常的安详，好像什么事情

也不会使他烦恼。他宽宏大量，同蒋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 其时蒋中正正在领导国军英勇抗日，毛泽东则躲在后方为非作歹，扩张势力！斯诺为了吹捧毛泽东，而诋毁蒋中正，但司徒雷登却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自己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民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来表达他对蒋中正的评价：

“但是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基于精神和道德。由于中国人受到留心注意他们的统治者道德水平的训练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也没有在这方面发生更为精于此道的幻灭，所以这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上个十月末是蒋介石五十岁生辰，在全中国自发了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庆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几乎普遍都在焦虑，以及当他被释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强烈洋溢着放心和欢乐。”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直在成立各种组织，包括上面提到的“工合”，支持中共，渗透民国，欺骗民众。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借国军之手清除党内异己项英后，斯诺在其报道中，继续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终于被国民政府取缔外国记者特权，被迫回到美国，与海伦一起继续宣传中共。女共党成员龚普生也于同年被周恩来派往美国，秘密搞红色渗透。罗斯福、赛珍珠等都是她的渗透对象。她后来的丈夫章汉夫则于一九二七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加入美国共产党。“文革”时，龚普生夫妇等红色卧底都遭到共产党的迫害。长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于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叛徒”投进秦城监狱，近四年后死时，身上衣衫已经破烂不堪。

当斯诺等赤色分子在美国继续滥用言论自由，大力宣传共产党，抹黑国民党之时，因相信他们而投奔苏区的无数爱国青年已在一九四二年就失去了言论自由。《思痛录》的作者，“一二·九”的参与者韦君宜就是受害者之一。十八岁的韦君宜被骗入共党，于一九三九年放弃赴美留学而排除万难投奔斯诺们赞颂的匪区。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动了消灭个人意志，树立独裁专制的“延安整风”。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虽然他是因从事违法活动被国民政府抓捕过的共产党人！韦君宜迫不得已劝说杨述，违背事实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编造谎言来向党组织坦白交代。韦君宜们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被骗上了共产党的贼船，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共产党的窃国事业。韦君宜们被迫牺牲“自己的良心”，变成毛泽东的应声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了他们的思想枷锁，他们再也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连《思痛录》也是韦君宜偷偷写下来，遭审查删节后才得以出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出版。二战后担任过国共矛盾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胡适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的《大华晚报》即开始翻译连载，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可是，这本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被禁止在大陆出版。国民政府和共产极权谁是谁非，谁怕真相，一目了然！已是耄耋之人的翻译周惠民为了让读者认识“一位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终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认为虽是一个美国人，但

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司徒雷登”，只好把自己的译作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在互联网上发表。

司徒雷登在前言中说，“我在中国的建树使我有名声；在那些建树显然被摧毁的时刻，我出任了我国的驻华大使；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虑还都是心灵上的。我知道许多陷在（大多数是自愿留下的）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被粗暴地对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监狱，有些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触自己的中国和其他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有少数在这种对待下死去了。千百万中国人受到的对待更为悲惨。许多被处死，许多因饥饿而死去。最近听说不少于四千万人被强制劳动。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在流亡中受苦受难。许多其他的则盼望能够流亡在外，但是却无法逃脱出来。”

胡适在序言中表示，马歇尔作为调停人“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胡适认识到了美国政府的错误，也为美国

政府指出了挽回错误的作法：不承认中共暴政！他继续写到：“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毋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在我’。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

自欺欺人的斯诺

在“红星照耀的中国”，毛泽东独掌大权的二十七年里，斯诺三次被毛“照耀”。第一次是在毛泽东搞“大跃进”导致四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中共一边将西方媒体对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一边把斯诺之流招到大陆。斯诺一九六零年到中国后，一如既往地中共欺骗世人。他在采访记中写道：“为了庆祝我们的会面，他（毛）和我对饮了少许贵州出产的烈酒‘茅台’。他还拿出中国红酒奉客，这种红酒在华北的酒庄有售，售价为人民币一元，数量不限。”斯诺们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出口转内销”，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

发表，作为中共抵挡民意的思想大棒。

这次斯诺在中国公款旅游了五个月后，于一九六二年，发表了《大河彼岸》。他专门针对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西方媒体对红色中国存在着饥荒的报道表示，“据我所知，没有一位非共产主义者在访问中国期间提供出经证实的有关饥饿的例证”并断言“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斯诺闭着眼睛讴歌暴君和暴政下的惨状。斯诺认为，毛泽东对西方文学的知识比任何其他西方统治者对中国文学的知识要多得多，斯诺声称，“在整个国家中，我看到每个农民的家庭都起码具备以下各种家庭设备，而且超过一件以上：壁钟、收音机、暖水壶、各种家什、电灯、充足的被褥、多余的衣服、甚至书籍等……”！

鉴于在西方，红色中国是专制国家、独裁国家、警察国家和搞个人崇拜的国家的同义语，斯诺就胡诌什么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的基因，不可能让它一下子消除。

总之，斯诺很讨毛共欢心，得以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到十月，再次访问已害死了几千万国民的共产暴政。这次毛共不仅发了毛泽东与斯诺会见的消息，还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同斯诺会见的大幅照片。把斯诺称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

这之后，斯诺分别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提出到中国访问，遭到拒绝。但一九七零年早春，周恩来却要毛共驻法国大使黄镇尽快促成斯诺到中国访问。斯诺既是“文革”

前被允许到大陆的最后一位外国记者，又是“文革”中被毛泽东亲自邀请到大陆的外国记者。

按照窦应泰发表的《黄镇与美记者斯诺等三位著名友人的访华内幕》所说，邀请斯诺，是因为“主席有许多重大的见解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传达到西方，传递到世界去。经过我们反复考虑，最后才认定斯诺先生是最为合适的信使”。

一九七零年八月十四日夜，斯诺夫妇抵达中国。开始了中共需要的第三次红色之旅。

这次斯诺与第二任妻子路易丝·维勒·斯诺被邀请参加共产党的国庆，象毛一样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喇叭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见入选的群众高呼毛泽东自己拟定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斯诺夫妇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还于十二月十八日与斯诺长谈，借以向外界传递信息。毛的身边人吴旭君名下的文章《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中透露，毛向吴表示：“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斯诺是毛需要的红娘。毛告诉吴，“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哪里吹作用还大呢。”

斯诺还被毛泽东用作他搞中共内斗的道具。毛在与斯诺谈话中，针对林彪因想讨毛欢心而提出的“四个伟大”，说：“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

毛的这一讲话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发给中共全党学习。

我研读过这个谈话纪要，但作为“文革”同龄人，我只能得出这不是两个正常人在对话，而是两个非正常人在自说自话。

我只好请教“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她回答：“我看到过这些话所引起的后果或所指代的现实，感觉很不一样。

比如，毛说拿老师‘开刀’，我在《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引用过。真的杀老师。

比如，毛说‘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当时就取缔小型农贸市场，农民就不能卖自己的产品，成为彻底的‘奴隶’。比如，毛说‘真正信教的很少’，他就敢愚弄煽动群众‘革命’。

比如，毛说，‘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当时真的就是把一大批共产党干部都‘打倒’和‘斗争’，手段很残忍。”

就是说，生活在瑞士的斯诺可能也象我一样根本不知毛在说啥，不过这个纪要泄露，他确实不是什么记者，而是共产奴才。请看，他对暴君的表白：“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一个称职的记者就是要竭尽全力从公众人物口中获知信息并

公诸于众。只有奴才会只按主子的意思行事写作。

而毛泽东则在会谈结束时表示，“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确实，毛泽东从一九三六年起就对斯诺撒谎，而斯诺则一直忠实地传播毛的谎言，沦为共产党的奴才，毛泽东的话筒，到死方休。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的七十七岁生日前一天，也是西方的圣诞节第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大标题，发表毛泽东在国庆节同斯诺夫妇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斯诺又一次帮助中共欺骗了国民！此时旅居大陆的外国共产党员比如爱泼斯坦已被毛共投入大牢，中共称之为“美国友好人士”的斯诺则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视为危险的共产党徒。斯诺象史沫特莱一样因其红色劣迹在美国受到追查，史沫特莱死在英国，斯诺则死在瑞士。

一九七一年春天，斯诺将他在北京与毛泽东的长谈，整理成文，以《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为题发表，代毛泽东向自由世界表示他欢迎尼克松以任何名义访华，再次为中共欺骗世人，获得承认制造舆论。这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

家内幕新闻”。一九七二年，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前一个星期，中国的大年初一斯诺死于癌症。随尼克松访华的有七十二位记者，但中共却不敢让他们谁采访毛泽东。可是，这不影响他们中的索尔兹伯里以斯诺为榜样，在中共的另一个美国朋友谢伟思的协助下，于一九八五年写出《长征一闻所未闻的故事》，表明他历来亲共，无论是苏共、越共，还是中共。

两任妻子两种选择

海伦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回到美国，一直从事红色宣传，促使美国没能执行既定国策，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导致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红色中国成立在即，“两人工作队”也完成了使命。离婚后，海伦独自留在夫妇俩靠出卖良知买来的房子里，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虽然一九五零年，美国第八十一届国会就通过了反共的《麦卡锡法》，但一九五二年，海伦还是以《红尘》为名，在美国发表她在延安采访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的红色幻象。在红色势力的影响下，一九七一年，美国政府不再阻止中共暴政强占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海伦曾专程前去欢迎中共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黄华到纽约赴任并撰文加以祝贺。

第二年，《红尘》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邀请海伦以《续西行漫记》作者的身份到大陆访问。这次访问后，海伦写了美化红色暴政的《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一九七八年，海伦再次到中国，她沿着四十多年前她与斯诺在中国走过的红色路线，拍摄了一部电视片并撰写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一书。

一九七九年初，禁止共产党入境的美国，正式接待第一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访问。在这八天里，邓小平专门会见了海伦。这一年，《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也在美国再版，继续迷惑世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后，西方各国都抨击和制裁中共暴政。海伦却写信给老布什总统，不同意美国制裁中共。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制裁政策，海伦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发起成立“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美国分会”，并同一些红色美国人联名写信给老布什总统，呼吁通过这一组织，给共产党独裁的中国贷款。

因此，中共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名义，于一九九一年专门授予海伦所谓的“理解与国际友谊奖”；一九九六年，又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海伦一九九七年死于美国后，龚普生等中共官员出席她的葬礼。海伦的红色宣传品在美国缺乏市场，但还继续由中共按需所用。她的亲友还是中共的统战对象。

海伦虽然左得出奇，但影响不如斯诺。在斯诺病重时，毛泽东甚至派了马海德带着医疗组去瑞士给他治疗。马海德当年与斯诺一起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到苏区为中共效劳，后娶了个投奔延安的女演员，终身在大陆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直到“文革”中妻子被抓，家被抄，他已被剃了光头，依然至死不悟。

斯诺死后，根据其遗愿，中共当局将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他曾执教过的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中共夺取政权后，燕京大学于五十年代被撤消，校园被北京大学鸠占雀巢。对此司徒雷登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到：“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中国，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自从他们接管了之后，前一种就少了下来，后一种却多了起来。我一生和我的教会和教育同工们的努力，是奉献给使好的变得更好，使坏的变得不那么不好。可以眼见的那些努力中相当一部分的证据，已经瓦解幻灭了：有些工厂、设备、教堂、学校、建筑物和医院被破坏了，更多的一些被共产党为他们的目的而占用了。”

虽然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想葬身燕园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不过斯诺的灵魂在未名湖畔肯定不得安宁，因为仅“文革”，北大就有六十三人死于非命，他们的冤魂肯定会找毛泽东的洋鼓手讨说法。

斯诺离婚后与小他十五岁的美国女演员路易丝·维勒结婚。维勒告诉曾拜访过他的一名大陆学者，“周恩来参加骨灰

安放仪式时，她感谢中共派出医疗队，周的回答是，这个不值一提，我们为斯诺先生所做的，比起斯诺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相差甚远呢”。

确实如此，斯诺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在斯诺率先投入红色宣传，讴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前，共产党给人的印象就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群“流寇”。即使通过斯诺等洋奴的宣传，中共在国际社会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它在中华民国还是无足轻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近两亿五千万中国人参加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他们投票选举国大代表，凡获得五百个签名的人，都可被选为国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的选民参加选举，只有中共占领区或曰苏区的居民无法参加选举。对此美国的《时代》杂志十二月一日报道说：“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识字与否都可参加选举，只要他们没有因为叛国，政治腐败或吸毒坐过牢。但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而在中共的占领区没有举行选举，所以参选的人数较少。（……）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如果共产党打赢了，就不会再有选举了。”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大选选出了二千九百六十一名国大代表，比选举法少八十四名的原因是中共的干扰。

共产党打败了以实现宪政为目标的国民党，靠的不是民心，而是宣传。共产党靠大大小小的斯诺和鲁迅，颠倒黑白，欺骗世人。被红色宣传诬蔑成独裁者的蒋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召开的国代表大会上，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就是说，得人心的是蒋中正，

而非毛泽东。连“为人民服务”都是蒋中正先在中华民国提出来，后在红色中国被收入毛语录的。

好在斯诺的遗孀维勒后来因“六四”屠杀与中共决裂。她同情“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曾拒绝中共的访华邀请。二零零零清明，她以旅游签证去北京给斯诺扫墓，想顺便去探望失去爱子的丁子霖并面交人道捐款。行前她通过媒体发表声明称“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可是她与儿子遭到中共警匪的无理阻拦。她在结束这次私人之旅时，发表声明说：“我不能继续对基本人权受侵犯之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会支持我的行动。”她还决定在中国的政治状况没有改善之前，再也不去大陆。从此，斯诺遗孀也被打成“反华势力”。因此，有大陆80后撰文表示维勒是《一朵鲜花插在了斯诺上》。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大陆建立的是至今奴役人民，践踏人权的红色暴政。斯诺的同类不少，也不乏后继者，揭露斯诺的目的，一是告诫中共的洋鼓手，红色劣迹会被历史记录下来，二是希望有助读者识破洋鼓手。

第四章 毛妾江青的洋知己维特克

一九三三年，十九岁的山东女子李云鹤（一九一四年－一九九一）在男友黄敬（一九一二年－一九五八）的影响下加入非法组织共产党。不久黄敬被捕，江青前往上海活动并参加红色演出，取名蓝苹。一九三七年，蓝苹投奔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名江青，替补负气出走苏联的贺子珍，成为毛泽东枕边的战友，也代杨开慧让贺子珍尝到被抛弃的痛苦。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人看到的女代表是帮助共产党从高层颠覆了中华民国的宋庆龄。可是象斯大林一样的毛泽东，窃取国家政权后既不遵守诺言，也不爱民如子。一旦政权在握，立即祸国殃民。无论谁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多大功劳，无一不在红朝中遭到迫害。

宋庆龄在民国时期，违背国民党的宗旨和中华民国的利益为共产党效劳，几乎没有受到惩罚，然而在共产党当权后，宋庆龄虽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而实际上却沦为只起摆设作用的木偶。到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宋庆龄连自己父母的坟墓也保护不了。

自称是毛泽东的“一条狗”的江青，则一跃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象毛泽东一样把对手往死里整。在毛泽东

令刘少奇等共党高官家破人亡之时，江青也令王莹等红色艺人惨遭灭顶之灾。王莹在中华民国和美国为共产党当红色卧底时，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命丧红牢。江青象个迫害狂，情敌孙维世要害死，恩人徐明清不理睬，甚至专门去捉拿困难时帮过她的平头百姓。比如，江青在上海时受到她房东的保姆秦桂贞关照和接济。一九六八年，大字不识的秦桂贞忽然被投入秦城监狱，一九七五年，病得气息奄奄时才背着“特务”的黑锅被释放。可能江青怕秦桂贞泄露她在上海的丑事。而有的人比如《黎明的河边》的作者峻青被江青投入监狱达五年半，但峻青说，他与江青从未见过面，既不相识，也无恩怨。他至今都不明白，江青为什么要抓他。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则证实，江青是个被毛通奸伤害，又怕被毛抛弃而心理变态的女恶霸。

然而当中共的统战对象美国人维特克被邀请到北京后，却与江青一见如故，一拍即合。维特克一九三八年生于美国。一九七零年在加州柏克莱大学获得文科博士学位。从相关资料判断她算“六八年人”、美国左派、女性主义者。在德国除了《江青同志》几乎找不到与维特克相关的信息。求助一名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文友后，得到一份维特克简历。然而这份二零零二年制定的当代英文作者的简历却只含维特克一九七七年以前的业绩。就是说，维特克除了《江青同志》外可能再没有别的作品。维特克在四十岁那年，也就是《江青同志》出版后的第二年曾与比他小五岁的同行黎安友（Andrew Nathan）结婚。“《红都女皇》出版传奇：张颖回忆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透露，“维特克因《江青同志》一炮而红之后，没有教书了，后来和丈夫

黎安友（张颖译为纳森）离了婚，她曾打算写一本有关上海的小说，但未见出版，再后来听说精神抑郁，身体不太好，很少露面。她没有像那班受中国红色狂飙感染的美国左派后来成为非共右派那样活跃。”

第二个斯诺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对付苏联，按照红色势力的意愿结束支援越南人抵抗共产党的战争，在以基辛格为首的暗红势力推动下，到达与苏共闹崩的北京，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与蒋中正相比，尼克松很渺小，因为蒋中正拒绝苏联的诱惑，宁可放弃“反攻大陆”的理想，也不背叛美国。而美国则在尼克松的带领下违背“不承认主义”，逐步承认红色暴政，抛弃中华民国。

美国总统的到来促使中共恢复了许多常态。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到北京为尼克松开路时，古都北京被中共糟蹋得连花草都没有。钓鱼台宾馆的花圃里种的都是玉米和菠菜。但尼克松参观时，“反帝医院”已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被中共关在国门里蹂躏的大陆居民也因此获得一线希望。

当被关在红色牢笼的大陆人包括洋毛分子韩丁、寒春兄妹的儿女卡玛、阳和平等纷纷趁机投奔自由的时候，不知珍

惜自由的西方毛派也成群结队地来到异国他乡追名逐利。

在中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下，中共对外友协邀请维特克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一日访问红色中国，名义上是让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并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也就是说中共希望通过维特克宣传中国妇女被解放的假象！

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能得到中共的款待是因为她不仅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算中共的统战对象，而且她参与过《红旗飘飘》的翻译，是个已有红色劣迹的研究中国的美国人。

据中共媒体对当事人张颖的采访“回眸《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称，当时在中共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的一再要求，中共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对此，周恩来于八月十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八月十二日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

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二零零五年，中共在香港的凤凰卫视制作了专题片《“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在这个分上下集的电视片中，八十三岁的张颖口述了不超越红线的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在张颖看来，维特克与江青气味相投。江青差点拥抱维特克，而维特克则说，“如果我到了中国，没有见到Madam江青，那我还算来过中国吗？”

时年五十八岁的江青见维特克对她那么倾心，便对她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三十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此前江青曾有意请拍摄《愚公移山》的荷兰导演伊文思为她拍一部记录片，请被周恩来迷得来围着共党转的混血女韩素音为她立传，但都遭到婉拒，而维特克却一听江青需要写手，便立即表示，“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大的愿望。”身为中国现代史学者的维特克视江青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她奉承江青也得到不少实利。可不，江青当时马上延长了被周恩来定位为礼节性

的会面。会谈到晚饭时间，江青请维特克吃了最好的中国美食，还向她展示了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扭曲传统舞台艺术而成的八个“文革”样板戏中的《红灯记》。其时，江青已派人到她的家乡选拔小学生用来培养体现其意志的芭蕾舞演员。其中就有一九八一年在美国恋人的支持下改变回国计划，因此被中共领馆绑架的芭蕾舞红星李存信。李存信的个人传记标题为《毛的最后一个舞者》，准确地说，应该是江青培训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中的第一个倒戈者。

总之，江青那时正野心勃勃，出自江青之口的言论令张颖觉得“不堪入耳”，但显然对维特克很有吸引力，这位来自美国的客人自愿奉陪江青不分白天黑夜地信口开河了一个星期。

在无人能阻止江青破例请维特克到广州会谈后，周恩来特意交给张颖一本线装的《鲁迅诗集》，要张颖传达他的意见，“只谈一次，就只能谈文艺问题”，如果江青“要谈三十年代，多谈鲁迅”。但在张颖转达周恩来的意见时，江青一下子火了，把《鲁迅诗集》摔在了地上。这既表明江青不甘受周恩来管制，也透露连江青也没有自由。

江青在北京见到维特克时就透露，“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邓颖超、康克清（……）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

维特克虽研究中国问题，但她的中文看来不怎么样，她与江青交谈也象毛泽东与斯诺交谈一样需要翻译。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时间累计长达六十多个小时。谈话结束之后，江青答应维特克把录音记录译成英文给她。

然而江青不是毛泽东，她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维特克未能如愿以偿。对此张颖在回忆录中说，“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反复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十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张颖因此向邓颖超汇报了整整三个小时，张颖认为，“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那影响确实太坏了。”

于是，一九七二年的岁末，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宣布“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后，相关材料便全都被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没有通过毛周的审查后，被油印成《关于红楼梦问题－江青同志与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传到社会上的部分谈话内容也遭到中共当局追查。

因为迎合江青，维特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饱尝了红

色特权的滋味。维特克回美国后，免不了发表这次红色之旅的大陆见闻，她的笔下自然不会出现被毛泽东夫妇利用来打倒刘少奇们后抛弃在农村的几千万大陆知青的处境。能够用英文与维特克交谈的共党女官比如王光美那时正在红牢中经受十二年的煎熬，王光美的遭遇就能揭穿“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是个伪命题，因为再有贡献的男男女女在共产革命中都没有人权，谈何地位？打死打残的无数“文革”受害者也不可能在维特克的关注范围。

维特克等不来谈话记录的英译稿，只能按自己的速记稿于一九七七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江青同志》，讲述了她眼中的江青和在红色之旅中的观感。其时江青和姚文元等维特克见过的“文革”红人已被投入红牢，这对维特克似乎没什么影响，在她眼里江青还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同志。据张颖透露，江青慷党天下穷苦百姓之慨送维特克的礼物有几大箱子。

一九八八年，维特克在一个采访中还说，“跟江青共度的这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鲁迅、毛泽东的同类

江青虽拒听周恩来的意见，自己与维特克在广州的豪华别墅中漫谈了一个星期，话题广泛，甚至说了贺子珍的坏话，但江青还是没有忘记周恩来的意见，向维特克宣传鲁迅，在抬高鲁迅时也趁机自我吹嘘。江青到上海投身红色文艺活动后，成为一颗“闪闪的红星”。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病逝时，其时还叫蓝苹的江青参与了共产党利用鲁迅丧礼来向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的红色送葬队伍。江青对维特克透露说，“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逝了，我们组织了上万人的大游行，也就是送葬的行列，我们绕着人多的大马路走，我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我一点都不怕国民党特务，走在最前面”。江青确实不用怕国民党特务，国民政府的执法机关已被共产势力渗透，即使江青们的非法活动被发现，江青们也会逃脱惩罚。

二十二岁的地下共产党徒蓝苹还撰写了一篇红色悼文《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文中写到：“我看到高尔基生长的地方，又看到他老年来那种刻苦的精神，最后那个占领全银幕的，紧闭着眼睛的头，使我象今天一样的噙着眼泪恳求着：‘高尔基！再睁一下眼睛吧，那怕只睁一下！’” 鲁迅确实算中国的高尔基，因为两者分别是苏共和中共的最大笔杆子，都是共产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红色样板。蓝苹的悼文很有共产特色，她不祝愿死者安息，而是违背常理地要“死者再睁一下眼睛吧”！

张颖反感江青自我吹嘘她与鲁迅的关系。而江青所言应该不假，“鲁迅对我是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革命的女性……” 史实证

明，江青与鲁迅和毛泽东的为人文一致，堪称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都目无神灵，狂妄自大，好强斗狠。江青写在赠送维特克的照片《庐山汉阳峰》后的诗句就是她的自我写照，与鲁迅和毛泽东的自画像异曲同工，霸气十足，缺乏善意。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鲁迅 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毛泽东 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一九七五年，在大陆流传过《红都女皇》的手抄本，对大陆百姓尤其是“文革”一代颇有启发。这之前，江青在大陆媒体上出现时，全是光辉形象。在千百万红卫兵眼中则是“毛主席派来支持革命小将的人”。

对此冯骥才在《老红卫兵的心路历程》中写到，“可是到一九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为在私下里借了一本《红都女皇》，是个手抄本。看完之后马上还给人家，可是我心里感到迷惘了。……自打林彪死了后，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别快就是啊。这时再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会的丑恶现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来。”

而当《红都女皇》在香港露面时，新华社香港分社报中共中央，相关人员审读后却断定内容与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一致，是维特克江青传的中文版。据称毛泽东阅后大怒，江青从此失势。

有相关文章透露，“一天庄则栋回家，发现床头上江青为他拍的照片被妻子鲍蕙荞取下了。鲍蕙荞告诉他：‘小庄，

你听说了吗，毛主席批评江青了，让她今后少露面，少管事，少讲话。她犯了个大错误，跟一个外国女记者泄露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那个外国人写了本书……’”

“乒乓外交”的主角

庄则栋（一九四一年生）是第一个连续在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中共为了让其暴政得到世界承认，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搞了许多见不得人的活动。一九七一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周恩来特别召开会议，要求这次参赛的人员“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同时周恩来要在座的人“动动脑筋”。于是，当美国运动员科恩跨上中国队的车时，庄则栋立即主动和他握手、寒暄，并送他一块中国杭州织锦留作纪念。这一事件在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与苏联为首的红色暴政对峙的冷战中，立即成为自由媒体的焦点。

比赛还未闭幕，毛泽东就决定邀请美国队到中共国。美国国务院接到驻日本大使馆《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立即向白宫报告。于是，在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二十二年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些美国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一九四九年以

来第一批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美国人。

如果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言，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国侵略政策”被“中国人民打败了”属实，那么，共产党怎么又把“美帝国主义”请回来了？周恩来还特别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

第二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这就是中共利用运动员搞的所谓“乒乓外交”。中共因此达到促使美国撤下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承认霸占中国的共产暴政的目的。被利用的庄则栋因而受到中共提拔，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部长。

庄则栋作为世界冠军和体委主任却难免被江青招去陪她打乒乓球的差事，也因此成为大陆百姓用来抵制红色样板的黄段子中的男主角之一。

对中共取得美国承认功不可没的庄则栋却在一九七六年被打成“四人帮”的同党，遭到迫害，差点悬梁自尽。

有“文革”一代撰文表示，他“当年在紫云山上当知青时，也曾在山友房间看过《红都女皇》手抄本，说是江青让某个斯诺式的外国女作家写的‘自传’，其中说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每逢毛泽东演讲，她就有意坐在第一排认真地做笔记，而且演讲一结束就过去提问题。而毛似乎终于经不住这个聪明好学、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的诱惑，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由此亦对江青如此损

害伟人形象顿生反感。事实上，中国人对江青的印象，就是从《红都女皇》事件开始变坏。在此之前，并不了解高层斗争内幕的一般老百姓对这位毛主席的夫人和‘文化革命的旗手’，都是怀有一种朦胧的敬意，社会上基本没有听到对她有什么非议。”

从标题和产生的效果来看，《红都女皇》不是红色宣传，而是黑色讽刺，所以，此书可能会招致毛泽东对江青发怒，毕竟一国不容二霸。

无论如何，一九七五年前后流传的《红都女皇》和与此相关的小道消息证明江青不得人心，这给华国锋们在权力斗争中取胜制造了舆论，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虽然可以阻止医生及时治疗周恩来的癌症，让周死在他的前面，但他也象斯大林一样无法摆脱天命。八三四一是毛的警卫队的番号，这是毛从一位道士处得到的够他受用一生的数字。毛在八十三岁那年，操纵共党四十一年后，带着满身罪孽离开人世，外界才知何谓八三四一。

毛泽东尸骨未寒，江青等“四人帮”就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被当作替罪羊抓捕。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给江青定的罪名之一居然是她在与维特克的谈话中“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红都女皇》成了证据。

《江青同志》的谬误

维特克的江青传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披着军大衣的侧影。书前印着上面提到的江青题写在赠给维特克的庐山汉阳峰照片后那首诗的手迹。

这本书既没有象《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畅销，也没能让读者投奔中共，毕竟共产革命象江青一样已是昨日红星，江青自己也陪王光美成了红牢女囚。但维特克无疑是给江青唱了一首挽歌，让不明真相的读者误把害人精当成了牺牲品。

二零零六年，在“文革”四十周年，江青下台三十周年之机，《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在香港出版。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是《红都女皇》。

其实，《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不相干。《红都女皇》的作者不可能是维特克，因为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不是黑色讽刺，而是粉红宣传，我在大陆的一个毛派网站浅尝辄止，实在不愿费时。

在《江青同志》中能够显示维特克是史学者的地方在于，书中罗列了延安时期的外国访客对毛泽东身边的女人的正面描述，其中也提到了斯诺：“每一个外国观察家都根据他

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看江青。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中国西北报告中说，毛泽东从来不强迫自己的妻子会见来访者。因此，斯诺的报告中有关贺子珍与江青的记录也是只言片语。斯诺因此而失去一次为江青作传的机会。但是，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中，斯诺加入了有关江青背景的传记材料。书中有些摘自秘密来源上的有关江青生平的断言，与她后来履历表上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斯诺在延安与江青的会面很短。那是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几个月之后，斯诺期待已久的一个时刻。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江青是一个苗条而又富于吸引力的少妇，‘她扑克打得很好、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厨娘’。”

除此之外，维特克照搬连张颖都质疑的江青说法，成为江青的洋话筒。维特克写到：“一九三五年仲夏，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七次大会，王明依靠莫斯科的权威，对毛泽东的每一种主要观点都提出了反驳”。“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可能，主席仍显得气量宏大，每每在王明遇到危险的时刻去拯救他。”

还原了被斯诺们美化的毛泽东凶相的张戎夫妇却查证，为了除掉异己，毛甚至给王明下毒！

维特克还不加思考地转述：“江青说：‘如果说实话，王明不像个中国人；而据此看来，虽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人，但她比王明倒更象中国人。’”

王明确确实不象中国人，因为王明和康生等都是苏共培养出

来的斯大林分子，但康生变成了毛的追随者，王明一直是毛的挑战者。所以，江青要贬损王明。被江青称赞的斯特朗则是毛泽东的洋喇叭。毛泽东就是通过她向世界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言。

一九二五年，斯特朗第一次到中国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后，就一直从事吹捧中共的红色宣传。一九五八年，斯特朗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第六次到中国，并从此定居北京，其时毛正发动导致至少四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而斯特朗则为毛主席编《中国通讯》，美化共产暴政。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后，周恩来派专机送了一批红色记者去拉萨，斯特朗也是其中之一，是周恩来点名要她去的，并给她派了个护士。于是，她又写了《西藏农奴站起来》。斯特朗不仅善于写作，还乐于表演。《“文革”中的洋造反派》透露，“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照片：毛泽东为一个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太在一本《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个外国老太脸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胳膊上戴著一个醒目的红卫兵袖章”。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又在《人民日报》上报道：“毛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因此，斯特朗与史沫特来一样在中共的红榜上名列斯诺之前。不过在江青表扬她时，她已于一九七零年在北京去见马克思。

维特克最可耻的地方在于她居然为“延安整风”评功摆好。《江青同志》写到，“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一个国民背景。为了要把他的革命信息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

头脑中，毛泽东采用了一句大众语言，叫作‘治病救人’。如此通过再教育与心理手法来治理人们的头脑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之处。斯大林采用的是臭名昭著的肉体残害方法来对付不同政见的‘肃反对象’及其他无用之人。当斯大林的处理方式带有沙皇传统，毛泽东却深入地探寻了中国历史的经络。像可以把任何人都能教会的孔夫子一样，毛泽东则可把任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或者称作‘思想’改造好。跟随毛主席，也就是跟党走并不是不同宗教的转变；也就是说：不是要一个人因‘被劝说’从而放弃其一生的信仰与行为模式，再去接受一种全新的信仰与行为模式－特别是这种不可避免地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信仰。刘少奇的那篇精练的理论短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最为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列举了这种转变的历程。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不断革命的理论读物精粹。”

这位身在自由世界，能够获取各种信息的美国学者居然认为毛泽东搞的精神虐杀加肉体残害比斯大林搞得高明，因为毛泽东美其名曰“治病救人”、“思想改造”？！维特克还把践行“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孔子与反孔批孔，自视“马克思＋秦始皇”的毛泽东相提并论。这说明维特克不仅是江青的洋写手，还象江青一样是个毛分子，失去了正常的思辨能力。维特克也忽视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刘少奇缺乏论修养的资格，他自己拍毛马屁，帮毛整人，到头来也挨毛整，其时已被毛整死的事实！

维特克还写到：“而周扬，这个江青十分怨恨的人，却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毛泽东在文化事务方面的掌权者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稳固地位，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时才被江青打了下去。”维特克的轻描淡写“被江青打了下去”掩盖的是以周扬为首的八十多位红色笔杆子及其家属的悲惨遭遇。周扬们被游行、批斗、隔离审查，周扬自己很快被投入秦城监狱，遭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周扬从此失去长达九年多的人身自由，并被迫与家人断绝音信，连他在北京的户口也被注销。

不只是遭到鲁迅抨击的周扬等人在中共国遭受迫害，当年得到鲁迅支持的胡风等人下场一样悲惨。连鲁迅二奶许广平也在“文革”中因心脏病发作时得不到及时治疗去见鲁迅。其时是一九六八年，许广平既是中共党员，还有“人大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红色官衔。这之前，许广平既象江青一样助毛为虐，仗夫欺人；还象江青一样唯毛是从，吹捧与毛泽东使用同样的强盗逻辑的鲁迅。许在“文革”一开始便发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表示“我深深感到，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一九六六年十月，当中共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时，许广平还指着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大喊：“同志们，就是他，郭沫若！当年竭力反对我们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而江青则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当面指责八十二岁的郭沫若“对待秦

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如果说毛泽东与鲁迅是借国际共运登上中国政坛与文坛的恶霸的话，那么，江青与许广平就是在他们的语言暴力下训练出来的狗腿子。知夫莫如妾，看妾便知夫，是一再验证的人生经验！

上述宣传片说，张颖丈夫章文晋一九八三年出任中共驻美大使后，一九八四年，张颖在美国碰到维特克。维特克对她说，还想写本有关江青的小说，希望张颖提供帮助。张颖则不帮她，也不见她。如果此话属实，那么，维特克比张颖还红，至少张颖知道厌恶江青，虽然江青曾当着张颖的面对维特克表示自己“敬仰毛主席”，是毛的“哨兵”。

一九九二年，张颖从美国回到大陆不久，接到陈香梅寄给她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

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张颖看到这篇采访以后，觉得维特克“好像并不是一位历

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二十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曾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啦，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篡改的。”据此来看，是维特克促使张颖自己动笔写下相关回忆。

据《江青同志》来看，维特克不了解中共党史，她不知道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江青不可能保住喜新厌旧的毛泽东妻子的名份，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透露，他“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在四十六岁那年，赤身裸体地带着一副镣铐死于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简言之，周恩来对毛江卑躬屈膝，哪有胆量指使张颖写作《红都女皇》，张颖又怎么可能写得出《红都女皇》？

不过，维特克认为张颖是“周恩来的特务”还不离谱。

中共媒体称中共外交部有“二章一乔”之说。“二章”就是指章汉夫、章文晋，两人都任过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一乔”指乔冠华，任过外交部正副部长。

一九三六年，在共产党策划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变强迫国民政府停止落实剿共计划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徒被陆续派到国民政府心腹重庆暗中发展红色势力。这些周恩来随从中就包括二章一乔和在周恩来夫妇的撮合下后来与他们结合的龚普生、龚澎姐妹和张颖。二章一乔夫妇都是在红色宣传的迷惑下误上共产党贼船的韦君宜同代人。一九二七年，十四岁的章文晋在外公的资助下到柏林留学，不幸来到国际共运的中心，成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成员。而张颖一九三七年，十六岁就从广州投奔苏区。

鲁迅死前，曾公开嘲讽代表共党在上海领导文艺界的“四条汉子”周扬等，但鲁迅死后立即被共产党打造成红色偶像。一九三八年，毛泽东还在延安发起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还当上鲁艺副院长，专门以鲁迅的狂人精神赤化投共青年，张颖是其中之一。张颖于一九三九年被派到重庆曾家岩中共据点“周公馆”，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具体工作是协助周恩来渗透文化界。章文晋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派到重庆，不久，成为周恩来的秘书和英语翻译。他们都有幸逃过“延安整风”。在周恩来夫妇的撮合下，张颖于一九四七年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嫁给与江青同年生同年死的章文晋。

在中共获得美国承认的过程中，最早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中共外交官就是章文晋。在乔冠华和龚澎的继任章含之被打成江青同党而遭整肃时，章文晋夫妇却因是周恩来夫妇的心腹而高升。

二章一乔夫妇都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作过地下贡献，也都无一例外地在血色中国遭受迫害。章汉夫、龚澎和乔冠华都是含冤而死。二章一乔夫妇在中华民国都敢从事非法活动，但在所谓的新中国他们全都不敢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他们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整人运动。五十岁的张颖虽身为中共外交部高官，但江青叫她穿裙子，她就不敢穿裤子。张颖夫妇即使人在加拿大还老老实实在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因而能赖活下来。所以，一九八三年，当开始有中共外交官弃共投美时，章文晋还能被邓小平任命为中共驻美大使。一九八六年，黄敬大儿子，中共国安高官俞强声也弃共投美。俞强声促使先在中华民国，后被派到美国为共党效劳的金无怠被捕。金无怠是龚普生、龚澎姐妹的校友，也是在燕京大学就读时被赤化。金无怠为共党当了一辈子两面派，最终却遭邓小平否认而在狱中“自杀”。

张颖不是金无怠，不是职业共特，但她是共党高官，她讲的话，写的书都有局限，不可全信。比如，张颖敢于表达对江青的憎恶，不仅因为江青血债累累，蛮横无理，而是因为江青已经被当作替罪羊被共党抛弃。张颖不敢质疑与江青是一丘之貉的鲁迅和毛泽东，还一再吹捧推崇鲁迅，紧跟毛江的周恩来。难道张颖不知道，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午，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的所谓“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上吹捧江青，当众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

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周恩来还喊过“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的口号。

尽管如此，张颖还是比维特克了解中共，她的相关著述比《江青同志》更值得参考。比如，从她的回忆录《外交风云亲历记》中可以获知，当时斯大林怕美国军事介入，要求中共与国民政府谈判。但马歇尔却向周恩来透露美国无意介入，于是中共才敢把内战打下去，直至国民政府撤到台湾。

《江青同志》表示，“在江青为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作的强烈辩护中，她说她自己一直是艰苦朴素的。江青说：她第一次到上海时，住的是一座古雅的洋房；在延安，她住的总是土窑洞。她和主席吃的穿的都和劳动人民一样。尽管如此，她还是被中伤为一个生活方式奢侈的‘反革命分子’！”张颖至少知道江青的自我矛盾，而维特克却似乎认识不到，江青有多么歹毒，多么荒谬。否则，无法理解维特克对江青的态度。从《江青同志》的序言中可以获知，邀请维特克免费做红色之旅的是中共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妻子何理良。一九七三年五月，何建议她不要为江写个人传记，而写一部革命史，江只占一、二章；一九七四年一月，何甚至向维表示如果她答应，中共将给她奖金。但维特克却加以拒绝。

值得一提的是，何理良的父亲何思敬（一八九六－一九六八）于一九三二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为共产党颠倒黑白作了大量文字工作，比如，他驳斥蒋中正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抵制国民党推行宪政，因而毛泽东曾说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家”！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何思敬却在他任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被活活打死。时年七十二岁。何思敬也难免死于“文革”，成为至少一百七十二万个“文革”受难者中的一个。

维特克不是一个地道的史学者。令人佩服的史学者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的作者王友琴。在美国芝加歌大学执教的王友琴利用业余时间，花了二十五年的义务劳动收集了何思敬等“文革”受难者的惨案，让后人得以获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及其帮凶“江青同志”的罪恶。

第五章 《天安门》的红色烙印

共产党能为祸人间至今的一个原因是善于撒谎：针对不同的人，撒不同的谎；在不同的阶段，撒不同的谎。撒谎者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让人应接不暇，难以辨别。

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死时，共产党已通过各种名目的整人运动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但因为会撒谎，几乎无人质疑共产党的合法性。

八十年代，“文革”中生长的一代中国人进入大学。他们大多没有恐怖记忆，勇于追求自由。一九八九年，中共的蛮横无理再一次促使莘莘学子奋起捍卫人的尊严，他们的无畏和奉献让天安门广场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促使海内外华人获知撒谎和施暴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得以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六四”屠杀虽然又害死了几千中国人，但这一次因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的合法性终于荡然无存。

以柴玲、高行健和戈扬为代表的三代中国人从此与共产党决裂。在华人中第一次涌现唾弃共产党的浪潮。

天安门一代唤醒了无数中国人，其中包括我。与柴玲同龄的我，“六四”前已留学德国，因此，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我有机会自由地探寻被共产党扭曲和掩盖的各种真相。研

读史料，辨别真伪，揭露谎言，呵护善良成为我今生的事业。

以天安门一代为主导的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受到共产党的监控和渗透。同时，共产党也一直在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过共党喉舌缺乏信誉，难以欺骗世人。可是由卡玛夫妇制作的影片《天安门》却迷惑和误导了海内外无数观众包括反抗“六四”屠杀而入狱七年的武文建。

武文建居然因影片《天安门》而赞赏卡玛，诋毁柴玲。因此，有必要把卡玛象她父亲韩丁、母亲史克、姑妈寒春、姑父阳早、表弟阳和平和曾祖祖母伏尼契一样属于红色洋人的事实公诸于众。他们一家都符合洋五毛的标准，虽然他们因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表现不同。

在“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之际，又有网民撰文，为柴玲洗涮污名。其中一篇标题为《从鲁迅谈学生领袖想到柴玲》指出，“卡玛的东西是有失公允的，不管是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其认识导向很明显，客观上造成的效果也很显著。就像有的网友指出的，此人1995年制作发行了《天安门》（10月首映）。其后，还能自由出入中国，并能采访到国家领导人王光美，并在2003年秋发行《八九点钟的太阳》，这种两边通吃，占尽了两个制度好处的人，是不平凡的，应该警惕。请问有几个搞64研究的，搞文革研究的，可以享受到她这样的待遇？”

《天安门》与柴玲

共产党从一九四九年起，霸占了大陆的全部资源，老百姓完全被它蒙在鼓里，受它欺骗，被它糊弄，任它宰割。

天安门一代从小就生长在中共打造的，鲁迅臆造的“铁屋子”里，接受共产党的赤化或曰毒化，能在大学时代群起抗争，要求自由，堪称壮举，值得讴歌。他们为民请愿，为国分忧，要求与独裁者对话，勇于挑战强权，实在可歌可泣。他们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和奉献震撼人心。

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共党独裁中国的四十年里，第一次发生了百万人的和平游行，抗议共产党强加给天安门一代的罪名。

二零零七年，当年和柴玲一起绝食的二百多学生之一在网上发表《关于柴玲的两句话》，为柴玲说公道话。文中说，“当时我们从北师大出发到天安门的时候，真是凄惨呀，一个人头上扎了一个绝食的白布条，一共就两百人，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啊。……谁料到绝食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支持，到第二天白天，人就多了起来，后来天安门居然去了上百万人。”

共产党无视民意，发布“戒严令”，用谎言和武力强暴民意，促使世人认识到共产党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霸占了中国的匪帮。

柴玲无疑是天安门一代中的佼佼者。她参与起草的《绝食宣言》、她在五月二十八日留下的“最后的话”（五·二八讲话）和她在逃亡途中于六月八日在武汉大学录制的讲话都真实地记录了以她为代表的天安门一代的人性光辉。他们英勇无畏，追求自由，坚持非暴力。这三份历史文献至今令人感动，催人泪下。在五月二十八日柴玲就“用生命来请求和委托 Philip Cunningham 向全球的华人转达我真实的思想和感受”，其中包括，“我想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她用语言表达也属天安门一代的湖南三勇士用蛋击毛像显示的先见之明。

即使“六四”屠杀后，柴玲在录音讲话里还在强调“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同时她还在录音讲话中问，“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杀无辜市民的士兵是野兽、畜牲的话，那么这些坐在电视荧幕前、摄相机前撒谎的人，他们是什么人？”

二十三岁的柴玲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中共就是靠施暴的枪杆子和撒谎的笔杆子来维持政权。而这些笔杆子中就有卡玛一家六口。

卡玛拍《天安门》时找过柴玲，但柴玲拒绝接受她的采访，显然那时她也本能地意识到卡玛是罕见的洋红卫兵。柴玲

们齐集天安门是在向共产党抗议，而卡玛们齐集天安门是在向毛泽东致敬。红卫兵一代与天安门一代水火不容。

卡玛曾发表《为什么〈天安门〉没有采访到柴玲？——〈天安门〉中文稿本补记》，其中透露“当我告诉她已接受采访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刘晓波这些观点与她不尽相同的人时，她的言语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烦”。

卡玛不知每个了解八九民运、戴晴和刘晓波的读者都会理解柴玲的反应。八九学运时，戴晴与中共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有联系，并以阎明复的名义邀请李洪林等名人去劝导学生。可是她却不顾这些名人要求政府退让的三点呼吁，“把学生当小孩一样的哄”（李洪林语），结果遭到学生反对，与学者反目。戴晴与卡玛都属中共专制下的特权阶层——红卫兵一代，与天安门一代立场不同，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这场冷战持续至今。

刘晓波先象侯德健一样借绝食在天安门广场上抢风头，“六四”屠杀后却又都出面为中共圆无人死亡的弥天大谎。一九九二年，刘晓波还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来自暴其丑，抹黑他人。为此刘晓波一直遭到正直之士的批驳。刘东东（笔名三妹）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网站《自由圣火》上发表《点评和节选：〈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一章》，专门提醒世人不要上刘晓波的当。刘东东也属特权阶层、红卫兵一代，但她对共产专制有深刻地反省。在这篇文章中，她明确质疑刘晓波二零零九年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象《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样，是

刘晓波的“故伎：拿民主当招牌，把说谎当成一项高尚的事业”。刘晓东认为“我们需要重读刘晓波的《独白》，读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郑义、王若望、刘宾雁如此愤怒。”郑义当年对刘晓波的评价现在还不过时：“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掂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这和刘晓波推崇中共的偶像鲁迅，说鲁迅是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不无关系。

抹黑柴玲扭曲史实

卡玛在上述文章中声称“我们影片的宗旨是严谨地处理史料”。可是，卡玛主导的两部影片《天安门》（一九九五年）和《八九点钟的太阳》（二零零三年）都违背史实，歪曲真相。

《天安门》公映后，对卡玛的批评一直不断。二零零九年，网民慢牛发表《〈天安门〉影片评述：卡玛对柴玲的形象塑造，反思学生领袖》。作者认为，“大家看了这部片子，最深的感觉应该是柴玲吧。这个说话前后矛盾，先激进后逃跑，到处给学生组织搞破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形象应该是这部片子后半段的主要内容”。作者证实，“《天安门》里的柴玲是个制作组本身按制作组想定的模板，通过各种镜头剪辑、拼接塑造出来的人物，确实有失公允”。对此作者举了一系列例子，其中包括“卡玛如何‘塑造’柴玲”。

卡玛为了误导观众得出柴玲让学生去死的印象，居然采用将柴玲引用李录的话，掐头去尾，变成柴玲自己说的话等卑鄙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卡玛这种剪切方法，失去了制作纪录片的基本道德”。

作者也象别的卡玛批评者一样断定，“通过卡玛的剪辑和引导，加上时代的变迁，她（柴玲）就成了一个反复无常，卑劣无耻，让大家往前冲，自己先跑的人了。在该片发表以后，96年，大量的名人，加入到对柴玲的批评里来，引用的基本都是《天安门》里的话，比如方舟子”。简言之，卡玛成功达到抹黑以柴玲为代表的天安门一代的目的。这当然不是“两个女人的战争”，而是正邪在以两个女人的面目较量。

《天安门》上映后，天安门一代的清流封从德曾向卡玛指出《天安门》一片的错误，但卡玛置之不理。不得已，封从德只好在一九九八年发表专著《天安门之争》，澄清事实。每个关心八九民运，观看过柴玲讲话录像的知识人，不难看出，卡玛为了抹黑柴玲，扭曲真相，象中共一样不择手段。在《天安门之争》一书中可以获知卡玛的具体做法。

二零零七年，柴玲把卡玛告上法庭，封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亚微采访时说：“卡玛这部电影从效果和剪辑的手法看，对柴玲是有恶意的和妖魔化的，比如它把柴玲引述别人的讲话全部剪掉，然后变成柴玲自己的讲话。‘天安门’这部电影就是这么处理的。整个电影对‘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歪曲，对‘八九’年历史

的了解也是误导的。”

卡玛却用公开信向读者呼吁，指责柴玲的起诉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对此旅美华人杨林在评论《从长弓的呼吁书看长弓》中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美国的大媒体被人控告，被迫道歉，乃至主编被迫辞职的事时有发生，没听说过‘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有些人由于说了几句政治不正确的话而被迫道歉甚至辞职，也没有听说‘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能威胁到言论自由的只能是独裁的政权，把一个民间的案子上升到‘对言论自由的威胁’，说明卡玛对言论自由的肤浅理解，对法制的缺乏信任，和对‘党文化’的娴熟运用。”

二零零九年，“六四”亲历者张健也发表文章《不信青史烬成灰》，支持柴玲，谴责卡玛。他说，“不可原谅就是卡玛这一类人，侯德健这一类人，揣著明白装糊涂。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第二次杀人。”

美化凶手掩盖罪恶

如果说卡玛在《天安门》中恶意剪接柴玲访谈以达到通过丑化柴玲，扭曲真相，诋毁八九民运的目的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八年后，她在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里通过美化红卫兵比如“恶之花”宋彬彬，掩盖“文革”罪恶的目的

则昭然若揭。

卡玛在高伐林（心远）对她的专访《始终凝望中国八九点中的太阳》中表示，“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我问过‘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王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最深入，她说宋彬彬没有参与”。然而王友琴在接受同一个记者的采访《大规模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学者王友琴答问录》时却说：“我看到网上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卡玛为什么要撒谎？

王友琴是《文革受难者》的作者。她以一己之力在芝加哥大学网站建了一个“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王友琴收集了近万名被“文革”害死的大陆人的数据，让后来人通过具体事实了解罪恶的“文革”。与卡玛的网站“八九点钟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比。卡玛网站的首页是文革中《人民画报》的一期封面。这幅宣传画上，有一家八口个个手拿小红书，列队站在巨幅毛泽东像下，由最小的孩子指挥着唱红歌。网页背景是道出“八九点钟的太阳”出处的毛语录。连地址栏上都有毛泽东头像，可见卡玛对毛的感情非同一般。

点击该网站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栏可获知卡玛的解读：“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简言之，王友琴用事实还原历史，卡玛借艺术掩饰罪恶；她们一个悼念死难者，一个缅怀凶手。

对此在“文革”中用退团信抗议毛泽东，并因此遭受十三年残酷迫害的王容芬特发表长文《红卫兵——毛分子——反人类 —— 分析一个为文革张目的野蛮网站》加以谴责，她写到，“至于毛泽东的红卫兵，其杀人之多，手段之恶，为害之劣，都远甚于希特勒的青年党卫军，实属反人类暴力组织。用这个标准解析‘八九点钟的太阳’网站，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挂蛇头卖毒药，就像它的网址一样，挂着毛泽东和红卫兵的蛇头，贩卖文革暴力的毒药，以耻为荣，以恶为德”。

“同是反人类罪，文革之暴虐远胜于纳粹。同为暴君，希特勒对毛泽东望尘莫及。同为打手，红卫兵对人权的践踏比青年党卫军残酷十倍、百倍而过之。可惜由于韩丁、卡玛这样的西方毛分子的宣传粉饰，中国现代史上的令人发指的反人类暴行仍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首恶及帮凶依然逍遥法外。这也是‘Heil Hitler’触犯刑律，‘毛主席万岁’却能在卡玛们的网站从头喊到底的原因。”

如果没有历史义工王友琴和反共先驱王容芬，我可能也会受卡玛误导，因为我是“文革”同龄人，对“文革”几无亲身感受，难以看出卡玛也象中共一样在粉饰历史，掩盖真相。

王友琴收集了足够的史料证实卡玛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宋彬

彬彬是“恶之花”，她亲自参与了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时任北大女师附中语文老师的林莽亲眼见证了卞仲耘被宋彬彬们殴打致死。当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被打死后，到北师大附中讨说法时，见他的红卫兵头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当年请这些负责人留下的签名。而殴打不是自发的，是革委会组织的。林先生两次被提审时，宋彬彬都在场。

王容芬在影评《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中表示，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于中共中央台广播后第二天，北师大附中就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就是宋彬彬。而“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给宋彬彬、李南央等提供了面对历史的机会，但他们却只为自己辩解，避而不谈他们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学里都有老师被学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带头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在宋彬彬于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敬献红袖章并因此被改名为“宋要武”后，北京女

三中的校长沙坪，从十九号起被殴打，旁边还跪着一大片老师，打到二十号中午全校斗争会上，就被活活打死了。李南央的学校打死了语文老师孙迪。卡玛的学校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学生红卫兵打死的。但是亲历者卡玛不仅在“文革”纪录片里回避了如此史无前例的罪恶，反而让拒绝忏悔，不敢见人的宋彬彬们（在影片中宋是黑面）为自己开脱。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的中学生宋彬彬成了“文革”纪录片中的演讲者，而王容芬却没被采访。或许卡玛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迹，但她却认识当年也象宋彬彬一样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啊？

属于“文革”一代的网友螺杆气愤地表示，“卡玛的无耻，在于她对文革没有正确认识，在于她的影片没有揭露文革的惨烈野蛮，如果她没有参加文革，不是文革当事人，而且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青春无悔’，文革只不过是一种全民疯狂的闹剧，她觉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忆”。螺杆还发表《卡玛的〈天安门〉的解说词是甜砒霜》和《柴玲为什么不与卡玛合作》两文，揭批卡玛。他说，“因为从《天安门》解说词来看，她确实是在同情和理解中共当局，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品出个中滋味。对六四事件时的当局和学生，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其实用心很险恶，绝对不是出于无意”。对害人的中共当局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是洋五毛的惯用手法。

简言之，卡玛不具有记录片制作人应有的道德观、公正性和历史观。她在主动配合中共掩饰罪行。

曾被卡玛迷惑，在《天安门》里露面的封从德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出版《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在后记里，他陈述过去二十年里与中共势力进行的“记忆的战斗”。“追寻真知坚守真实”的封从德也是通过王容芬的长文获知卡玛的来历，明白卡玛的用意。

遗憾的是，卡玛不仅能骗大陆人，还可以骗台湾人，卡玛因上述两部影片在台湾轰动一时。《中国时报》发表对她的采访，不过她的表弟阳和平就此采访写作的《也谈人性、恶和文革》却未得到采纳，毕竟自由社会的正常人无不“指责文革和毛泽东”，不会接受阳和平的观点，“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

除此之外，阳和平透露，“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的《从中国到美国：卡玛专访》中却说，“卡玛即不可以跟他们去串连，更不能跟他们上山下乡。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个别几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乡下可不是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就是说，阳和平和卡玛中有一个人撒了谎。

卡玛（Carma Hinton）的表弟阳和平（Fred Engst）

封从德在《记忆的战斗》中透露，卡玛是“文革中当红的造反派头目，而且一家子都是中共的红人。卡玛曾受到周恩来、张春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接见，在《人民日报》上至少8次刊登了接见她及一家人的报导与照片。从最近由卡玛表弟阳和平（宋庆龄为他起的中文名字）在网上披露的记录看，1971年11月14日夜间，周恩来与这家子通宵达旦谈了6个小时，周与卡玛热络得很，说‘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卡玛问起林彪事件，周恩来竟说‘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周恩来还说‘卡玛你在中国住整整21年，经过了中国的革命，到山西去证明了这个真理。’”周恩来证明卡玛到过山西，与上面阳和平讲述的红色劣迹吻合，因而可以推断卡玛在采访中又一次撒谎。周恩来不是什么“人民的好总理”，而是中共特务机构的创建者和当权者。

在“文革”中，卡玛一家象波尔布特、乔森潘等毛分子一样成为祸国殃民的中共掩盖真相，制造舆论的洋木偶、座上宾。

当卡玛在美国用纳税人包括柴玲的钱拍摄宣传片误导世人时，阳和平则从美国回到大陆，象卡玛一样粉饰“文革”，讴歌毛泽东。

阳和平的文章和演讲令人发笑，不值一驳。遗憾的是洋毛分子能在大陆欺骗得不到自由信息的民众，而中国精英却不能在大陆自由演讲。

在此只谈毛分子聚集的大陆网站“乌有之乡”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发表的《首都大学生三农文化节开幕讲座阳和平老师演讲稿》。

在这篇讲演中，阳和平还在散布，“老百姓支持共产党，使得国民党怎么也打不败共产党”，“长征”之类的红色谎言，并宣称，“要说胸怀，没有人比得上毛主席了”！而“文革”在他的口中是这样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革命，到夏天的时候，我还在西安，秋天我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学校都空了，都是外地学生，我表姐已经跟着清华的同学游行出去了，11月份回来一趟跟我讲他们做些什么事，我当时羡慕死了，非拉着她带我去，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爸爸特别支持。我爸爸就给我些钱和粮票，给我了十块吧，那个时候很值钱。那时我才十四岁。出去还是有危险的，所以就跟着表姐步行串联。要从北京一直走到延安，再走井冈山然后再走回来，宏伟的计划。可是学生的特点，是想做什么急作什么，没走多远。有的人想留下来，有的人不想继续走，然后就分开了，再走一段路又分开了，然后说老是走没意思，就到煤矿待了几个礼拜。一月份的时候学生嚷着要坐火车回去，这样我的一年的计划就要破灭，这个不好办。我还想走走，于是动员我表姐走，起码走回北京，然后她同意了，我们一共四个人，坐火车到了保定，然后走回北京，起码走了一个礼拜。那个经验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期间那个精神面貌没有见到过”。如果阳和平十四

岁时这样讲演，没什么错，但他讲演时已五十六岁。据称他“七四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二零零七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

不过阳和平没卡玛虚伪，他对自己象他父母阳早和寒春一样是洋毛分子直言不讳，他说，“我父母是在毛泽东时代，看着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在参与中国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里面。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辈子特别值。我的父亲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了中国的革命，后来又参与了中国的文化革命，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他全部参与了，所以他觉得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他一点儿都不后悔。他能参与到这么一场改革内，一场实践里边，是非常荣幸的。我母亲同样觉得离开了美国，通过个人奋斗，参与到当时延安的那种精神，从全体利益出发，从解放全人类的出发点来办事，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为个人的‘小山头’而勾心斗角，为个人的小利去操心，他们觉得在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们的一生对于我也有所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我在中国的生活，吃中国的饭，喝中国的水，中国有个说法‘（水土能改变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段话足以证明阳和平完全接受了中共的党文化。在美国生活的三十三年里，他不仅没有走出中共的思想牢笼，而且似乎变成了毛泽东时代的活化石。他还接着表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经历，会走不同的道路的，而道路是自己选择的，环境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我们自己选什么样的道路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不能全部归咎于环境，但是

环境对我们也会有大的影响，没有中国的环境，没有中国的革命，就没有我父母他们的思想境界和思维方式。当然人总是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没有中国这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过程，也看不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同志离我们越远就越显得伟大。”

是啊，阳和平可以自己选择道路，他可以选择在美国享有人权，也可以选择在大陆享受特权。他选择离开美国，是因为他象其父母一被赤化，甘愿投入“党妈妈”的怀抱，在“党天下”享受特权，讴歌暴君毛泽东。

父亲韩丁（一九一二－二零零四）和曾祖母伏尼契（一八六四－一九六零）

毛泽东借斯诺编造的谎言《红星照耀中国》欺骗了几代人。龚普生、龚澎姐妹是直接被斯诺欺骗的民国女大学生，中文名为韩丁和寒春的辛顿兄妹则算间接被斯诺欺骗的美国大学生。

寒春得到《红星照耀中国》此书的两个来源是她的大姐，一个热衷于工会运动的美共党员和她的二哥韩丁。他们的母亲是杜威的信徒，也即胡适的同类，在“文革”时到过大陆，也上过中共媒体，当过中共道具。

一九四三年，韩丁就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对此阳和平

透露称，“我舅舅是个冒险家，他在19岁身上带了十几块钱就游世界去了……所以他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从一个非暴力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党员。那时美国共产党影响还挺大的，45年的时候，我舅舅就到了中国”。当时韩丁是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中共假惺惺地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期间，韩丁结识了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这位美共党徒因对“苏联专家”不满而返回美国。韩丁的红色活动遭到美国当局清算，护照被吊销。虽然如此，这不影响韩丁在美国为中共宣传。而且他还能在一九五五年从美国通过留在北京的史克替《牛虻》的作者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向中共索要稿费，因为韩丁说伏尼契是他的祖姑母。

伏尼契出生在爱尔兰。她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就去世。母亲带着她和四个姐姐迁居伦敦。伏尼契一八八二年到柏林学音乐，在三年留学期间阅读了斯捷普尼亚克的《俄罗斯的地下革命》等红色读物并深受影响。回到伦敦后，她找到因刺杀彼得堡警察局局长而逃到伦敦的斯捷普尼亚克，开始支持他们在俄国搞暴力革命并帮助传播红色宣传品包括马恩著作。伏尼契还与恩格斯有交往，就是说，她年轻时投身第二国际的革命活动。

最迟一八九五年，她就与越狱潜逃到伦敦的革命党人米哈依·伏尼契同居，七年后，为让情夫获得英国国籍而结婚。一八九七年，伏尼契的《牛虻》问世。当时的书评认为《牛虻》对于年轻人相当有害，因为“书中充满了不恭和对神

明的褻瀆”。选以吸牛血为生的寄生虫为书名，并让男主人公自比牛虻确实违背常理。曾与西德尼·莱利（Sidney Reilly）一起试图行刺列宁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透露，伏尼契曾堕入莱利的情网，两人曾一起到意大利旅行过。莱利是《牛虻》的原型，牛虻去过南美等与莱利早年的经历相似。可是，莱利（一八七四－一九二五）不是革命者，他认为苏联政府是邪恶，因此致力于颠覆苏联的红色暴政并在五十一岁那年被苏共杀害。莱利死后，还通过洛克哈特之口影响了伊安·弗兰明（Ian Fleming）创作英国特工詹姆斯·邦德也即零零七。

米哈依·伏尼契从一八九八年开始倒卖旧书并开了连锁店，德语维基称，这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宣传革命的需要和解决资金的办法。米哈依·伏尼契一九一四年就带着女秘书去了纽约，伏尼契六年后才去。那年大不列颠共产党在英国成立。一九二零年米哈依·伏尼契去世后，伏尼契与女秘书一起在纽约生活直到去世。就是说，伏尼契虽一度崇拜革命者，支持暴力革命，但她自己却选择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纽约。不知她与至今还在纽约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国共产党总部是否有过联系。

俄国共产党人篡夺政权后，无人问津的《牛虻》被共产阵营炒作成“世界名著”，因为《牛虻》渲染了“旧社会”的黑暗，打击了人们对神的信仰和损害了教会的信誉，为暴力革命编造了正义性，符合共产党的需要，是“革命文学”的标本。苏共还于一九五五年把《牛虻》拍成电影。中共

于一九五三年出版中译本，在两年之内印行了七次，初版印数就达二十万零四百册。收到史克的信后，中共青年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由当时的总编辑李庚出面给伏尼契写了恭维信，并告知“已将您的稿酬五万美元通过有关方面寄给您，并另外通过我国国际书店寄赠给您四本《牛虻》的中译本，希望您收到以后给我们一封回信，并希望您能为该书的中译本写一篇序言”。在这封信中李庚透露，一九四九年前，“翻译小说一般印数不超过本书现有印数的百分之零点五”。中共就这样挟一国之力把在美国默默无闻的伏尼契在红色中国炒作成“著名作家”。不过伏尼契却回信，“拒绝为《牛虻》中文版特别写一篇序言”。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那年，韩丁则在美国发表歌颂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宣传品《翻身》。美国的毛派评论员声称：“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卷……它向我们展现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个村庄生动、撼人的故事。辛顿先生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夜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做出了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贡献”。《翻身》在西方毛派的推动下，象《红星照耀中国》一样成了迷惑世人的红色读物，还被改编成了话剧，先在伦敦后在世界各地上演。据说《翻身》居然成了“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修书。”

《翻身》虽然是洋毛分子的作品，但因为书中也披露了至少有十几个地主被活活打死等共产罪恶，所以，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评说他，“丧失了革命立场。”因此，《翻身》中

文版直到一九八零年才在大陆出版。一九七一年，韩丁被周恩来请到中国。在七个月的访问中，周恩来先后五次同韩丁会面，称这位美国毛分子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韩丁是促使美国承认共产暴政，与中共建交的美共党徒之一。一九七四年，他参与创建了拥共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担任第一任主席。这个红色协会还出版刊物《新中国》为中共宣传。

继《翻身》之后，韩丁先后写了六部作品，包括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内容的《铁牛》和《翻身》的续集、反映五十到八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深翻》等。即使韩丁对中共政策有所批评，中共媒体也从不报道，相反还“把那些大话由他的嘴再说一遍”（卡玛语）。就是说，中共只是利用了韩丁的美国人身份，并不听取这个共产党员的意见。韩丁表示，“我写这些书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这表明，韩丁执迷于共产邪恶主义，一生致力于为中共宣传，为中共涂脂抹粉。

韩丁从七十年代起多次前往中国，支持中共。七十五岁时，韩丁还与一美籍华裔结婚。当他的第三任妻子由联合国儿童组织派驻大陆时，韩丁也一同前往。

一位美国检察官哈里斯（Benjamin Harris）在文章《韩丁，毛泽东的鞍前马后的西方傻瓜》中说，“1972年，韩丁在中国写作了《大转折》一书，为文革叫好，只遗憾这场革命没有达到所有的既定目标，还喜不自胜地预言中国将来需要很多次这样的文化革命。”哈里斯还认定：“卡玛继承

了韩家拿虚拟作品当纪实作品写的家风”。卡玛作为韩丁与第一任妻子史克的女儿，显然深受其父母影响，步其后尘，不过她与时俱进，手段更高明，因为电影更能迷惑世人。卡玛堪称继承了其家族始于伏尼契的共产骗术和红色烙印。

卡玛还沿用了韩丁小说《翻身》中描述的村庄的名字长弓（Longbow），将她的电影的制片公司叫长弓。用哈里斯的话说就是，韩丁“生前欢天喜地地为那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变态的王朝大唱赞歌，现在他的女儿粉墨登场，捧着顶帽子向纳税人讨钱，制作一部电影为文革唱赞歌”。

中共专制的乱象：一对副部级待遇的洋奶农

卡玛的姑母寒春（一九二一—二零一零）曾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工作人员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过费米的助手。美国在爱因斯坦的建议下研制原子弹，以防德国法西斯领先。在美国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日本拒不理睬后，美国用研制成功的两个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

一九四六年，丘吉尔发表演说，声称要联合遏止共产主义，促使又一批外国共产党员到中国支持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寒春自称从二十六岁起就崇拜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三

月，她从美国到中国，投奔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一九四九年，寒春和韩丁的同学欧文·恩格斯特（一九一九—二零零三）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结婚。

恩格斯特家也有几位女性成员是美共党徒，在其影响下，他也读了斯诺的红色宣传品。中共媒体说，恩格斯特为了要亲眼见识创造了“小米加步枪”和“长征”神话的毛泽东，一九四六年，二十七岁时，以联合国总署养牛专家的身份前往上海。根据相关资料来判断，他也该是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的美共人才。恩格斯特于同年八月就投奔苏区延安，从此取了个中国名阳早。这位据称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牧系的美共党徒成了苏区仅有的三十多头奶牛的洋奶农。在国军进攻延安时，阳早因成功地完成撤退任务而被誉为“经受了革命考验的人”。据称，“此时的阳早不断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未婚妻琼·辛顿，向她描述延安生活。”

一九五二年，寒春在中共的安排下，出席所谓的“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她在会上谴责美国是唯一犯下原子弹罪行的国家。寒春无视美国用原子弹结束了造成七千二百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而中共为了制造原子弹，饿死的人岂止是二十一万（被原子弹直接夺去生命的人数）？一九五三年七月，美国的《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文章怀疑琼·辛顿到了中国之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核秘密，并且有可能正在协助共产党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原名琼·辛顿的寒春是否是为共产党效劳的“原子间谍”，现在还没有证据，但能证实的是寒春夫妇在共产党霸占的中国如鱼得水，

甚至被中共提拔为高干。

在学生打死老师的“文革”红八月中，寒春夫妇联合卡玛生母史克等四个洋红人写了“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为“造反派”参加了所在单位的“战斗队”。王容芬在她的长文中评论这张毛批马列大字报，“其措辞比聂元梓们的更带杀气，又添了几分西方人少见的媚气”。

二零零八年，当寒春在东京被一个澳大利亚记者问到她是否还是毛分子时，她回答说，“是啊”并表示，“要是毛还活着该多么美妙啊，我百分之百支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每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美妙的经历”。（**Woman who worked on first atomic bomb pays tribute to 'terrific' Mao** Peter Alford, Tokyo correspondent | August 16, 2008
Article from: The Australian ）

寒春夫妇当了一辈子中共的宣传工具。中共媒体不乏借他们之口来赞美毛泽东的宣传，比如，有报道称阳早“喻很有魅力的毛泽东是《圣经》里的救世主”；而寒春则称：“牛得了病，一般人看的是表面，毛是通过现象看本质”。寒春“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最大的梦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寒春夫妇表面上是一对洋奶农，其实是双双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毛分子。

二零零四年，寒春还扮演了获得首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新时代红色样板戏。问她为何未加入中国籍，她回答说：“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寒春自己透露了她爱的不是中国，而是给了他们家特权的中共。她也一直乐于给中共当道具。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凤凰电视台让寒春拿着小提琴和最老的政协委员沙博理等五个白发苍苍的洋五毛出面讲述他们各自在“党天下”的幸福生活，美其名曰“五位外国友人见证红色记忆”。寒春再次表白，她“最崇拜的人毛泽东”，还笨拙地用小提琴拉出不成调的《东方红》！

在二零零九年毛泽东的生日时，中共媒体又借寒春之口赞美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的毛泽东。这位已八十八岁的洋毛分子“认为毛主席是所有伟人中最伟大的人物”。而最让她“钦佩毛主席的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文革”，这个连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都否定的共产罪恶，居然在寒春眼中是毛泽东的伟业，可想而知寒春多么崇毛尚暴！请看寒春的自我表述，“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我也不会来到中国。我之所以来到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吸引力，而是震撼于小米加步枪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力量中，我找到了人类解放的道路，能成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荣幸。”

寒春不放弃美国护照，因为美国护照也能带给她好处。她的三个孩子比如阳和平都象卡玛一样在七十年代去了美

国。

不过只有阳和平难忘在大陆享有的特权而回到“党的怀抱”，并乐于向大陆人宣讲“美国是一个没落帝国的样子，是比较空虚的，它基本上是靠在各国的投资赚钱来维持它的经营，它的经济本身没有什么实体了，所以它不会长久的”！毛分子的特点就是用共产术语抹黑美国，不过阳和平这番言辞恐怕只有他自己相信。

综上所述，卡玛一家很象她网站首页上那幅宣传画中的一家子，都有“毛病”，都主动配合中共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粉饰共产罪恶。这一家毛分子掩饰的罪恶包括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国共内战”），共产党谋财害命（“土改”），毛泽东破坏传统，杀害无辜（“文革”），邓小平用暴力镇压中国民众站起来要求“爱国、民主、反贪腐”（“六四”）等等。

第六章 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

一九八九年，对生长在美国的犹太文库恩和被共产党绑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

一九八九年给库恩带来了红色商机，他第一次在中共官员的邀请下，踏上被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了四十年的中国。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抗议风暴，被剥夺了人权的中国人群起抗争，齐聚天安门广场要求与共产党对话。丧心病狂的共产党在世界的注视下用枪声回答了中国人质的心声。

这一年，中共在世人面前暴露了杀人不眨眼的凶相。十七岁的高中生蒋捷连与无数捍卫人权的中华儿女被共产党屠杀，对他们的家属而言，一九八九年是痛楚的开端。

“六四”屠杀发生后，中国人又一次悲壮大逃亡，这一次的共产难民主要由三代知识精英组成。对他们而言，一九八九年是流亡的开始。

三代人中的知名者有戈扬（一九一六－二零零九）、高行健和封从德。从一九八九年起，他们便被迫背井离乡，失去了归国探亲访友的人权，只因为他们发出了个人的声音。

戈扬年轻时，被斯诺等骗入共产党，沦为红色笔杆子，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强行“劳改”二十一年。一九八九年再次被共产党迫害，从此流亡美国，客死他乡。

一九八九年开进北京的坦克把赵紫阳等良心未泯的中共高官赶下了台，压过无数血肉之躯之后，在欧美各国政府的谴责声中，把邪恶之首江泽民推向权力高峰，推到被势利之徒库恩崇拜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的中国精英要么被迫流亡，要么被捕入狱；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知识人则游说所在国的政府颁发“六四血卡”，让他们及非法偷渡到海外的数十万大陆人获得永久居留权。

当中国精英投奔自由的时候，外国败类投靠中共，填充了苏晓康们留下的空缺。

二十年后，中共上海外语频道为庆祝共产党独霸中国六十年，推出十个“中国通”，库恩成为第七集的主角，另外九位是亨利·基辛格、萨马兰奇、伊戈尔·罗高寿、中曾根康弘、皮埃尔·拉法兰、鲍勃·霍克、斯蒂芬·佩里、顾彬、乌里·希克。

这十个红色“中国通”与凤凰台推出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堪称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洋面首。

斯诺的变种

二零零五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龚文庠发表《到过延安的斯诺和今天的库恩》，吹捧中共历史上两个对立的洋鼓手。斯诺当年是个靠混船票来到中国的无产者，而库恩则是被当权者邀请到中国的有钱人。斯诺美化杀地主抢财产的赤匪，煽动戈扬们跟着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颠覆了自由的中华民国；而库恩则在共产党自己变成了地主、资本家后，美化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的血色中国，阻挡没有人权的中国民众奋起推翻暴政。库恩是斯诺的变种，虽然他们都是中共的洋鼓手。

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从以记者身份在中国从事红色渗透的外国人中选择了三十一岁的斯诺，要他出面美化被国民政府围剿的赤匪共产党。担当剿匪重任却私通共匪的张学良，配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地下组织，把斯诺秘密送到被国民政府封锁的苏维埃中国或曰苏区，让毛泽东得以对着斯诺撒“长征”等弥天大谎，把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党伪装成中国的“大救星”。面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匪占领区，斯诺违背做人的道德，全盘照搬毛泽东的谎言，甘当毛泽东的应声虫和共产党的吹鼓手。

斯诺把共产党要他传播的谎言记录整理成《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月，在英文月刊《亚洲》上连载。与此同时，斯诺的谎言还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翻译成

中文出版，其中包括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自传》。《毛泽东自传》在三十年代问世时，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没有成为常识，以致斯诺迷惑了无数青少年，诱使他们象戈扬一样投身共产恐怖主义，为共产党赴汤蹈火，推翻了新兴的民主中国，建立起滥杀无辜的马列红朝。

七十三岁的戈扬在“六四”屠杀后，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在美国宣布“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四十五岁的库恩却在同年首次被中共邀请到大陆，从此留下在中国的劣迹。有意思的是，当库恩被称作“又一个斯诺”时，他表示：“我和斯诺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写作的方式也不一样。”

毛泽东当年敢于在国民政府的围剿中对着斯诺信口雌黄，而江泽民却在中共的“盛世”里不敢接见乐于吹捧他的库恩。因为共产党在世上的气数已尽，江泽民大权在握，也免不了沦为万众唾骂的对象。

商业教会的头目

库恩本来是个幸运儿，因为他生长在自由的美国。

一九四四年，库恩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右眼先天失明，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在家接受教育后，十五岁

直接进入大学。

如果不是麦卡锡们成功地抵挡了共产国际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斯诺们被赶出了国门的话，那么，库恩就会象比他大两岁的遇罗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一样因“出身不好”被打成“黑五类”，受到迫害和歧视，即使再优秀也不准上大学。

一九六八年，二十四岁的库恩在美国获得人脑解剖学博士学位；而二十四岁时就写出《出身论》等抗暴檄文的遇罗克，却在这一年被共产党投入死牢，在遭受了酷刑和批斗后，被共产党枪杀，器官被盗用，其时不过二十七岁。

遇罗克因文被杀两年后，二十八岁的库恩却因一篇《为什么人脑和动物脑会有区别》的文章，受到世界上帝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 WCG）教主的赏识，得到该教会重用。

世界上帝教会于一九三四年由阿姆斯特朗（Herbert W. Armstrong）在美国创建。已故著名宗教学者马丁（Walter Martin）在他的专著《异端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Cults）里，花费数十页篇幅专论这个以信仰为名的商业组织。

世界上帝教会的特色，在于通过杂志、广播、电视节目等大众媒体传播教义，招揽信世。库恩有六年时间为这个组织工作，比如，制作一个结合时事和经文的国际传教电视

节目《明日世界》。据《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库恩 一个犹太商人的中国历险》中说， 一九七八年，该教会“因为首领敛财无度，一度被美国加州警方取缔”。那年，库恩已上升为该组织的三号人物，但他还想趁教主环游世界之际，接管教会。篡权失败后，库恩被迫离开该组织，转而就读管理学校。库恩于一九八零年获得管理文凭后，转往亚洲从事金融交易，成功改行为投机商，从而引起中共官员青睐。

就是说，库恩在一九八九年投靠共产党——这个霸占了中国的最大邪教组织以前，已有在美国投靠商业教会的经验。而库恩进入红色中国后，扮演的角色颇似他昔日在“异端王国”的角色。

卖身投靠中共

库恩第一次到大陆，是应当时的中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位犹太投机商立即就与中共各层建立了联系，并在“六四”屠杀后，成为中共的面子工程商。库恩在二十年里每年都到大陆，据新华社报道“至今已经不下百余次”。除了上述的江泽民伪传外，库恩还承包过中共的一系列面子工程。

库恩首先利用原世界上帝教会的基金会（AICF，该基金会

在库恩退出世界上帝教会后，于一九八六年结束运营）的关系，建立了他名下的科学、教育和文化基金会，以促进中美两国交流的名义，募捐和从事各项为中共涂脂抹粉的面子工程。从中共媒体的报道中可以获知，库恩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配合库恩参与面子工程。

库恩的伪传出版后，他的妻子先后与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不知是妻子的钢琴弹得好，还是丈夫的马屁拍得好？而库恩的三个孩子曾一同为库恩与中共外宣部门联合制作的《探索中国》、《重新发现中国》、《中国》等电视片工作。

从一九九七年起，库恩筹集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十四个故事全方位地为中共粉饰太平，此片还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放。对此他在中共媒体上表示起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为中国的科技和金融界做咨询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时候，我渐渐意识到，每当我在国外与人们谈论中国的情况，他们都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也说明，库恩确实与中共臭味相投，同样缺乏信誉。

库恩还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系统地对美国高级传媒人进行红色渗透。

针对“中国制造”在海内外产生的恶劣印象，库恩于二零零零年出版《中国制造》一书。

在千禧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为配合江泽民出席会议并访问美国，库恩又协助中共在美国一系列城市搞输出中共党文化的所谓的“中华文化美国行”。

据称库恩为江泽民作伪传，是因为不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华莱士二零零零年八月对江泽民的专访给观众产生的负面印象。

然而，中共没有通过库恩让美国人改变对江泽民及其红色中国的恶劣印象，相反，库恩还成为众矢之的。对此，库恩自己在中共媒体加以反驳，“很多针对我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而加诸我身的批评都是一派胡言。例如有人称我写作该书的构想来自于中国政府而非我自己。这是完全错误的；写作该书的构想百分之百来自于我自己，而我亲自写下了该书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事实上，在出版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曾要求看英文书稿。但是，世界最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外交季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批评评论，而文中则充满了种种不实。”

库恩象中共一样敢于面对事实继续撒谎。面对谴责，库恩表示，他“总是想到邓小平。他曾三起三落，经历过了比我多得多的痛苦。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从邓小平那里得到了激励，因为他跟我一样，身材虽然不高，但是精神上却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库恩主动吹捧和推崇共产暴君，足以折射库恩的人品。

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责任人，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

元凶，他们象毛泽东一样都血债累累，在累累白骨上崛起的红色中国是世界的威胁。中共威胁世界到了库恩嘴里就变成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库恩也知有意混淆中共与中国。

欺骗叶永烈炮制《江泽民传》

二零零一年，针对海外出版的被中共视为“起著极坏的政治影响”的各种江泽民传，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把叶永烈介绍给库恩，目的是伪造“中国并非极权国家、江泽民并非独裁者”的假象。库恩想为中共效劳，但他既不懂中文，也没写过传记，无法独立完成任务。叶永烈是大陆的传记专业户，乐于与库恩合作，为共产党效劳，但他不愿当枪手。

因此，四年后，当库恩名下的江泽民传被中共隆重推出后，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叶永烈，愤然撰文透露他被宰的遭遇，包括上述情况。尽管叶永烈在文章结尾意识到，库恩及其同伙在“用得著你的时候，以贵宾相待；用不著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但在文章开头，他却表示，“有幸成为库恩的合作者，秘密从事‘零零一号工程’（即《江泽民传》）的写作”。

叶永烈的自述让人惊叹库恩的骗术，叹息叶永烈不幸成为库恩的垫脚石。但愿叶永烈能吸取这次上当受骗的教训，迷途知返，远离中共及其同伙。

当叶永烈被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用头等舱机票请到北京与库恩会谈时，库恩再三地说，“叶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并表示“全部费用由他负担”。

叶永烈（一九四零）作为在红色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深受中共党文化的污染，因为他能接触的都是共产党过滤后的信息和推崇的红色笔杆子。因此，叶永烈在会谈中向库恩坦诚他的写作经验，表示他“很欣赏美国作家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一本是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我认为，《江泽民传》应该起著《西行漫记》那样让西方了解中国的作用，却又吸取《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那样通过大量‘花絮’——细节描写深深打动读者。库恩也很赞同我的这一意见。”

于是，叶永烈回到上海后，开始为“零零一号工程”工作。他“整理了手头的江泽民资料和已经进行的有关采访笔记，总共六大本”。然而，当他向库恩提供了《〈江泽民传〉设想》、《〈江泽民传〉提纲》、《〈江泽民传〉采访通讯录》、《〈江泽民传〉参考文献目录》、长达十五页的《江泽民年谱》后，“最理想的合作者”才获知库恩只要他做枪手。可叶永烈毕竟是专业作家，看重自己的名气，不愿做枪手，

因此向库恩建议：英文版署“库恩、叶永烈”，中文版署“叶永烈、库恩”，但库恩拒绝合理建议，坚持“库恩是单独的作者”，“叶永烈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合作因此中断。叶永烈没有得到丝毫补偿。

后来库恩在其江传中用了四页向六十九人、十三个机构鸣谢，但叶永烈不在其中。经叶永烈指出后，库恩“深表歉意”，不过只是送了叶永烈一本用他的话说，“《江泽民传》大字版精装本，并在扉页上写了堆砌许多对我致敬之类的好话。”

库恩利用中共巧妙地盗用了叶永烈的相关知识，还要撇清自己的罪责。叶永烈透露，库恩对他说：“你为《江泽民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

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不错，共产党专制下的中国是一个黑箱子，如果没有共产党及其黑箱子，库恩就不可能在中国享有特权。正是因为这个黑箱子的存在，库恩才能在中国巧取豪夺。难道不是库恩自己要坚持当“单独的作者”？即使是中共强迫库恩中断与叶永烈合作，也不会阻止他个人向叶永烈提供劳动报酬吧！所以，有评论者指出，库恩“得了便宜卖乖”。

骗取被共产党掌控的中国人的知识，来为自己追名逐利的外国痞子有的是，只不过库恩被叶永烈揭露出来了而已。斯诺也有这个嫌疑，不过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叶永烈这样的自我意识，毕竟为斯诺垫底的都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他们也不敢象叶永烈一样拒绝放弃自己的署名权。

无论如何，从叶永烈的经历，足以获知那些甘当共产党的应声虫或马屁虫的洋人，都是些什么货色，无论他们是穷困的斯诺，还是富裕的库恩。

《江泽民传》的失败

斯诺当年欺世盗名，误导戈扬们投奔共产党，但库恩现在就只能得到共产党的欢心，骗取在中国的特权和商机，牟取虚名和暴利。

在库恩炮制伪传的四年中，江泽民继续遭世人唾骂，文人谴责。我在中共获得奥运主办权后试图海归，在大陆亲身感受江泽民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祸害后，于二零零二年回到德国开始撰文，痛斥共产极权专制及其江黑心的邪恶尤其是对法轮功的迫害。

库恩称颂江泽民是“改变了中国”的伟大人物，“六四”屠

杀后被迫流亡美国的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则在二零零二年指出，江泽民当权后的十三年是“政治大倒退、社会大腐烂和经济大发展齐头并进的奇异时代”。

“六四”屠杀的亲历者任不寐，于二零零四年秋天，被迫流亡海外后，开始写作《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任不寐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于加拿大写的自序中表示，“《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一书结稿的时候，我就写信给这套丛书的策划人宋永毅先生和博大出版社，建议该书在二零零五年中国‘两会’之际出版，因为‘我了解江泽民’，他一定会在谢幕的时候有一次精彩的演出。而这个时候，正是推出拙着的时机。结果的确不出所料，江的最后演出以美国文库恩的《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一书的形式出现了。不过随着合作者叶永烈揭开‘中宣部参与创作’的内幕，该演出构成了这位政治丑角最后的丑闻。”

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的策划人，旅美中国当代史专家宋永毅和博大出版社采纳了任不寐的建议，于四月底出版发行《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象照妖镜一样照出了库恩及其江传的伪劣。

宋先生于六月发表书评《读两本江泽民传有感》，精辟地点出了两本书的本质区别。在宋先生看来，库恩的江传是“一件非常热闹的出版丑闻”，“中共的宣传部一手策划了一个零零一号‘国家大工程’——由一个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捉笔代刀，出版了一本名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官方动用了所有

的宣传机器为此书促销，其规模和宣传大约也是文革中推销毛主席‘红宝书’以来所仅见的了。”而任不寐的新作是“完全相反的民间批判”。“任不寐的新作的要点是‘打假’，而库恩传记则着力于‘乱真’”。

宋先生认为，“当库恩以其‘大脑解剖专业’博士的身份写出种种有违常识的妙句时，只能使读者清晰地窥见他在中国经商获利后的走火入魔，由此看到他精心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江泽民形象。”为此宋先生列举了实例，说明库恩的自相矛盾。库恩花了四年时间，踩在叶永烈们的头上，用五十万字构建的江传，被宋先生一评一比，就象共产豆腐渣工程一样，轰然倒塌。

针对库恩的谎言、江传的荒谬，宋先生表示，“我们只要把这两本关于江泽民的书和作者的遭遇对比一下，便不难看出这一‘天方夜谭’的梦幻性。库恩的书不仅在美国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的保护，发行了英文本；更因为是中宣部的大工程而几乎同步译成中文出版，还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为其促销。而任不寐的书不仅不能在中国出版，还因为他写作此书，连他的妻儿回国都成了问题。可见，江泽民政权的个人和社会自由只给为他们歌功颂德的人，尤其是愿意充当他们御用文人的洋人——这是真的。而对批判他们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又是假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为了批判江泽民和他的独裁政权，任不寐先生只能被迫流亡北美，才终于有了他的写作自由。在如此不公正的对比中，读者怎么能相信库恩博士没有受到中共的收买和腐蚀，而会写出一个真实的江泽民来呢？”

对库恩的江传，海外法轮功学员创办的覆盖全球的中文报系《大纪元》也于五月二十八日作出回应，公告世人：《江泽民传》是“借用一个外国人名义写作”的“矛盾重重、谎话连篇的伪传”，与此同时，推出“还原历史真相”的《江泽民其人》。同年九月，《江泽民其人》在中华民国出版单行本。旅美华人曾勇创办的国际广播电台希望之声也推出语音版。

如果库恩不把自己象鸭子一样赶上架去歌颂江黑心，可能不会有中国人会关注这位美国人中的败类，但自从库恩因伪传走入华人的视野后，与他针锋相对的人事就不曾中断。比如，当库恩声称伪传的“整个写作计划未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合作”时，叶永烈却撰文详细讲述了出书的计划完全是在中共外宣部门的操控下进行，为的是打击“反共反华逆流”。据前哨杂志披露，叶永烈因此已被中共列入“内控”名单。

网民对库恩的谴责也层出不穷，“不道德的人总归是不道德的人，即使他是博士（解剖学？）也是狗屁博士”之类的评语比比皆是。从中可见库恩之不得人心，中共靠他只能自慰。

二零零四年，因发表《向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我听说的一些有关江泽民的事情和传闻》而名扬四海的大陆学者吕加平，在伪传推出五年后，又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揭露江泽民“不是人，是个魔鬼，是中国社会的毒源、

毒根”。而中共媒体披露，库恩的妻子曾说，库恩“爱江主席已经甚于爱我”。

吕加平在接受海外中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揭露出来，很多人拍手称快。北京大学在传，很多大学都在呼应，传播一个多月来，我不仅没被报复打击，而且大家都在支持我，包括当权者，还有体制内的官员，国安等，都支持我，因为我说出了人民长期要说出来的心里话，我是在尽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

吕加平还透露，“去年十二月，有个朋友从北京回来说，在北京的街头看到大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江泽民’，全国老百姓对它都是恨的咬牙切齿的。”

据悉，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已在四大州十七个国家及香港被控告。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同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法庭作出裁决：就江泽民、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的联邦国际刑警逮捕这两名罪犯。

中共媒体号称热销了一百一十万本的库恩伪传能掩盖这些事实？

无论靠强行订购，还是自愿上钩，按江泽民伪传在大陆发行一百万册，每册售价三十八元，作者一般得百分之十的

版税来算，那么，库恩靠给江泽民作伪传，至少赚得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

即使亲共媚共如库恩，他的伪传也被删去至少百分之五的涉及“六四”之类的敏感内容，才得以在大陆出版。库恩只是暗示，江泽民并未卷入“六四”血腥镇压的决策，但流亡美国的前《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张伟国反驳说，当年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下令查封整顿《世界经济导报》，是以邓小平为首的邪恶势力针对以赵紫阳为首的，良心未泯的高干的一个重要步骤。

库恩在作出伪传后，被中共媒体吹捧成国际投资银行家、公司战略家、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慈善家……

虚名和暴利，这应该是库恩投靠中共的原因。不过用良知与公理去换虚名与暴利实属下作。

洋吹鼓手的角色

据中共媒体报道，二零零五年，完成江泽民的面子工程后，“库恩曾多次表示，他将考虑再写一本关于江泽民继任者的书。在此前后，他策划了一项介绍胡锦涛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写作计划。库恩打算以中国社会整体发展为

切入点，用人性化的故事讲述‘科学发展观’带给中国的机遇。”

库恩对中国知之甚少，但却会拍共产党的马屁，因而被共产党“认定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佳人选”。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九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与库恩的会谈中，向他提出这个提议。毕竟二零零八年是共产党在中国人的抗争下，被迫发展经济的三十周年。

库恩在“党妈妈”的提议下，沿袭他从叶永烈处免费学来的路子“通过大量‘花絮’——细节描写深深打动读者”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掩盖七八年以来共产党对中国百姓的压榨和对环境的污染，达到为中共的跛足“改革”评功摆好的目的。

钱权交易的好处，促使库恩不断投中共所好，利用自己美国人的面孔，为中共在国际上唱赞歌。中共媒体报道，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库恩名下的《中国三十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的中文版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与会者有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库恩与谁狼狈为奸，一目了然。引用他自己在中共媒体上的话说就是，“近二十年来，我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亚当先生为了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而进行的所有项目都是针对国际市场的。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制造最大的影响，但是每一个项目的具体目标则各有不同。”

这一次，库恩借“中国改革三十年”为中共向世界宣传，“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因此，我的书将把重点放在论述胡锦涛为中国改革贡献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上。”

库恩说，“我们希望能让读者真正理解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当他读完全书时能明白，三十年改革历程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

谈中共的跛足“改革”不谈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而谈胡锦涛，可见库恩居心何在？

此书比江泽民伪传少一万字，但都是红色封面，延续了伪传的宣传风格。库恩在这本书里向三百多人，其中省部级官员一百位以上鸣谢。

无论库恩怎么宣扬“中国当代领导人的多元化和个人化”，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当然库恩会宣称，“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法，也拥有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所

必需的全球视野”，遗憾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高官也象库恩一样除了美丽的谎言，拿不出能获得民心的实绩。

与库恩相关的还有什么美国国际管理集团 (IMG)，网上有不少与IMG相关的报道。比如，“库恩正在利用自己的声望，帮助IMG大举进入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IMG与山东电视台、山东省体育局合作，旨在山东建立世界顶尖的体育、娱乐、传媒基地；与上海世博会合作，为上海市政府展现国际大都市形象。

即使是中国一些中小型城市，IMG也挟其政治资源，迈出了投资的步伐。”总之，为了追名逐利，库恩什么手段和方式都可以利用。所以有评论称库恩“为了商业利益，不惜为中共涂脂抹粉，与狼共舞，真是像另一个犹太聪明人麦道夫一样，骗人终骗己。”

库恩不仅在中国靠着共产党赚大钱，还打着“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的幌子，拿下中共在海外推广党文化的大单。除上面提到的外，库恩于二零零七年二月，在中共文化部的支持下，把由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演出的杂技版《天鹅湖》带到美国巡回演出二十多周，并安排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时空之旅ERA》去美国巡回演出。

中共媒体的宠儿

库恩为中共效劳，因此成为中共媒体的宠儿，光是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他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伪传新书发布会的翌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在显著地位发表对他的专访，都用一个整版选登他名下的伪传。其中一篇报道称库恩为“新时期的斯诺”。但“新时期的斯诺”再也无法成功欺骗自由世界，德文网上没有任何有关库恩的报道。江泽民伪传的德文版也至今不见踪影。

库恩虽靠拍马屁深得中共欢心，但想在美国兜售红色谎言，却没有靠特权赚钱或在中国出名那么容易。库恩想靠到过中国多次，走过多个地方，获得民众信任，不可能！因为美国接受了太多来自红色中国的难民！以宋美龄为代表的流亡华人、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流亡藏人、“文革”受难者比如郑念、民主墙一代比如魏京生、天安门一代比如唐柏桥、法轮功学员比如王文怡和流亡维人比如热比娅，他们都是有家难归的共产难民。即使他们都不吭声，库恩也很难骗人。所以，库恩的翻译和伙伴朱亚当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库恩和我，可以说‘孤单但不孤独’”。

只要中共给他们名利，库恩与朱亚当不怕孤单，毕竟他们是一对“黄金搭档”。对此，朱亚当自己在中共媒体上说，“现在，我与他在在一起的时间比他爱人还多”。朱亚当还通过中共媒体宣布，他们还约定，不管他们谁先离开人世，剩下的一个还是要继续“用不同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也就是说，他们以搞不同的面子工程，为中共欺骗世界为业，并要致死方休。

库恩出版江泽民伪传时，否认他是中共的洋喇叭，声称“这是我的声音和我的项目”，但涉及“改革”三十年的面子工程太大，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不得不走到台前。于是，库恩改称，“新闻办历任主任都是我的朋友，新闻办主任蔡武（现文化部部长）是一个真正的具有‘科学发展观’的专家。我的许多写作灵感都是在跟他的交流中产生的。”而且“我很高兴这次能得到王晨先生的帮助（现任国新办主任）”。从中可以断定库恩从一九八九年起就与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合作。

库恩不是一九八九年后唯一一个满足共产党的需求，从中共国新办等外宣部门承包面子工程的外国人。与共产党早年的洋鼓手斯诺及其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不同的是，库恩们是连记者和作家身份都没有的商人和政客。

库恩被称为美国花旗集团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的高级顾问、美国国际管理集团（IMG）高级合伙人、库恩基金会董事长、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和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

《朱镕基》一书的作者龙安志（Laurence Brahm）也在此列。龙安志也为中共的对外宣传出谋划策。《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书中介绍了这位中共高干的洋女婿。以目之所及的资料来判断，被外界称为“小骂大帮忙”的伎俩就来自龙安志的建议。

库恩不掩饰自己的卑鄙，他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我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把事实弄准确，而是把我们认为重要的事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给外国读者。”

好在有一系列中华儿女致力于真实地记录红色中国的历史和共产暴政的罪行，让洋帮凶的面子工程不攻自破。

第七章 德国的五毛党

“共产主义幽灵”从一开始就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流氓才子来为它捏造正当性，编造合理性，因为它违背天理人伦，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随着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传播，红祸从欧洲蔓延全世界，造成至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和数亿人非正常活着。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宣告“共产主义幽灵”在世间的运气已尽。

一九九七年，《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的发表则是对它的审判。

二〇〇六年，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在斯特拉斯堡全体会议上通过谴责共产极权专制罪行的决议。

这一切表明欧洲人从思想上到政治上抛弃共产党。

与此同时，霸占中国的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却拒绝顺从民意，弃恶从善，继续靠暴力、谎言和共特维持极权专制，整人运动不断。

“六四”屠杀后十年，共产党开始迫害以法轮功为首的民间团体。中共还是沿用老一套整人手段，先开动宣传机器抹黑对方，再滥用国家机器迫害对方。可是这一套对教人“真善忍”的法轮功不灵。法轮功在迫害中发展壮大，创办了一系列自由媒体，向各国民众报道被中共掩盖的真相，

给仁人志士提供发声的平台。

二〇〇四年，《九评共产党》在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问世，真实地披露了共产国际在中国成立支部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篡夺政权的劣迹，第一次系统地清算了共产党祸乱中国的历史，拉开了中国人从思想上摈弃共产党的序幕。

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中国人每天都在增多，二〇一二年五月，参与三退的中国人已超过一亿一千六百万。可惜却有人明知共产党的罪恶，却为了眼前利益，昧着良心为当权者粉饰太平，评功摆好。这些中共喉舌被讥讽为五毛，遭人鄙视。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中共人民大学作《政府信息公开与网络执政》报告时，有网民向他投掷五毛纸币，并冲他喊“伍皓五毛”，以示抗议。
<http://news.sina.com.cn/s/2010-04-23/010020132601.shtml>

笑话五毛的文章层出不穷。大陆80后作家韩寒在《五毛现形记》中认为，“五毛误国”，“假民意是假货中最有危害性质的一种”。大陆学者萧瀚则发表《五毛类型学》，将大陆五毛分门别类。

可惜五毛不只出现在大陆，就象中共在全球范围开办的“孔子学院”一样，五毛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按萧瀚的分类，二〇〇八年，在德国力挺中共举办奥运秀的张丹红算暴发

户五毛，而她的洋搭档要么算学院派五毛，要么算通俗派五毛，但可统称为洋五毛。因为他们象身在大陆的五毛一样，论说也常常看似充满各种概念，有条不紊，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中共暴政寻找合法性。

在德国的洋五毛不少是毛分子，平时在各自的岗位为中共代言。二〇〇八年，为了声援张丹红，洋五毛集体亮相，被新华社报道称为“49位欧洲名人力挺张丹红 反对清洗德国之声中文部”，企图以此遮掩海内外中国人对“丹红门”的强烈抵制。但因专著《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而遭中共迫害的大陆学者申有连却勇于挺身驳斥这些洋五毛，他在公开信中回应说，“虽然你们是以‘维护新闻报道及科学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保证自律及客观性不受丝毫限制’的名义，但是你们对张丹红指黑道白的戈倍尔式宣传不但不以为然，还为其辩护，对之怂恿，这本身就违背了你们的上述立场。”

鉴于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沦为五毛集结地，在此，先简介二〇〇八年令全球华人瞩目的“丹红门”，再介绍四个与“丹红门”密不可分的洋五毛，以便读者了解五毛党在德国的大概情况。

德国之声的“丹红门”

德国之声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算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冷战时的产物，于一九五三年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开播。鉴于德国之声用短波突破共产阵营的信息封锁，被誉为自由之窗，曾为柏林墙的倒塌立下汗马功劳。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当局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大陆民众的和平请愿，震惊全球，加速了共产阵营在西方分崩离析，白种人得以摆脱共产专制。西德统一东德后，德国之声作过一次大的调整，包括接纳了原东德党国喉舌的部分工作人员。

德国之声也从九十年代起，逐渐发展为有广播、网络和电视节目的公法媒体，是德国唯一一家靠拨税收运转的媒体，现在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工作人员。

在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德国之声搬到统一前的西德首都波恩。

“丹红门”得名于张丹红，是“文革”同龄人，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一九八二级学生，在校时加入共产党。一九八八年，张丹红到德国留学，但于一九九〇年就中断学业在德国之声中文组工作，并于二〇〇四年升为德国之声中文组副组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多由类似张丹红的大陆人制作，其中有四个在“丹红门”曝光后，被指曾加入中共。以张丹红为首的中共党员都未发过退党声明，亦未出面澄清，倒是德国之声领导在德语媒体否认该台有中共党员。

二〇〇八年三月，当中共因血腥镇压藏人，遭到各界谴责并导致其奥运主办国资格受到广泛质疑时，张丹红以德国之声中国专家的身份出面力挺中共，发表一系列违背普世价值的言论，引发公愤。

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也在北京奥运后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本该传播被封锁的信息和声音的自由之窗沦为进出口中宣部论调的“丹红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在土洋五毛的唱和中，把中宣部论调出口转内销，伪造德国民意，糊弄中文受众。

十月二十七日，德国之声的姊妹电台——德国电台用了七分半钟的时间播报围绕德国之声的争端。在这篇题为《令人生疑的帮闲传媒——德国之声中文节目遭到批评》中，记者用具体实例证明，“不必是异议人士也能看出：中文部的新闻报导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宣传的腔调”。

德国电台也是全国性的公法媒体，是在原东德的党国电台开播后，在西德成立的长波和中波电台，曾长期与德国之声比邻而居，并肩而播，是德共喉舌的死对头。共产党在东德垮台后，德国电台也象德国之声一样作了大调整，它的外语组还与德国之声合并。姊妹电台的批评足以证明“丹红门”在德国不得人心。

“丹红门”在遭到德国各界人士和海内外华人抨击的同时，也得到共产党势力全方位地支持，以致张丹红得意忘形地

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上，用谎言报复流亡美国的中国专家何清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德国之声的台长贝特曼还可能继续庇护她。贝特曼是德国红党（社民党）官僚，一九七四年就到过大陆，参观过大寨，见过邓小平，并以此为荣。在邓小平冥诞一百周年之际，他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说，邓小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日中国的设计师是邓小平”，完全无视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贝特曼不仅乐于去大陆享受特权，还乐于与中共驻德大使等为伍。在这样一个官僚的领导下，德国之声不沦为中共之声才怪。

不过贝特曼还一再强调德国之声是人权之声，五毛言论不多。换言之，被称为洋五毛的外国人必须公开地，经常地传播共产党论调。洋五毛也象土五毛一样成群结队，彼此配合。下面就用事实说明支撑“丹红门”的土洋五毛如何在德国助共为虐。

小骂大帮忙的花久志（Georg Blume）

花久志一九六三年生，本来学的是木工活，但不知何故当上应德国环保运动而生的《日报》的记者。九十年代，两大德国左派媒体《日报》和周报《时代》在北京合开一个记者站后，花久志从一九九七年起就是其驻京记者，虽然他不懂中文，妻子是日本人。

针砭时弊，呵护善良，匡扶正义是记者的本职。面对中共在大陆制造的人祸，花久志不得不履行他的职责，但是，他总是避重就轻，回避一党专制是各种问题的关键，绕着弯为中共辩护。在此以花久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武力镇压藏人和维人的态度为例。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一日，花久志在《时代》上发表长文《终点站竹子古拉格 — 绑架、挨打、电击：法轮功教派的追随者在中国的劳改营遭受怎样的折磨》。

一方面花久志陈述了大陆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而遭受残酷迫害和中共用“劳改”来迫害异己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却声称，“但法轮功也并非无辜”，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共的宣传“法轮功导致一千六百六十人死亡，其中二百三十九人自杀”。可是任何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难获知法轮功严禁杀生，遑论自杀。

花久志在文章结尾断定，“如果北京政府不用残酷镇压来对付到处兴起的新宗教（指法轮功），那么，威胁这个国家的就是类似内战的局面。”

花久志不是在关注中共侵害人权，而是在为中共迫害异己辩护，为中共剥夺老百姓的信仰寻找毫无根据的理由。在江泽民把法轮功打成邪教以前，法轮功在大陆传播了七年。集体炼功可能就是法轮功在大陆制造的最大场面，这与“类似内战”可谓南辕北辙。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万人上访，是因天津共警殴打抓捕四十五名学员后发生的，并

且得到了朱镕基的和平解决。倒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共产党滥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发动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整人运动，产生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政治家乔高联合发表的《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足以印证花久志身为记者的严重失职。

二〇〇八年，中共因再次武力镇压西藏人而遭到西方舆论谴责。五月，花久志发表《中国不是邪恶帝国——柏林必须不管西藏向北京靠拢》，自称其写作动机是出于对“西方对待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傲慢态度的恼怒”。他这是在偷换概念，转移矛盾，把自己为人权恶棍张目，说成是为中国打抱不平。在书中，他一边抬高自己表示，“当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统治者时，与他们站在一起，是一名记者的道德义务”，一边诋毁批评中共侵害人权的同行，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等同于侵犯人权，这样的报导是最有市场的”。

众所周知，中共如何辱骂达赖喇嘛，花久志无法掩饰，因此便倒打一钉耙，诬蔑达赖喇嘛使用“文革”语言。他写到，“在过去几年里，拉萨由一个西藏僧侣城市变成了汉人的商业和旅游中心。成百上千的汉人商贩来到这里定居，自二〇〇六年七月青藏铁路通车后，来自北京、上海的旅游团蜂拥而至。很多藏人至今对汉人的大量涌入仍然感到难以接受。但人们是否就因此可以称之为‘文化屠杀’呢，就像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常说的那样？这一概念同样也象是文革语言”。

与此同时，花久志还宣称，“中共很可能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领导中国，没有其它力量可与之匹敌。除了与其对话和合作之外，别无选择。”简言之，花久志无法掩饰中共的罪恶，便将中共和受害人各打五十大板，然后毫无根据地替中共开脱，当然他还得首先无视中共反对派的存在。共产党把中国精英要么杀害，要么囚禁，要么赶出国门，而洋五毛则宣称中共天下无敌！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德国之声中文网以《德国记者眼中的新疆事件》译介一篇德国和瑞士的报道。首先是花九志在《时代》周报发表的评论《血的和谐》。这一次，花九志表示，“不应过急地批评中国的军警。与去年西藏首府拉萨一样，他们面对的是意图使用暴力的示威者，这些示威者看来想发泄对数十年受屈辱、受歧视的不满怒火。当时在西藏，军警甚至更多地表现了克制。中国这个独裁体制内大多情况下没有进攻型的警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很可能也是这样”。共警到了他的笔下居然成了被动的受害者。如果共警象他说的那么讲理，杨佳就不会被迫在二〇〇八年中共的生日，用生命向共警讨说法了！

接着花久志表示，“中国每年有八万多起较大规模的冲突和抗争，通常警察不使用武力就能平息。过去三十年，资本主义大放手，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并没有随之爆发较大的暴力行动，这确实是一个政治奇迹。它证明，共产党用儒家理念处理冲突与所谓明智镇压相结合的做法具有高度艺术性。”共产专制导致的人祸到了他的笔下居然变成了

中共的政绩！

花久志的报道大致是这个模式。他总是竭力美化中共的暴政，混淆中共与中国，用被中共绑架的人民来掩饰中共的罪恶，试图把民众的功劳算在中共的头上，堪称“小骂大帮忙”的德国典型，容易迷惑不分中共和中国的受众。

被张丹红热捧

花久志在《中国不是邪恶帝国》里编造了不少理由，美化中共暴政，其中包括经张丹红之口引发众怒的“中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对实现人权宣言的第三条作的贡献都要大，因为中国成功地把四亿人从绝对贫困中解脱”。

我曾专门给张丹红发去电子邮件，希望与她交流，可是遭到断然拒绝，就是说，张丹红择共固执，无意反省。我只好奋起驳斥，告诉公众：中共夺取政权后，杀害无数有钱人，在前三十年造成了国民的普遍贫困，并剥夺了至少八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其中活活饿死四千万；后三十年被迫给老百姓松绑，美其名曰“改革开放”，不过，当天安门一代带头示威请愿，要求反腐败，反官倒……中共还是一如既往将请愿民众扣上“反革命暴徒”的大帽子，并开了中共历史上用坦克血腥镇压百姓的先例，从此大小惨案不断。大陆人民至今会因捍卫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自己的

房产等人权遭到残酷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张丹红身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德国声音”的记者怎么能不声援受害者，反而为共产党辩护？

面对外界的批评，贝特曼为了保护她，在八月特发通告宣称，“从多年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张女士无一例外地认可德国之声所有的价值准则，并模范地体现在她每天的记者工作中”。通告中还说张丹红自己已向贝特曼表示遗憾，贝特曼则决定在核实所有谴责之前，停止她播音和以德国之声记者名义参与公共讨论。岂知中共驻柏林的新华社笔杆子时翔则于二十八号发表报道《“德国之声”记者因“亲华”被停职》，扭曲事实，为张丹红撑腰。

时翔身在德国，却似乎不明白德国的价值观，以及民主社会的媒体和知识人大多不是政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是在遵守宪法界定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各有立场和观点。张丹红是因为违背了德国之声必须遵循的价值观而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惩罚。简言之，中共笔杆子从一开始就把拥共的张丹红吹捧成爱国英雄，诬蔑其批评者，包括德国之声，并借此诋毁德国媒体、自由民主和法轮功，试图用伪爱国主义掩盖真相。其中以二十九日署名窦含章的评论《德国之声停职张丹红重现纳粹幽灵》为最。

张丹红居然用在德国也禁止儿童色情和新纳粹网站，来为中共封锁自由西藏和法轮功网站诡辩，就足以证明她没有认可民主宪政的价值观。张丹红在德国媒体上力挺中共，每次都遭到反驳，但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上张丹红却可以

与花久志等洋搭档一起为中共唱赞歌。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德国之声中文网站发表张丹红对花久志的专访，题为《中国不是罪恶之国》。张丹红在导言中宣称：“德国‘时代周报’驻京记者花久志（Georg Blume）是德语媒体报导中国的最出色记者之一。从1997年开始，他致力于向德国读者展示一个处于经济、政治、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他的报导既揭露中国的问题，也肯定中国的积极变化。今年3月以来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偏激报导以及德国政府两年多以来对华政策的变化使他有感而发，撰写了题为‘中国不是罪恶之国’（China ist kein Reich des Bösen）的长篇杂文，最近在德国出版。”张丹红吹捧花久志，因为他们都在积极为中共排忧解难。

这篇专访发表后，立即得到中共喉舌广泛转播，有的将标题改为《德国媒体驻京记者：西方出于经济原因恐惧中国》，不过删去了诸如“左翼自由派，中产阶层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就一直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中国，视中国为独裁政体”等内容。

张丹红的提问被删了两个，其中之一是，“您在书中也批评了您的记者同行，说他们也对中国在德国被歪曲的形象负有责任。我再引用您的一句话：‘几年来，德国的政治性新闻报导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描述为最恶劣的践踏人权者。中国共产党等同于侵犯人权，这样的报导是最有市场的。’能不能反过来推断，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您想提供一篇有关中国的积极的报导，而德国国内的编辑

部说，我们对这样的报导不敢（感）兴趣？”花久志的回答：“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我写的积极报导都被接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应当批评中国共产党。当然中国政府应当对很多事情负责，我们必须提出批评……”也被删除。

就是说，即使是公认的五毛也无法在中共媒体享有言论自由。可是花久志却能够在德国发表他的媚共言论。他自己吹捧中共不够，还要诋毁批评中共的人。

诋毁默克尔

在上述访谈中。张丹红问：“您在书中称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是对抗路线。我引一句话：‘是她为德国公众将中国视为罪恶之邦的投影提供了政治土壤。’这样说不是太重了吗？”

花久志答：“默克尔在上台初始就对中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她在首次出访华盛顿时就说，中国是一个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国家，西方必须共同对抗中国。这与德国一向对中国所保持的态度完全不同。在默克尔之前，德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努力接受西方规则的国家，不只是世界经济的规则，还有民主、人权，中国在逐渐地适应，而不是将中国摆到对立面，视中国为另外的体制。而这正是默克尔所做的。”

默克尔生长在共产极权专制下，对共产党国家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因此，她当选为德国总理后，曾力主人权价值观，区分民主国家和极权专制，成为五毛抹黑和攻击的对象。

花久志一边诋毁默克尔，一边赞赏中共在德国的老朋友前总理施密特。张丹红在访谈中说，“您在书中引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话，他称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30年中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就是说，张丹红在采访中竭力促使花久志为中共唱赞歌。不仅如此，张丹红还要借洋五毛之口批评默克尔和她的政党推出的人权价值观。接下来，张丹红便说，“德国执政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去年10月推出新的亚洲战略纲领，认为中国对西方构成体制上的挑战。如果您上面的说法属实，那么联盟党的推论就是荒谬的。”花久志回答：“这份亚洲战略纲领将中西方两种政治体制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两种体制发生变化的过程。我们的体制也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渐渐地转变，两种体制其实在彼此接近。这份纲领制造了人为的政治对立，既毫无必要，又十分危险。”

中共自己不放下屠刀，坚持屠杀异己，但是土洋五毛却要受害人放弃反抗，相信中共不害人。谁同情受害人，不以中共为友，就会遭到土洋五毛围攻。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花久志还在《日报》上发表评论《女总理想调解财政危机 — 默克尔在中国做自我批

评》。默克尔作为主要发言人出席在北京的亚欧峰会，被他描述为，“她表现得象在扮演一个正在学习的孩子并不做自我辩解地接受中国人的愤怒”。默克尔在德国接待达赖喇嘛，五毛要群起攻之，代表德国到北京出席会议也要被五毛讥讽，因为女总理比前任重视普世价值，区分中共当局和中国民众，关心中国居民的人权。

投靠中共的黑伯勒（ Thomas Heberer 中文名王海，随其岳父姓）

黑伯勒生于一九四七年，一九六七年进入大学，学习政治学、汉学和人类学。这一年“小文革”在德国暴发，十年后，当“小文革”结束时，黑伯勒也获得博士学位，并前去大陆为中共的外宣刊物《北京周报》工作，历时三年。对此，黑伯勒在其大学个人网页上公布的简历上却表示在“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当翻译和编辑”。

《北京周报》是在中共开始搞“大跃进”那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外文宣传品。先出英文版，后相继出法、日、德、西班牙文版。

《北京周报》中文网站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发表专访《托马斯·海贝勒：我和〈北京周报〉的故事》，开头是，“2008年3月31日，北京周报社迎来了一位来自德国的特

殊客人：托马斯·海贝勒。托马斯·海贝勒现任德国埃森-杜伊斯堡大学东亚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30年前是北京日报社的一员--曾任《北京周报》德文版德文专家一职。”

黑伯勒在这篇专访中透露，“我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中国同事翻译的德文稿进行文字润色。此外，还有部分的翻译工作--把英文或者中文文章翻译成德文。当然，有时候，我会自己为《北京周报》德文版撰写文章，并且就杂志的编辑出版提一些建议。”这足以证明黑伯勒算中共的德国同志。他一九七五年就去过大陆，可能也象贝特曼一样学过毛语录，参观过大寨。在专访中，黑伯勒自己承认，“当时所有来中国的外籍专家，包括我在内，都几乎是出于政治原因来中国的。首先，北京日报社是一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媒体，它将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观点对外传播。”

中共夺取政权后，护照和签证都成了中共要挟民众的工具。大陆居民，如果公开反共，得不到护照；外国人如果公开反共，就得不到签证。在黑伯勒进入大陆时，别的外国人要想到中国，必须加入旅游团。种种现象表明黑伯勒可能是德共成员，毫无疑问他是中共信任的德国人，并在离婚后，于一九七九年成为一中共高干的洋女婿。

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从北京到德国，黑伯勒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与中共当局始终保持步调一致。

因此，黑伯勒既是中共媒体惯于引用来驳斥他人的“德国

中国问题专家”，又是渗透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中共党员用来包装中宣部论调的洋五毛。

配合中共不遗余力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后，黑伯勒便开始以专家身份在各种场合，以各种说辞诋毁法轮功，专门发表了一本四十页的小册子《法轮功 — 宗教、教派还是崇拜？一个救世团体 — 作为现代化问题和社会异化过程的标本》(Falungong - Religion, Sekte oder Kult? Eine Heilsgemeinschaft als Manifestation von Modernisierungsproblemen und sozialen Entfremdungsprozessen)，还供网民免费阅读。

黑伯勒开宗明义表示，“以下内容不是讲述应该受到谴责的在中国对法轮功追随者的迫害、镇压和毫无疑问的严重人权侵犯。花久志在时代（周刊）发表的可怕报道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在中国被迫害意味着什么。”

这本看似客观的小册子实质上是黑伯勒费尽心机，把中共的相关宣传，用学术和德文包装来抹黑法轮功的产物。比如，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表示，法轮功不应该被看成是 Sekte，（这个词在德语里原意是教派，但在现实中往往含贬义），可是，他自己却一直把法轮功称作Sekte，有时还

要在前面加上“政治”。有法轮功学员去找他澄清事实，他却倒打一钉耙，说法轮功迫害他。

二〇〇八年二月，流亡华人和德国法轮功学员齐心协力邀请美国神韵艺术团到德国演出，让德国人通过舞台艺术见识中国文化的博大和中共暴政的残酷。黑伯勒则响应中共的号召加以诋毁，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也于二月十四日在栏目中国短讯发表《黑伯勒教授批评法轮功和在德国举办的“神韵”演出会》。

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成为众矢之的后，想来责任人为了销毁被红色渗透的证据，将这篇短评内容删除，以致这篇报道只留下上述标题，无法读到原文。

二〇〇八年九月，有德国法轮功学员忍无可忍专门撰文驳斥黑伯勒及其小册子。文中表示，“从我们的角度不难看出，他实质上是在试图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开脱”。

可喜的是德国之声中文组改组后，于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六日发表报道《“神韵”第四次在德演出》，一名观看了表演的德国女记者报道了各方的反应，结尾写到，“2007年成立的神韵艺术团不被允许在中国演出。原定2010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演出由于签证问题而不得不取消。不过，德国的观众现在就有机会观赏神韵的演出。观众们这样评价：‘棒极了。’”就是说，虽然黑伯勒象中共的使领馆人员一样竭力抹黑法轮功，但并不影响法轮功在德国赢得人心和获得支持。我也是二〇〇二年，才开始了解、认同和捍卫

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再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真、善、忍”。

被中共视为敌人并遭到镇压的不只是法轮功，所以，黑伯勒企图抹黑的也不只是法轮功。二〇〇八年三月，藏民的反抗被中共血腥镇压后，黑伯勒于四月十六日，在德国左派媒体《日报》上发表《西方歇斯底里的行为——被妖魔化的中国》。导言为“奥运前西方媒体的态度表明：中国自七十年代改革以来的变化被遗忘了。十四个论点”。

这篇长文见报时，我正好应国际大赦多特蒙特之邀在当地业余大学讲演，前来采访的一名记者向我提起此文和他的疑惑，令我再次明白黑伯勒扮演的角色，他真可谓时刻听从中共的召唤。

果然，新华社也因此对黑伯勒进行专访，并在导言中特别强调，“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他曾于4月16日在德国《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抨击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

这篇专访的标题《德国媒体为何“妖魔化”中国“炮轰”缘于中国崛起》堪称黑伯勒的十四个论点的宗旨，自然被中共媒体广泛转载。黑伯勒试图以他自一九八一年起，“每年都在中国不同地区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来证实，“达赖喇嘛声称西藏存在‘文化大屠杀’的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我认为它是在火上浇油。”在达赖喇嘛和洋五毛之间，德国人可以选择。谁有信誉，不言而喻；可大陆人却被中共剥

夺了解达赖喇嘛的权利，只能听到洋五毛的声音，被强迫灌输中共之声。

与此同时，黑伯勒也象花久志一样强烈抨击二〇〇七年十月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通过的“亚洲战略”，因为这个文件提出，德国外交要以普世价值为本。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治家认为国家间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只能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为基础。这个文件出台后，立即遭到中共及其五毛的诬蔑和诋毁。在这篇专访中，新华社又借黑伯勒之口胡说，此文件“明确提出，不能让亚洲的崛起（指的是中国）导致德国衰落。”中共总是借五毛抹黑它的对手及其主张以混淆视听，获得支持。

总之，每个反专制极权的知识人都可以发现，黑伯勒与花久志的言论都与中宣部的口径一致。可惜他们不是韩寒所说的“低级娱乐型”五毛，因而容易迷惑一般读者。

与张丹红荣辱共存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丹红与黑伯勒一起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上力挺中共举办奥运宣传秀。这篇访谈的题目为《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张丹红在导言中如此吹捧黑伯勒，“前不久，德国奥林匹克学院在法兰克福举办名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报告和研讨会。德国著名汉学

家黑伯勒教授以中国政治体制为内容发表精彩演讲，阐述为什么他认为将奥运会举办权交给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本台记者张丹红在报告之后采访了黑伯勒教授。”

张丹红在德国媒体的媚共言论引起外界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关注后，这篇访谈是德国之声中文节目被红色渗透的例证之一。因为张丹红与黑伯勒一唱一和为中共评功摆好，颠倒因果，抹黑德国媒体，诋毁默克尔捍卫民主人权……就是在这篇访谈中黑伯勒宣布，“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中国稳定和富裕的保证”！

这篇长达十分多钟的访谈的文字版发表后，于第二天在《中国问题专家黑伯勒谈德国的中国讨论》标题下，发表语音版和黑伯勒穿着红背心，戴着红帽子在大陆街头为中共站台的照片。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507140,00.html>

当中共《环球时报》驻德国喉舌刘华新名下的宣传《德作家联名要求议会审查“极权国家”报道》于九月二十六号起，以不同的标题在中共媒体上刊发，表示“支持张丹红的仍大有人在，其中也有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德中友协人士和中国问题专家”后，十月九日，以黑伯勒为首的洋五毛便在德文网上发表支持张丹红，抹黑批评者的公开信。十月十号，刘华新名下的宣传《49位欧洲名人力挺张丹红 反对清洗德国之声中文部》就在人民网上发表并被广泛转载。

刘华新声称，“公开信还揭露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本来面目，指出那些人不是‘法轮功’分子，就是和‘法轮功’有联系”。就是说，黑伯勒试图给德国之声的批评者贴上“法轮功”标签来达到抹黑他们的目的。这自然是徒劳的，因为在德国也象在大陆以外的各个国家一样可以自由地了解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

这封公开信在得到中共媒体的热捧时，也遭到中德两国独知的抨击。其中以留德学人报主编钱跃君为首的五位华人用德文发表致德国议会的公开信，用事实驳斥黑伯勒等人善恶不辨，“不敢谴责共产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相反诬蔑有利无害的法轮功。

《柏林日报》也于二十一号发表报道《给宣传机器的火药》，介绍黑伯勒的公开信和来自中华民国的华裔发起的与之针锋相对的公开信《请向权力说真话》，报道中写到，中共反对派对德国的汉学者说“我们深感遗憾，你们没有秉承德国深厚的人文传统，也没有间接受到汉文化里志士仁人的熏染。”

流亡德国的中国学者还学文在《回应49位有色欧洲学者》中，斥责他们“归顺到一个专制政权的旗下”。还学文介绍的著名毛分子中也包括黑伯勒，还学文说，“他大学网页的中文版上赫然刊载着三月份拉萨弹压后新华社的采访《德国媒体为何‘妖魔化’中国 ‘炮轰’缘于中国崛起》，他和中国官方的两情相悦跃然网上”。不过我在他的大学网页

上没有找到提到的劣作，可能他任职的大学也开始抵制红色渗透。

貽笑大方的“中国通” 弗兰克·泽林 (Frank Sieren 又译名 弗兰克·西仁)

泽林一九六七年生，在大学学的是以经济为主的政治学。一九九四年，泽林作为《经济周刊》记者进驻北京，然后借助红色势力包括施密特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成为共产

“中国通”，虽然他根本不懂中文，遭德国的同行比如路德维希港经济学院的教授鲁道夫 (Joerg-M. Rudolph) 笑话。

在德文大纪元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对鲁道夫的专访《中国在财政危机中的角色》中，针对记者所言，“以鼓吹‘中国奇迹’出名的人物之一是记者和作家弗兰克·泽林”。鲁道夫回答说，“弗兰克·泽林连中文都不会，就别期望他会了解中国的什么。懂点中文，这是最起码的。所有做不到这点的人，都不能算中国通。当然他们可以有这个名气。但是您可以开始写，他们一窍不通，因为他们连语言都不会，文字都不识。”

泽林也不敢与真正的中国通对话。北京奥运前，德勒斯敦 (Dresden) 的公民电台邀请他和流亡学者仲维光对话，

他答应得好好的，可到时却失踪了。这种作风在严格甚至刻板的德国社会十分罕见，然而却在泽林身上出现。对泽林的爽约，仲先生不奇怪。仲先生认为，洋五毛也可称为洋泼皮。无论学问和人品，他们本来都上不了大雅之堂。但借助于共产势力，流氓才子得以欺世盗名。在极权专制的共产社会，奴才泼皮是座上宾，正人君子是阶下囚。

也因此，泽林会被德国之声中共党员视为中国通，仅在二〇〇八年，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就专访了泽林至少三次。

支撑“丹红门”的洋五毛

第一次在四月二十日，采访者是张丹红，文字版标题为《泽林谈西藏危机：“西方不能再帮倒忙”》，语音版于四月二十二日上网，标题为《德国资深驻京记者泽林谈西方媒体、政界与西藏问题》。

在文字版导言中，张丹红强调，泽林“刚刚出版的‘中国震惊’分析中国在伊朗、蒙古及非洲的活动，驳斥有关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点。他对中国的看法区别于目前西方的主流，因而在德国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前不久在波恩的‘相遇中国’系列活动中与泽林同台讨论之后，就目前的热点话题西藏采访了他。”

泽林成为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红人，显然是因为他与张丹红都是中共的辩护者，而批评中共的何清涟其时已被张丹红排挤出德国之声。张丹红在这篇专访中对泽林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为中国辩护，您是否因此不再受到媒体的青睐呢？”可见张丹红以己度人。但泽林的回答与花久志的回答类似，“不能这么说。因为媒体毕竟希望听到两种声音”。可惜在张丹红的把持下德国之声中文节目至少有两年时间变成了中共之声。

德国之声在中共的压力下，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起，完全中止采访何清涟。二〇〇七年五月，原大陆法学教授袁红冰去比利时参加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在德国停留，我曾与张丹红联系，希望她采访袁教授，但被婉拒。可惜那时我没在意，不知其时中文节目已沦为中共之声，不采访真正的中国通了。

第二次借德国之声热捧泽林的五毛使用匿名。六月二十九日这篇专访的标题为《中国通泽林：西藏事件和大地震中怎么看中国》。请看土洋五毛如何唱和。当泽林声称，“西方媒体和政客采用了对抗性的、强烈而轻率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后，土五毛表示：“对。在过去一段时间，德国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成就报道很少，而总是抓住中国的问题不放。

泽林：在竞争的压力下，很多人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或者说，很多人要尽可能的抹黑中国。……但是作

为国家采取这样处理方式是令人忧虑的。”

泽林身为德国人，知道在德国没有一个中宣部来发号令，来抹黑谁，他凭什么发表上述言论？对中共的批评不都是每个记者、每个媒体的自发行为，与“国家”有何关系？被纳税人供养的德国之声从某种意义上可算国家电台，可德国之声什么时候“抹黑中国”？

最搞笑的是土五毛问，“您是否同意施密特总理的看法：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应当由中国民众自己决定，而不是由西方的价值观决定？”

洋五毛回答：“对。虽然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但是只要成千上万中国民众不走上街头反对政府--这当然也是中国政府避免发生的--就证明了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时，泽林已成人，可惜他却昧着良心，认为调动坦克镇压民众和平示威的中共还有合法性。不仅如此，泽林也不忘攻击默克尔。

泽林以他在红色中国享受特权的生活经验来诋毁默克尔，说什么“对于没有外国生活经验的默克尔总理来说，她显然不太明白这点，她一直都是以政客的身份来了解外国的”，可是默克尔在东德生活过，太清楚被共产党专政的国家如何运作。

十月二十六日，第三次热捧泽林的不是别人，正是因工作合同不被延长而控告德国之声的女主角祝红。标题《专访：〈中国嫖娼经济〉一书作者》。这篇报道图文并茂，把极权中国打扮成了“国际记者向往之地”。祝红这样向中文读者吹捧泽林，“从1994年踢（踏）上中国土地的那天起，他便留在了那里，一晃已是15个春秋。他堪称东方雄狮睡醒的见证人。德《周日世界报》称其为最资深的中国通之一，伦敦《泰晤士报》则视其为德最权威的中国专家之一。如今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是《时代周报》驻京记者，同时为第二电视台等拍摄中国纪录片，也是畅销书作家。继《中国密码》、《与中国为邻》、《中国震惊》之后，他又推出新作《嫖娼经济》，副标题是：为何西方企业在华难以取胜，中国人冲击世界顶峰。”

这篇专访透露泽林“因疾步快跑弄丢了鞋跟”，对大陆制造的鞋子给他带来的麻烦“泽林倒也满不在乎，他兴致勃勃地透露，《中国密码》一书已被译成中文，即将出版，内容有所删减，《与中国为邻》也已翻译完毕，译者是前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能得到被德国人比如鲁道夫称为“老斯大林分子”梅兆荣亲自翻译的书籍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

但《与中国为邻》能得到梅兆荣青睐，应该是因为泽林这本书的合作者前总理施密特。这位中共在德国政界的老朋友任期未满就被赶下台，但因此可以经常到大陆享受特权，并以此冒充“中国专家”，堪称德国最大的五毛，值得专门介绍。泽林在与他合作后，便成为施密特为出版人之一的周报《时代》的驻京记者。

现任总理默克尔却因不象施密特那样媚共而遭到土洋五毛的诋毁。泽林在新书里也不忘借一名进入中国市场的德国中型企业主之口，攻击默克尔。尽管如此，默克尔还是再次当选德国总理。

响应新华社的召唤

泽林也算刘华新所预告的支持张丹红的“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泽林不仅签名支持黑伯勒的挺张信，还于同天在《时代》周报发表长文《假想间谍在德中两国制造争端——有关记者张丹红的罕见争论》。此文竭尽歪曲之能事为张丹红开脱，甚至把民主力量与中共势力围绕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较量，丑化为我出于嫉妒而挑起的针对张丹红个人的“运动”。

刘华新于第二天在中共媒体发表《德国著名记者弗兰克发表长文为张丹红的遭遇鸣冤》加以宣传。但连刘华新都不认同，我“这位流亡诗人，成功地说服自由记者庞佩莉和海音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张的运动。”因为刘华新在其报道中写的是“现在，流亡德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徐沛和德国记者萨比内·潘帕里安、杨一菲利普·海因等人一起，发动了一场针对张丹红的运动”。就是说泽林比刘华新还会撒谎，居然编造我“成功地

说服”的谎言。事实是张丹红引发众怒，我只是批评者之一，因为我不能无视中共渗透德国，五毛伪造民意。

弗兰克的长文见报后，立即遭到庞佩莉和海音的反驳。他们于十二日在网站《善良轴心》发表长文明确表示，这位时常在德国之声被他的主人公张丹红采访的“中国专家”写出了一篇与中国官方新闻社新华针抹黑西方媒体的宣传一致的文章。此文把“谎言、假象、臆测、虚假的事实和事件的秩序混为一谈”。接下来，他们逐一驳斥了弗兰克的不实之词。《时代》周报没有在其网站上刊登弗兰克这篇违背职业道德的宣传稿。

我则于十六日在一家关注中国的德语网站发表相关文章《听从呼唤的弗兰克》，用事实指出黑伯勒和弗兰克与中共及其媒体的密切关系。

洋五毛为中共效力，自然会得到各种好处。当然外界能看到的只是中共媒体对他们的吹捧，比如，中共驻汉堡总领馆也会在其网站上表示，“泽林被称为德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伦敦《泰晤士报》称他为德国的‘中国通’。他曾长期担任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他的作品《中国密码》以及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合著的《与中国为邻》出版时都曾引起轰动。”

背叛导师的桑德施奈德 (Eberhard Sandschneider)

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频频露面的另一位学院派洋五毛是桑德施奈德。一九五五年生。一九八六年以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军事和政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导是享誉自由世界的德国学者多默斯

(Juergen Domes)。多默斯也是遭德国毛分子攻击的真正的大右派、坚定的反共人士。桑德施奈德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出任柏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工作重点是中国和东亚。

桑氏不仅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美化暴政,还出面力挺张丹红,完全站到了多默斯及其夫人的对立面。可惜多默斯已于二〇〇一年过世。我猜想桑氏也是在这之后才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并逐渐变红,成为笑料,被人当面戏称为“中共大使”。

不过从二〇〇六年六月,桑氏接受海德堡大学中文系校友网的德文访谈中还看不出他是洋五毛,因为他明确表示,“百分之八十从德国去中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不到钱”,“中国是问题很大的市场”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人权侵犯”。

在德国之声的表现

仅从二〇〇七年三月到第二年三月，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就采访报道了桑德施奈德十多次。在三月十六日的访谈《德国“中国通”谈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中，桑氏的表现还不反常，可能因为他面对是一位靠申报政治庇护留在德国的原大陆记者。德国之声中文网的导言是，“中国对外宣称‘和平崛起’，对内建设‘和谐社会’，而对某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而言，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出现不和谐音符的象征。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席桑德施耐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可是接下来桑氏好象就开始与黑伯勒在德国比赛谁更会拍中共的马屁。九月二十三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他的标题已是《再访“亲华专家”桑德施奈德教授》。凡中共媒体或受中共操控的媒体称为“亲华专家”者必定是媚共专家。这次采访桑氏的又是一个匿名的五毛。土五毛这样介绍洋五毛，“德国外交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教授曾多次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他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客观、冷静，受到中国听众和网友的赞扬。而在德国，他不时受到媒体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的批评，说他对中国过于友好。”谁也不可能批评洋五毛“对中国过于友好”，这是土五毛在混淆中共和中国，试图把媚共专家包装成“亲华专家”。

接下来土洋五毛便借德国之声一起抹黑西方媒体，混淆自由世界与共产中国的本质区别和根本矛盾。

土五毛说：“此间媒体充斥了对中国的消极报导。翻开这两

天的报纸，你会读到‘中国黑客袭击西方政府部门’、‘美泰警告来自中国的危险玩具’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这是媒体的炒作吗？还是中国确实是一个比较愿意犯规的游戏伙伴呢？”

洋五毛答：“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爱犯规。……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出现产品质量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日本、台湾也有过类似的现象。”

二〇〇七年九月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这本来是德国的内政，但中共及其喉舌却干涉德国内政，不遗余力地攻击默克尔。潜伏在德国之声的中共党支部也一马当先，大力传播洋五毛对默克尔的批评，虽然支持默克尔的人更多。这也是德国之声沦为中共之声的一个明证。

三个月之后，张丹红对此还耿耿于怀，并专门撰写报道《从“前进”到“冰点”：德中关系如何修复》，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底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德中关系迅速降温，日趋紧张。北京中断了多项与德方的双边会谈，取消若干文化交流项目。中方认为，默克尔总理作法最欠妥的是，她在会见达赖喇嘛前不久才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是只字未提她这一会见安排。默克尔总理此举对德中关系造成的影响比想象的严重得多。”在这篇综合报道中张丹红又借桑氏之口批评默克尔。张丹红还有意把提倡价值观外交的“亚洲战略”说成“其中把中国看作成首要的竞争对手”。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治家怎么会把中国看成是“首要的竞争对手”？德国一直到二〇〇

九年，每年都向大陆无偿提供七千万欧元的“发展资助”。为了诋毁默克尔捍卫普世价值，五毛什么谣言都能造。

到了二〇〇八年三月，西藏人再次起义后，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则于三月十八日发表添油加醋的报道《桑德舌战西藏问题：假如发生在巴伐利亚德国会怎么做》，其导言为，“3月18日下午，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教授进入德国电视一台‘每日专题新闻’网络版聊天室，与读者谈西藏问题。他说，中国汉人绝对支持西藏属于中国，包括台湾人；西藏人也并非全部想法一样；假如中国支持巴伐利亚独立，德国也会禁止干涉内政；德国大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办奥运是错误，说明对中国的恐惧占了上风。德国之声记者整理并翻译如下”。

从原文来看，学院派洋五毛的水平比潜伏德国之声的土五毛水平高，因为他没那么肉麻。不过，桑氏面对读者的各种问题，总有话可说，但他视中共为中国人的合法代表并要西方屈服于中共暴政的立场不变。土五毛则想利用洋五毛之口把德国民众抵制人权恶棍举办奥运诋毁成德国人害怕中国强大。

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时常会被中共封锁，但对洋五毛的报道会被中共媒体广泛转载，比如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专访《桑德施耐德谈中国军事：究竟是谁威胁谁》也获得如此青睐，虽然标题变了，有的是《德国之声访桑德施耐德：视中国为敌者终将成敌》，有的是《德国之声：这对北京来说确实是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

二日张丹红对桑氏的专访《默克尔访华前夕桑德施耐德谈中国和德中关系》更是得到中共媒体的广泛转载和报道。

《香港文汇报》也不仅转发了这篇采访，而且在《默克尔访华前张丹红复出德国之声》的标题下，加了颠倒因果，扭曲事实的按语。

中共高级统战人员

二〇〇八年五月，旅德社会学博士王容芬第一个首先撰文公开批评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指出其对达赖喇嘛的报导混乱、失实。之后她还发表多篇文章介绍围绕“丹红门”的正邪较量，其中包括针对上述张丹红与桑氏的“二人转”的评论《香港文汇报、德国之声和德国统战人物联袂出击，对德国总理访华施压》。

王容芬在评论中不仅分析了“二人转”的内容，还透露，“桑德施耐德早已成为中共高级统战人员，名字不时现于《人民日报》。桑氏在众多采访中为中共外交和军事政策说话，称‘谁对中国采取对抗的策略，将中国视为威胁，甚至是敌手，那么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最终也就会变成他的敌人。’其新著《全球对手——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无能》警告西方，不要把中国的和平发展逼向武力对抗。”

桑氏在二〇〇七年发表的这本书立即得到中共媒体的报

道。三月十五日，中国网就转载参考消息的报道《桑德施奈德新著摘选：西方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可想而知，桑氏确实是被统战的高级洋五毛。总之，桑氏希望德国不要老指责人权恶棍，要承认中共的成功模式，要与中共暴政和平共处。对此中共媒体表示，“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是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自己的新著中强调：中国的崛起并非必须导致西方的沉沦，另外，一个稳定的东方也符合西方的利益。”

桑氏也被中共媒体引用，在《国外热议“中国道路”及其启示》中说，“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今年1月对记者说：‘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一边制造人祸，一边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需要洋五毛来为自己站台！

综上所述，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就是在土五毛与洋搭档的唱和中被赤化成中共的传声筒。洋五毛自然会力挺受到惩罚的张丹红，也会象中共一样抹黑对手，颠倒是非，把土五毛打扮成受害者。

德国之声是唯一一个由德国纳税人供养来宣传人权民主自由的公法媒体，但以张丹红为首的中共党员却把中文节目变成了土洋五毛的碰头点。如果不是张丹红护共心切，在德国媒体上露出真面目，没人会想到去检查德国之声的中

文节目。既然发现德国之声成了媚共之声，身为德国纳税人，流亡华人当然要奋起声讨，自然也会得到中德两国民主力量的支持。

韩寒说，“五毛误国”，其实五毛主要误人，首先误己。在德国的五毛与在大陆的五毛一样，会因投靠中共而一时走红，但免不了被人们耻笑，被历史淘汰的下场。

但愿德国的五毛党还能在人们的耻笑中，弃共从善，改过自新。

第八章 中共在德国的老朋友施密特

二〇〇九年，既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协助西德居民，摆脱法西斯极权专制走上民主共和，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六十周年，又是共产国际在大陆颠覆自由的中华民国，建立共产党极权专制的六十周年。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八个分属两个民主党派的政要当选为总理，在以他们为首的德国政府的带领下，战争废墟上的德国变成了一个富裕的自由国度。共产党窃夺中国大陆的政权后，谋财害命，祸国殃民，剥夺了大陆居民的一切人权，包括生育权。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无不血债累累。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流亡，中国尤其上海也曾是德国犹太人的避难地；共产党专政后，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流亡，德国尤其西德也成为中国大陆人的避难地。

照理，自由世界的政要与共产党的领导水火不相容，是天敌，然而，自从第四任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在红色势力的渗透下，开始以各种借口与共产极权来往并建交后，德国的第五任和第七任总理——施密特和施罗德都沦为共产专制及其暴君的吹鼓手。施密特和施罗德象勃兰特一样属德国社民党，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政党，与共产党同根，但不主张暴力夺取政权。

二〇〇八年，在德国之声的“丹红门”曝光前，施密特就引起中共反对派的批评。德国之声的中共党员把洋五毛轮番邀请到中文节目中，一起变着法子，打扮中共暴政。在中共及其党员青睐的德国五毛中，施密特名气最大，有“施密特大嘴”的称号，因为他能言善辩，欺世盗名。

出自“施密特大嘴”的“垃圾论”也通过“丹红门”进入中文世界，障碍华人视听，值得加以清理。

赞美与希特勒、斯大林齐名的罪魁祸首

出自“丹红门”的施密特言论不少，其中有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的《施密特眼中的毛泽东和中国》，以及引言“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在外交政策上像中国一样小心谨慎，世界就会太平些”。

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比张丹红还红的一个女五毛专门花费德国纳税人的钱，从科隆到汉堡采访施密特。原标题是《专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女五毛在导言中特别强调，“施密特曾于1975年到北京会晤毛泽东，也是唯一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这位已87岁的老人今年九月底将推出专著‘邻国－中国’，其中关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明显有别于西方主流观点。”注意，施密特与另一个洋五毛泽林

的谈话录还没有发表，女五毛已经知道内容并开始为之宣传！

接着，女五毛声称，“‘如果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够在外交政策上象中国一样小心谨慎的话，那么世界将要太平得多。’这是施密特在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专访结束时说的一句话。”

可是德国之声中文网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二日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谈毛、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标题下发表的德文语音版却表明，上述语句离访谈结束还差很远。

为何女五毛要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突出这句话呢？这岂非再次证明德国之声中文网被利用来以洋五毛之名吹捧中共，为中共宣传吗？

稍微了解大陆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从一九四九年篡夺中国政权后，对内整人运动不断，对外武装冲突不断。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兵参与金日成企图颠覆南韩的战争，直接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开战；一九六二年，中共向曾支援过它的尼赫鲁开火，印度得到国际社会包括苏联的支持，虽败犹胜；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企图联合巴基斯坦挑战印度未果；一九六九年，中共与扶持它篡夺政权的苏共交战；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攻打靠它篡夺越南政权的越共。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还一直挑动和支持各国共产党武装篡夺本国政权。印尼共产党听毛泽东的话而招致

灭顶之灾并祸及华人。苏哈托正是顺应了反共的民意，才得以战胜共产党的政变，建立反共的军政权。而成功篡夺政权的柬埔寨共产党在三年又八个月里害死了五分之一的国民，其祸国殃民程度超过支持它的中共。不过“红色高棉”比中共暴政短命，早已崩溃，罪魁也遭到惩罚。

施密特或许老糊涂了，但采访他的女五毛正当中年，何以睁着眼睛说瞎话？

她的介绍也只提及施密特光鲜的表面：“曾为联邦德国第五任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于1918年12月在汉堡出生。在纳粹统治期间曾被迫应征入伍，1945年被英军俘虏，后被送往英国设在比利时的战俘营。返回德国后，施密特开始了大学生涯，在汉堡攻读国民经济和政治科学。1946年加入社民党。1974年至1982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自1983年起为德国时代周刊出版人之一。1986年退出政坛。施密特应周恩来邀请于1975年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邦德国总理。”

可是德文的维基上明明写着：施密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德国商人和一个餐厅服务员的私生子。为了否认犹太血统，施密特和他父亲一起伪造证件，否则，他就不可能“被迫应征入伍”，当上纳粹德国的军官。为了自保，施密特在上军校时，中断与两个朋友的来往，因为他们参与反纳粹地下组织。施密特在总理任期不到时，就因失去信任而被迫下台。

趋炎附势，为了私利，不择手段可能是施密特年轻时为希特勒而战，老迈时为共产党效力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早年被纳粹极权主义文化毒害太深，已失去对共产极权主义文化的抵抗力。

毛泽东在施密特的记忆中并不美好，在上述访谈中，他说，“我与毛只见过一面，我们谈了三个小时。我很难回答对毛的印象这个问题，因为毛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至少已得过一次中风，发音有困难，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时毛的周围有三位女性，他们都是英语翻译。毛讲中文，三位女士把毛的讲话译成英语，但有时他们也不明白毛的意思，就彼此商量，有时，他们会把毛的话写在纸条上，问毛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毛点头，或是亲自修改纸条上的文字。也就是说毛已经严重致残。”（“致残”显然用词不当，毛应该是因病失去了语言能力。）

尽管如此，施密特对毛的评价还是与中宣部保持一致，虽然其时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和张戎夫妇的惊世之作都先后在德国出版，足以解体毛泽东伪造的“光辉形象”。可施密特却还说，“在驱除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方面，毛的确功不可没”。他甚至想当然地赞扬，“毛没有发动战争”并声称“在朝鲜战争期间，毛的态度一直比较审慎，直到美军北上直逼中国边境，毛才决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毛的立场令人惊讶的非常克制和温和，包括对台湾。”

这位女五毛把出自“施密特大嘴”的中宣部论调全盘照搬到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中，可能是为了抵消该节目对张戎夫

妇的巨作的报道，其中包括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的电话采访《张戎：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是怎样写成的》。张戎在这次访谈中明确表示，她希望中共“能够跟毛泽东划清界线（限），能够坚决摒弃毛和毛的一切遗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世界上的人民不会对中国放心，如果中国不坚决跟毛泽东划清界线（限）的话。因为从我们的书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造成了7000多万中国人的死亡，他还说，为了他的那些项目上马，中国人可以死一半。而且毛泽东一心要的是称霸世界。如果中国领导人还继续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你说全世界人民能放心吗？”

张戎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极度的自私，和随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没有想到中国人民。他又是一个极度的铁石心肠的人，对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领导人自己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浩劫。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可取的。他导致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比方说在大饥荒，据我们统计，3800万人死了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大跃进，所谓大跃进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出口粮食，出口到苏联去买核武器，核工业，核军事工业，来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使毛泽东本人可以称霸世界。”

身在德国的施密特能不知道这些自由资讯吗？他为什么象中共的应声虫一样评价毛呢？一个称职的德国之声记者肯定会问施密特如何看待以张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人发掘出来的历史真相。所以，专门跑到汉堡去记录红色谎言并借

“人权之声”加以传播，只能是五毛的行为和中共渗透德国之声的证据。

女五毛想借施密特之口吹捧中共的目的确实昭然若揭。她问，“您于两年前出版了‘未来列强’一书，以政治家特有的视角和眼光观察世界。本月底您将推出另一本新书‘邻国－中国’。您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起到哪些作用？”施密特的答案居然是“中国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奇迹，这样一个现象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先例。”施密特在另一洋五毛泽林的帮助下出版《邻国－中国》的动机就是，“因为我由衷地希望，西欧以及德国居民能够认识到，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

施密特希望读者都象他一样见利忘义，无视中共对人权的践踏，以人权恶棍为友，怎么可能？

与大陆名人的对话秀

倒是这位渗透德国之声的女五毛象他一样拥共，还想象中共一样把洋五毛包装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她声称，“在因特网上，我们不时能看到您与中国作家以及文化界人士的交谈。您十分重视与中国知识分子间的思想交流。您何时再去中国？”

出版人之一就是施密特的《时代》周报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四日的报道《我们正在改变这个国家——赫尔穆特·施密特与年轻的中国知识人谈文化、市场、民主和国家主义》中称，“四年来，在时代的推动下，一系列年轻的中国知识人与赫尔穆特·施密特相遇。从秘密的异议人士到开明的政府支持者，代表了人民共和国的各种政治思潮。”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花久志。他在导言中着意赞美施密特有亲和力，不过，读了对话记录就知这只是一厢情愿。

而且外界也只获知花久志这次报道的施密特与棉棉、崔健、徐星和张朝阳的对话。现在看来这唯一的一场对话只起到修饰施密特的作用。对女五毛的上述问题，施密特回答说，“我在中国不只与政府领导人，外长进行交谈，也应该（创造）为自己创造与普通百姓谈话的机会。我的确是这么做的。下次去中国时，我会继续这样的对话。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去中国。”

这之后，施密特可能因为健康无法再到大陆去享受共产党的豪华招待，但在中共因镇压藏人遭遇奥运危机后，德国的《每日镜报》二〇〇八年四月六日发表对施密特的专访《中国是个巨大的试验》。这次施密特宣称，他总是寻求与“反对派知识人”对话。“但是，被我们赞美的民主在他们眼里没有十三亿中国人的物质富足重要”。

可是，即使在与上述算不上“反对派知识人”的对话中，施密特也应该获知，他的断言不符合事实。

在此摘录那次谈话的前半部。施密特的开场白是：“我认为，在中国儒家价值将会更新。

中国是一个没有统一宗教的国家，这让它区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因此中国需要一种哲学。孔子为这种哲学奠定了基石。

徐星：政府一方试图用爱国主义，而不是用儒家学说来代替在中国处于真空的价值体系。这令我恐惧。爱国主义也有可怕的方面。

施密特：如果徐星说得对，那么，就不能避免，向国家主义演变的爱国主义成为危险。

崔健：谁说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就必须承认其前提是放弃共产主义的指导。不完全放弃这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它就会继续阻碍公共道德的更新。

施密特：但是，在中国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发生很大的改变。

崔健：对，但作为艺术家我尤其能感受到，窒息创造力和让我们每个人感到恐惧的结构依旧存在。我们在中国仍然没有创造新价值的自由空间。但是，正是一个艺术家不能等待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找到一个较好的制度。他的作品必须现在诞生。”

即使是与施密特最谈得拢的张朝阳都认为，“我看中国的

西化是政府监控，具体说，是中共宣传部监控的结果。它让艺术家失去自由，以致观众除了好莱坞、MTV和别的从西方涌入的东西外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共产党放松限制，自己的传统才可能复苏。只有观众可以在进口和自己的艺术中选择时，最好的才可能在竞争中诞生。”

棉棉则抱怨没有出版自由，有法不依，无章可循。大众被学校、媒体和政府的教育弄傻了。此外，这篇报道的标题“我们正在改变这个国家”也出自她的发言。

可惜施密特只想对棉棉们卖弄对中国的一知半解，炫耀与邓小平的亲密和宣泄对美国的不满，说什么，“我看不到，中国的自卑情节可以造成危害，更危险的是美国的自大情节。美国的领导现在强调爱国主义。这会导致帝国主义，对此中国某一天可以抵制。不过，在中国的爱国主义也可能发展成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

以致于棉棉在对话快结束时表示，“我不知道施密特在说什么。”

显然施密特没有记住上述四人对他说过的话，而是把围绕他的五毛称为“反对派知识人”。除共产党及其奴才外，没有哪个正常人愿意被共产党专政。属于反对派知识人的中国人无不因捍卫人权，追求民主，而遭受中共不同程度的迫害。比棉棉还小四岁的清水君（黄金秋）正是在二〇〇四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象他一样被共产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狱的中国精英不计其数，郑贻春、杨天水、

师涛、力虹（张建红）……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第二天就以《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话：施密特比中国人还乐观》为题发表对上述《时代》报道的评述。评论者表现象五毛，也象五毛一样匿名。请看他的导言：“刚刚过完85岁生日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是个中国迷，在过去的四年里，施密特定期到北京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话。据说参加对话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了各种思想流派，其观点之针锋相对甚至到了对话结束后互相不说话的程 度。今年的对话有四位‘知识分子’参加：棉棉、崔健、徐星和张朝阳。其中，最罗嗦的是查尔斯－朝阳张，最乏味的是徐星，最自恋因此而最失落的是崔健，最思维发散最无知无畏和神经兮兮的是棉棉”。

五毛的特点是讴歌媚共的洋人，称他们为“中国通”或“中国迷”；诋毁有个人追求和见解的同胞。参与对话的四个大陆名人虽然算不上是“反对派知识人”，但至少比施密特了解中国，没有散播中宣部论调。除此之外，这位五毛还借洋五毛之口来推销崔健矛头直指的一党专制，声称：“施密特提出了一个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看来很偏离主流、因而‘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一党专政，但是经济发展获得了飞跃；很难想象如果中国象德国那样5个政党四年竞选一次会是什么样；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就像以前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一样，这一事实是与另外一个事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分不开的。”

稍微有点头脑的知识人都不难明白，大陆与台湾、香港和

新加坡的本质区别。大陆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一样在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宗教，但在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不仅剥多了居民尤其是富人的财产，还强行用共产主义邪说对居民尤其是知识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精神虐杀和精神控制，既史无前例，又不曾发生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只有糊涂虫才会把一党专制的大陆与非共产党执政的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混为一谈；只有五毛才看不到大陆的经济发 展伴随着对普通百姓的盘剥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无法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相比。

被新华网删改和利用

中共因镇压藏人遭到继“六四”屠杀后的又一次强烈谴责后，施密特也又一次出面为中共解围。他的专访在《每日镜报》首发的第二天，即四月八号，就被中共用来给自己贴金，这篇含二十一个问答的访谈以《德前总理施密特批西媒偏见：中国未推行帝国主义》为题出现在中共媒体时，被删去了九个问答。被选译的十二个问答也遭不同程度的删改。此外，新华网还增加了原文没有的三个小标题“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国的变化今非昔比”！

新华网上施密特的第一个回答是：“中国的高度文明已经有四五千年历史，其特殊之处在于，尽管它非常古老，但

它仍有活力。那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好奇之处。此外，当今的中国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中国进行着一项伟大的实验。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进行了迄今为止最辉煌的实验：已持续1/4世纪的经济繁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弄清楚中国人怎样成功地创造这个奇迹非常有趣。”

在“吸引力”和“弄清楚”之间，被删改的内容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试验。毛活着时，搞了一系列冒险的试验，犯了严重错误。他七六年死，几年后邓小平获得权力，搞了一个至今成果辉煌的新试验。除了几个东亚的国家外，这个持续不断的，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上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中共对施密特照样审查和删改。在这篇访谈中，当施密特被问到毛时，他回答说，“我不反对毛的制度。我是欧洲人。我为什么要反对毛？我曾反对发疯的德国毛分子，他们对毛一无所知，只看到毛的群众运动的画面。他们对毛主义的看法与毛和毛的制度没有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的“文革”也殃及德国，德国青少年在毛语录的指导下，以清算法西斯为名，搞了一系列红色游行和恐怖活动。施密特当政时，尤其是七七年，曾遭遇毛分子制造的恐怖和危机。可是他却只反对被挑动起来造反的德国人，不反对支持他们的共产党势力，尤其是东德政府和中共当局。七四年潜伏西德十八年的德共间谍纪尧姆夫妇曝光，其时纪尧姆是时任总理的勃兰特的亲信，既了解勃兰特的公务，又清楚勃兰特的私事包括奸情。

纪尧姆夫妇被捕后，勃兰特被迫辞职，施密特才先成为过渡总理，后当选为总理。

可能共产党势力只给施密特本人带来了好处，所以，他认识不到共产党给他人造成的祸害和反人性的本质。不过，《南德意志报》在纪念被毛分子绑架后枪杀的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遇难三十周年时，在一篇报道中表示，当年任总理的施密特认为很多造反的大学生是“上了莫斯科和东柏林的反法西斯宣传的当”。

可惜施密特不引以为戒，以致上了北京的当。在上述访谈中施密特对毛的评价“与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在私下交谈中作出的评价相似。如果您找到某个坦言的人，那他会承认：‘毛犯过重大错误，但他的成绩占70%。’我的评估达不到百分之七十，要少很多。但是有几点是正确的。比如，他一反中国的文化传统解放了妇女。他的第二大功绩是重新建立起在四五年时完全瘫在地上的中国。谁想公正，就必须承认这些成绩。虽然有不少错误和不少罪过。但您也不能错把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与毛分子混为一谈。他们与此关系不大。”

新华网的译文删去了“我的评估”到“比如”之间的内容，“四五年”和“虽然”以后的内容也被和谐了。

施密特列举的毛的两大功绩被保留，因为它们来自中宣部。事实是，中国妇女在一九四九年后，完全丧失在民国时已享有的人权，她们象男人一样沦为被共产党肆意驱使的奴

隶和奴才，甚至沦为性奴。奋起捍卫人权的女人象男人一样遭受残酷迫害。被共产党迫害身亡的中国女人层出不穷，比如，前三十年的张志新（一九三〇－一九七五）、冯元春（一九二八－一九七〇）、林昭（一九三二－一九六八），后三十年的王卫萍（一九六四－一九八九）、赵昕（一九六八－二〇〇〇）和唐福珍（一九六二－二〇〇九）。她们分属两代人。前三者都因言获罪，在遭受酷刑包括轮奸后，被中共枪毙；王卫萍是北京人民医院的实习大夫，“六四”前夜在北京街头救治伤员时中弹身亡；赵昕是北京工商学院的青年教师，因在公园炼法轮功被警察殴打致瘫而死；企业家唐福珍则用自焚来抵制拆迁，捍卫家园。

中国女性在共产党执政后的悲惨遭遇，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上闻所未闻，无论在哪个朝代，即使著名的暴君秦始皇都不曾以什么名义虐待孕妇，虐杀胎儿，而在中共暴政下，在“计生政策”的名义下天天都在发生反人类罪行。据《解体党文化》估计，从中共执行“计生政策”以来，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害死，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也受到严重伤害，甚至因此丧生。维基显示，在有自杀率统计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是唯一女性自杀率显著超过男性的国家，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无论男女，中国人也前所未有的以各种方式背井离乡，移民世界各国，申请难民的中国人至今不曾中断。

一九四五年时的中国虽然遭受了战争的重创，但人民是自由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以蒋中正为首的民国领导人以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为目标，没有滥杀无辜，抢

劫私产。国民政府剿匪反共，正是为了履行职责，保护私产，捍卫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生长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人，经历过两个政权，他们有比较，最有发言权。中华民国退役空军少将祖凌云生长在四川农村。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那年投考民国的空军学校，后随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一九八八年，祖凌云从温哥华回大陆探亲后发表《故乡今已是他乡——大陆行记》。祖先生在亲自见证了中共暴政与中华民国的区别后写到，

“在台湾时，我也曾怀疑过，总以为是政治宣传，政治教育，故意将中共说得很坏。现在我才知道，中共实际上比外面知道的坏得多。其坏的程度，只有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相信。”“实际上中共比苏联管制得更为严密。内部情况之糟，之乱，外面知道的实在太少。同时人们也低估了大陆上民众的胆识，以为他们不敢反抗，不敢讲，任由共产党摆布。这次回去，真教人大开眼界。很多秘而不宣的事，都打听到了。所得的结论是：只要共产党当政，中国大陆就不得安宁”。

其时是八九民运的前夕，中国人还没有群起而抗争，共产党还没有制造“六四”血案，还没有在世人面前暴露其凶残本性。

粉饰“六四”屠杀讴歌元凶邓小平

“六四”屠杀后，中共遭到了自由世界各国政府的一致谴责和制裁。可施密特却于一九九〇年五月前去北京，给中共解围，是第一个问候刽子手的西方政客。这之前，施密特还应中共之邀参加过邓小平摆威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

在大陆媒体纪念邓小平冥诞一百周年之际，德国之声中文网也于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报道《德国人士看邓小平的一生》。这篇报道比较专业，虽然作者也匿名，但他不仅采访亲共的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和施密特，还采访了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学者坎鹏。

这一次，施密特宣称，“邓留给我的印象是不太喜欢谈意识形态，而更是一个注重实用和理智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尽管邓从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并经历了许多军事和政治事件。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天赋的、有经验的和幽默的战略家，但邓给我的印象则是，他从儒家继承的政治理念更多于马克思主义。”对此，坎鹏看得很透彻，“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但在组织上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可以在不同时期灵活地奉行不同的政策，但永远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从来没有对共产党的统治提出过质疑，不允许共产党有竞争者，也不允许进行任何民主的尝试。”

施密特一有机会就讴歌强迫中国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邓小平。中共媒体也乐于借施密特大嘴把邓小平吹成“天才的实践家”。就是与“六四”的亲历者崔健们的对话中，施密特也不忘吹捧邓小平，“一九八四年，我第二次见到邓小平，起因是人民共和国的第三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您说您信仰共产主义，但我认为您信仰孔子。只不过您不愿承认罢了’。邓小平笑后说：‘那又怎样呢？’他是一个有很好的政治直觉的智慧老人。如果他还活着，可能令他思考的问题是：未来美国人的头脑里会有什么动向。”

对此在场的四人中只有张朝阳回答，“美国在布什的领导下发展出帝国主义式的自大情节，这导致伊拉克战争……”。这番因果倒置的反美言论与施密特对美国的看法一致。

上述《每日镜报》的施密特专访其后在《西德意志报》的网站上以更长的版本发表。标题是《我们完全错看了中国》。导言中说，“中国通(指施密特)排除以美国为榜样民主化。这个国家会走它自己的路”。德国之声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对此有个综合报道，标题是《施密特：中国将遵循自己的道路》。报道可能出自一个中共党员之手，因为译文也象新华网一样篡改原意，添加标题。这些小标题依次为“从文化着手思考中国”、“毛泽东的两大功绩”、“邓小平与六四”、“西方理解中国为什么老走样？”。

施密特也被删改得面目皆非，虽然施密特头昏眼花，看不到大陆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不明白邓的猫论与“四项基

本原则”都与儒家学说相对立；搞不懂共产党拒绝顺从民意，进行政治改革，用暴力镇压民众，用谎言强奸民意，一再失去与中国民众对话与和解的机会，已丧失民心。

在这篇专访中，四年前对崔健们讲过的与邓小平的私房话又有了新花样。这次施密特说，“我在北京私下和邓小平两人交谈。他当时除了军委主席外，没有国家要职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个不容置疑的政治领袖。我们在谈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时，我为了气他，半讽刺半认真地对他说，‘你们给自己取了个完全错误的名字。你们叫自己是共产党，其实你们应该叫孔子党。’他惊讶了一阵，然后说：‘So what!’德文意思是：‘你要反对吗!’”（英语 “So what” 的意思是“那又怎么样”，但在这篇采访中却遭到施密特的篡改。这也证明施密特爱不懂装懂。）

施密特对邓小平的吹捧让人想起法国的郭沫若—马尔罗对毛泽东的吹捧。

一九六五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到中国访问，并与毛泽东会见。史东在自由亚洲电台上介绍，马尔罗“把这次与毛泽东的会见吹得神乎奇神，说是当今世界上两位伟人智慧和战略的关键性、决定性的三个小时的历史性会谈。但是，根据当时红卫兵传出来的会议材料和法国大使馆逐字逐句的会议记录，马尔罗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只有20多分钟，而且内容只是一些外交辞令和鸡毛蒜皮的寒暄，可见马尔罗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

不过中共及其奴才可以借他们来讴歌共产暴政及其暴君。

潜伏德国之声的中共党员在照搬施密特垃圾比如，“邓小平会以最成功共产主义者身份载入史册”的同时，还任意删减，比如，在引用施密特的断言“西方媒体对引发天安门悲剧的诸多因素既没有正确报道，也没有理解”时，删去敏感词“天安门”。

施密特为了替中共开脱“六四”屠杀的罪责，居然声称，“如果不是士兵，而是警察的话，就不会立即开枪，而是用警棍威胁了。可是没有警察。”不知这些五毛言论除了他相信还能糊弄谁。中共上台以后就组建了警察部队，虽然名称在变动，但改变不了一九八九年时，北京拥有众多警察的事实。为何中共不动用警察，却调动二十万士兵从外地赶到首都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显然不是施密特思考的问题。

施密特为了力挺中共，谎言连篇，对邓小平和中共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硬要把主张“杀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稳定”的邓小平说成是孔子的信徒。当年，毛泽东以“批林批孔”的名义清除异己时，为了整邓小平，收集他的尊孔言论，结果邓小平只沿用过与孔子相关的成语“名不正言不顺”。邓小平与孔子的教导“仁义礼智信”背道而驰，既言而无信，又大开杀戒，中外历史上都没有暴君敢于象他一样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

可能正是为了蒙骗对儒家一知半解的施密特们，中共当局从二〇〇四年开始，花费巨资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打着孔子的旗号贩卖中共的私货，用孔子的招牌来遮掩破

坏中国文化的共产党暴政，向世界输出中共党文化及其文化特务，继续阻挡中国大陆象台湾一样走向民主。

二〇〇〇年，我在海涅故居的所在地绿堡（Luenerburg）当驻市作家期间，在一个画展开幕式上碰见施密特。当时他独自坐在一把椅子上，无人问津。我可以过去寻求与他对话，但我想他这么老了，不会再为中共效力，岂知大错特错。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共及其奴才却没放过他，利用“施密特大嘴”传播了大量五毛言论。人以群分，施密特既乐于吹捧共产暴君，也乐于接受五毛专访和吹捧。

与共产奴才沆瀣一气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华网登载了国际先驱导报驻柏林宣传员郑汉根的报道《专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衡量中国需用中国标准》。此报道的小标题是“我感觉不到中国威胁”，“衡量中国需用中国标准”和“是否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不重要”。

“六四”屠杀后，欧盟禁止成员国把武器出售给中共。这是欧盟和大陆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也是民主宪政与共产暴政的分歧，一直都是媒体的焦点，可是施密特却在记者说“可是欧中关系还有问题，比如欧盟还没有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时，表示“这不重要。中国可以自己制造想制造的

武器。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上个世纪的政治情势留下的，属于过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在欧中关系中已经很不重要了。”施密特这么说，要么是在回避矛盾，要么缺乏眼力，但他却自以为是，声称，“一些西方政治家比我要年轻一代甚至两代，他们还不够智慧。另外，许多政治人物对历史还不够熟悉，对亚洲国家历史不熟悉，尤其是对中国。他们对伊斯兰国家的历史也不太熟悉。他们是在这种对外国历史不熟悉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应该多到国外看看。但是他们又常常必须在国内进行选战活动，不能做这样的旅行”。

二〇〇八年，在施密特出面力挺北京奥运后，我终于忍无可忍，专门用德文撰写了一篇长文，以施密特为例揭露中共在德国的红色渗透，以弥补当年错过抗议施密特的机会。我想让德国人知道，在德国也有反抗共产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华儿女，而不是只有共产奴才比如关愚谦。

关愚谦是一九三一年生人，曾给中共领导人做过俄语翻译。一九五七年，被发配到青海“劳改”。“文革”开始不久再度被整，于是，他于一九六八年伪造护照，从北京搭机逃到埃及，被关进当地监狱。后作为政治难民被营救到德国。一九七七年，四十六岁时，关愚谦获文学博士学位，开始在汉堡大学任中文教师，并再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位德国人，小他十九岁。

一九八一年，这个被中共通缉的“叛国者”得以重返大陆探亲。照理自身的悲惨经历，足以让关愚谦认识到共产专

制的罪恶。可是他作为德国大学的华人教师，当上一九八一年在里昂成立的欧洲华人学会的常务理事，有了利用价值，便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而他一得点中共的好处，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就开始恬不知耻地拍中共马屁，欺骗受众。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日，关愚谦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继续兜售他那套媚共言论，虽然他时不时会露出一句真话，比如，他不得不承认，“硬件现在过硬了，但是软件还跟不上去”。但总的来说谎言连篇。当一网民问，“你在汉堡教什么？你是作家身份还是学者身份？”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先是学者身份，可是到德国这个国家，德国人他们还是有点种族歧视，外国人当教授非常难，所以，我教学为辅，写作为主，结果我发表十几本书以后，他们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教授地位了”。在德国当教授的中国人有的是，关愚谦没当上教授，是他自己的原因；他明明不是教授，却偏要说人家不得不承认他“这个教授地位”，实在是可笑可叹。简言之，关愚谦与施密特是一路货色，都在厚颜无耻地欺世盗名，堪称白发五毛。

在这之前，关愚谦还以欧华学会会长出席“南沙中欧文化论坛”，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我认为在西方领域，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家是施密特先生。他是最敬佩的人。”

就象施密特吹捧邓小平一样，关愚谦一有机会就吹捧施密特，无非是借以佐证和抬高自己。中共媒体甚至在对关愚谦的介绍中，也把施密特拉来陪衬：“关愚谦，德国汉堡大

学教授，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专栏作家，曾应邀3次面见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关愚谦还借施密特大嘴向中共讨好，混淆视听。中共媒体上不缺关愚谦对施密特的报道。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三日，凤凰网上刊登关愚谦的报道《中国须防止社会矛盾激化》。报道开头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9月24日出事当天，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正在汉堡作有关中国的报告。当主持人提问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否会有风险时，他表示，中国领导人能审时度势，如有危险是来自党内忽视民情，造成社会矛盾激化。这句话正好应在陈良宇身上。”施密特相信中共是因为他只得到共产党的好处，而关愚谦差点被中共要了命，可他却借施密特之名，用中国文化来掩盖共产党的暴政，关愚谦称，“他在报告中，请西方不要用自己的尺度来要求中国，更不要以西方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世界。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当中国人开始使用文字时，西方人还只是游牧人，连农业还没有。中国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这几千年来中国的发展有序，只是过去200年来，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干扰，内部发生战争，社会呈现乱象，现在终于回到轨道。”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世代相传的文化习俗，从黄历到节日要么被取缔，要么被篡改。共产党滥用国家政权强迫全体中国人接受它的那一套马列邪说，欢度它在中国的成立日、建军日和窃国日。汉语也被共产党变成了它给中国各族人民洗脑

的工具。施密特无法认识到上述事实，可以原谅，但一九四九年时已经十八岁的关愚谦，却借施密特的无知来为中共贴金实在可耻！

关愚谦还接着称，施密特“认为，中国目前虽然还打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孔孟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有自己的治国理念，不需要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和实现民主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德国来指手划（画）脚。”确实共产党在无法用马列邪说摧毁孔孟之道后，现在又盗用孔子的名义来兜售共产垃圾，抵挡西方对它的指责，配合施密特用中国文化掩盖共产党的罪行。

此外，关愚谦也象其主子一样仇恨默克尔坚守普世价值，关心中国百姓的人权，因此，他还在上述报道中声称，施密特说，“德国历届领导人、包括他在内，从没有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这次默克尔总理第一次到中国，就提出了人权问题。他希望，西方人不要把自己估得太高。”

在德国的五毛党几乎人人都吹捧施密特，并引用施密特来为中共涂脂抹粉。

关愚谦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施密特是在德国的最大的洋五毛的话，那么，关愚谦可以算在德国的最大的土五毛，因为他们都一大把年纪，却不明事理，以各种借口，包括借中国文化来美化破坏中国文化的共产极权。

象毛分子一样亲共仇美

施密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出生，十五岁时，希特勒利用反共反犹反资本主义的民意，赢得大选，获得政权，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建立了纳粹德国。希特勒挑起的战争没有战胜他国，却导致自己和纳粹德国的灭亡。施密特二十七岁时，西德在美国的支援下，重新走上了民主自由富裕之路。

不知何时，施密特开始沦为中共诋毁美国的工具。在中共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也转载了施密特的相关言论，以下是顺手拷贝的标题：

德前总理施密特告诫西方不要倨傲和自以为是地对待中国
(06/13/08)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批西媒偏见:中国未推行帝国主义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与人合作著书深情介绍中国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不要对中国心生恐惧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我相信中国迟早会崛起”

众所周知，极权专制的共产国家无不穷兵黩武，崇尚暴力，鱼肉百姓。毛泽东为了发展军事工业，购买核武器，把粮食出口到苏联去，不惜活活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史无前例的毛式“人民战争”在这一世纪已演变成，毛徒孙鼓吹的超越一切界限的战争。两位中共军官合著的《超限战》

在仁人志士看来无异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指南。这本比毛语录还恐怖的红色宣传品赤裸裸地鼓动扩张，宣扬战争，但居然被当作“军事教科书”在全世界贩卖。

而从美国国防部二〇〇〇年设立的报送国会的年度例行报告《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来看，中共的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更是说明中共本性未改，值得全世界当心。

可是，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却在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刊登报道《美国担忧中国军力一施密特不以为然》。这篇综合报道分“俄中武器交易让美国忧心忡忡”、“俄罗斯是大卖方”和“施密特发出不同声音”三个小标题。报道称，“美国对重新强大的俄罗斯和国力日渐增加的中国的狐疑态度在西方并非都引起共鸣。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便表示，他不赞同美方的看法。

现年88岁的这位德国政界耆宿周四在接受奥地利‘评论报’采访时指出，多年来，没有任何一桩侵略行为来自俄中两国。他指出，数十年来，两国均未干涉过别国内政，也没有越过自己的边界线，与另一个世界强国相比较，俄中的态度相当和平。”

就是说，潜伏德国之声的中共党员总是想法设法地借施密特大嘴来混淆视听，掩盖真相。

施密特的反美言论，象他的媚共言论一样数不胜数，但无

论如何，施密特都难以混淆警察和强盗的区别。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大国象国际警察一样除暴安良，见义勇为，为此招惹毛分子的谩骂。其实施密特非常清楚，美国参与了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战争，但美国没有侵犯德国，而是帮助德国恢复了民主制度。

二〇〇四年，施密特推出由中共原驻德国大使梅兆荣翻译成中文的《未来列强》，诋毁美国，声称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符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和邻国都有益，认为中国是“明日世界的赢家”，企图促使欧洲忘恩负义，与美国拉开距离，向中共靠拢，换言之，就是放弃普世价值，纵容人权恶棍，违背天理人伦。

就此梅兆荣发表《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声称施密特应他的要求，于二〇〇五年“3月底传来了专为中文版撰写的前言。施密特先生以此表示对我的信任，不仅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翻译《施密特传》和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更主要的是我们从1975年他作为联邦总理第一次访华相识开始，迄今已有30年交往的历史，彼此间相互尊重并了解，并且建立了友情”。施密特自己在《与中国为邻》的前言中则透露，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与黄华和梅兆荣的交谈。其实，影响施密特的不只这两个中共高官。曾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在西德进行红色渗透，并促成西德认可中共暴政的王殊与施密特也有来往。毛泽东接见施密特时，王殊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在座，后来被提拔为中共驻西德大使，是梅兆荣的前任。

施密特在德国政府认可红色中国中扮演的角色不小。在上述德国之声的综合报道《施密特：中国将遵循自己的道路》中被篡改的内容包括：十五次访问中国的施密特，“最早一次是在六十年代末”。而原文是说一九六九年任国防部长的施密特，出于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专门环绕中国大陆公费旅行一次，因为属于民主国家的德国与隶属共产阵营的大陆没有建交。因此，他“想从外边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泰国的、日本的和韩国的眼光来观看这个巨大的国家”。他回到德国后，私下对当时的总理勃兰特说，“我们必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坚信，中国会成为世界强国。”勃兰特显然听从了他的建议，比美国早七年承认了中共暴政。

带有中共特色的德国之声综合报道在加的小标题中，用“西方理解中国为什么老走样？”来突出施密特对美国的抨击，“施密特说，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诠释受到美国的主导，而美国对中国则抱着双重的拒绝态度：一是拒绝共产主义政府，二是觉得中国不可捉摸而非常可怕。为什么可怕？‘因为，不认识的东西，总是很可怕的’。

施密特从文化着手，认为中国儒教文化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其他道路。比如，当年古罗马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也不同于斯巴达，今天，中国的社会秩序也同样与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有本质的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国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国人才会有。’”

施密特就这样，从一九六九年起，以各种借口竭力促使国

际社会认同中共暴政。二〇〇六年又与泽林合作，推出被梅兆荣翻译成中文的《与中国为邻》，老调重弹。德国之声中文网自然会大力宣传，九月二十二日刊登报道《“邻国－中国”作者访谈》。在这篇访谈中，泽林透露，“书名是施密特想出来的。邻国－中国以最简洁的语言告诉人们，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交通便利的全球化的今天，遥远的中国已变成了我们的近邻。我们绝不能忽视她。”

从德国之声中文网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报道《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举荐中国印度进G8》，则可获知，“在德国明年一月起轮任八国峰会（G8）主席国前夕，德国前总理、社民党籍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呼吁，德国政府应该为接纳中国和印度进入G8而做出努力。施密特在接受‘每日镜报周日版’采访时说，把中国和印度排除在G8之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至今对此持反对态度”。

二〇〇八年四月九日，德国之声中文网编译报道《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反对抵制中国并指责美国政治家》。中共媒体和被它渗透的媒体总是企图把人们对中共的抵制说成是对中国的抵制，以混淆视听。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三日，紧跟施密特在德国力挺北京奥运的张丹红借桑德施耐德之口来宣讲施密特，报道标题为《中国问题专家解码施密特报告》，张丹红称，“本周四，89岁高龄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柏林德国外交政

策协会做了一场精彩的题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的报告。他呼吁西方尊重中国这个世界尚存的最古老的文化，并毫不讳言他的观点：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相比，人权问题处于较次要的地位。报告之后，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就德中、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西藏、台湾等问题与施密特展开讨论。德国之声记者会后采访了桑德施耐德教授。”他们还一唱一和，表示“德国高层政治家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又编译报道《施密特：“害怕中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报道称，施密特在一次演讲结束时，“号召人们对中国要持以更多的宽容和中立态度。他说，对中国没有理由采取居高临下姿态的理由，不可以使用说教的方式。同世界大国美国、俄罗斯一样，中国是享有同等权利的伙伴”。可是无论施密特如何努力，五毛如何配合，既无法消除人们对共产党的戒心，也无法把红色中国吹成一个可与美国相提并论的世界大国。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德国议会针对德国之声的红色渗透问题召开听证会的第二天，德国之声的五毛还在以《不屈服的烟民施密特》之类的报道来糊弄需要自由信息的大陆民众。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又发表长篇报道《赫尔穆特·施密特-位高权重的管理者》，似乎害怕受众忘记中共在德国有这样一个老朋友。

综上所述，中共在德国的最老支持者非施密特莫属，中共及其媒体也大力吹捧他，目的无非是借施密特大嘴给自己涂脂抹粉。

好在施密特的五毛言论已被网民识破。在一篇驳斥德国之声报道《施密特：中国将遵循自己的道路》的文章后有跟帖表示，“就是这个施密特，经常为暴力和专制的政权唱赞歌，这一次，他表现的更加放肆，更加毫无顾忌，既然歌颂纳粹是违法行为，那么歌颂比纳粹残暴、血腥千百倍的杀人政权就更应该是违法。强烈要求德国政府将施米特绳之以法。”

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在中共的窃国日，大陆的海南出版社又推出了施密特和泽林（西伦）名下的《理解中国》，但德文没有相关著作，译者是梅兆荣等，可能是《与中国为邻》的再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2711830100fb7o.html

不过，无论施密特出于何种原因力挺中共，也掩盖不了共产党祸国殃民的事实和被中国人民抛弃的下场。

第九章 与狼共舞的施罗德

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筹备八年的第四十一届世博在上海开展。

世博到了共产党手里也象奥运一样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宣传秀。这一次首先是一批上海人沦为冤民难民。一万八千户上海居民被中共当局强行拆迁，其中包括四世同堂的九口之家一胡燕一家。他们被贪官以世博为名抢走家园，却无处申冤，以致胡燕不得不只身到纽约联合国门前鸣冤叫屈。

中共当局在打压世博难民的同时，却专门成立世博网来报道，“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企图借“世界百位名人”对世博的阿谀奉承来掩盖冤民难民的不幸遭遇。

中共当局“试图掀起继北京奥运会之后，又一波‘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狂热”，然而践踏奥运精神的奥运，与被赤化的世博一样，都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再轰轰烈烈，也是假大空。共产党专制的国家，从前苏联到北朝鲜都热衷于搞此类宣传秀。

在出面为世博宣传的百位马屁精中，既有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邓亚萍、中共作协副主席王安忆等土五毛，又有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滥用奥运窃取名利的萨马兰奇等洋五毛。

德国五毛的唯一代表

勾结中共当局，在大陆捞钱的西方大公司中有一系列德国公司。因贿赂而臭名昭著的西门子股份公司是其中之一，其总裁也被拉来充当马屁精，但他是奥地利人。所以，唯一撰文宣传世博的德国人就只有施罗德。他执政时获得德国之声台长职务的社民党员贝特曼，也一如既往地象施罗德一样附和中共，宣传世博。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特别在世博开幕之际，于四月二十九日推出以“世界做客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为题的世博专栏和征文比赛。

世博网这样介绍施罗德：“德国前总理。1944年出生于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后从事律师职业。施罗德于196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78年当选为德国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后历任联邦议院议员、下萨克森州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下萨克森州州长。1998年 4月，被正式推举为社民党联邦总理候选人，并在同年9月当选为德国总理，2002年10月连任，直至2005年11月宣布正式退出议会，并从此告别日常政治事务。2006年，被选为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股东委员会）主席”。

施罗德也象施密特一样善于文过饰非，世博网上首发的题为《期待中国，期待上海》的马屁文章只有四段，在此照

录如下：

“在当前全球化时代，中国对我们的世界来说至关重要，在不久的将来，将崛起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贡献者，并将成为践行其和平、公正和发展的国际责任的现代国家。在全球和平发展方面，中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没有中国，任何国际冲突与挑战都不可能获得解决。

世界在期盼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开幕。预计观众将达7000万人次，人数令人惊叹。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全球各地的国家和地区都面临城市化的挑战。

我们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应该保持和改善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可持续的政策，精心使用可用资源，如水、空气和土壤，使我们较少地依赖化石燃料。只有当我们依赖更高的能效，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可再生资源，这一切才有可能。

毫无疑问，中国将呈现给世界一个成功和难忘的世博会。我确信：上海将成为世界各地客人的热情东道主。”

人如其文，这段文字就足以泄露施罗德不愧是中共在德国的最大朋友。因为他名下的文字符合中共党文化的特色假大空。施罗德明知共产极权专制下中国百姓的苦难，可他却去迎合中宣部的调子，吹捧官民对立，社会分裂的血色中国！

在世博开幕之前的三月二十三日起，不到四十天，大陆就发生了五起杀童惨案，以致于惊恐的家长在校门口挂起“冤有头债有主前方右转是政府”的横幅，而悲愤的民众则举起“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的标语抗议。

请看图片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47828>

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既不可能“崛起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贡献者”，又不可能“成为践行其和平、公正和发展的国际责任的现代国家”。施罗德却象五毛一样重复中宣部的论调，而不正视世博让上海居民胡燕们沦为冤民难民的现实。

施罗德把中共的宣传当真并表示惊叹，但改变不了世博沦为中共和商人互相利用的红色商业秀。中共借世博搞红色渗透，展示“崛起”，既支持北朝鲜首次在世博上露面，又花费了一亿美金让中共在非洲的难兄难弟来给它捧场。而来凑热闹的各国商家，无非是想借此捞一笔，不过，即使中共的宣传铺天盖地，但上当的民众极其有限。连联合早报网也于五月四日刊登报道《BBC:上海世博访客不及预期一半》，而阿波罗新闻网则用照片和文字证明《世博第5天很冷清 明显组织人填场充游客》。请看图片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506/article_99542.html

新浪网上没有被删除的留言中也不乏批评之声，有参观者

回来后撰文表示，“成功世博-要百姓叫好-首先要以人为本”，有网友则声明，“世博根本就是不欢迎我们这些外地人，你看从进上海开始就把大家当敌人，首先看到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武警，逐个的安检，询问，而不是欢迎我们的笑脸。谁稀罕来上海！世博会，自娱自乐去吧”！被当作敌人的不仅是外地人，只有对海内外的五毛比如施罗德而言，上海才是“热情的东道主”。而他也于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得到了热情地接待。世博网当天报道，“今天下午，上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钟燕群会见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一行，并向他们介绍了上海世博会的基本情况和最新筹备进展”。报道结尾称，“施罗德表示，2010年一定会再来上海，一睹上海世博会的风采”。不过，曾为北京奥运开幕式捧场的施罗德，却没有出席燃放更多烟花的上海世博开幕式，虽然他三天前在青岛露面。

与同党前辈施密特相比

据报道，施罗德是因为钦佩施密特，一九六三年，十九岁时加入社民党青年组织。就是说，施罗德和施密特分属两代人。

施罗德的母亲生于一九一三年，象施密特的父亲一样也是私生子。但施母没受什么教育，结婚生下一女和施罗德不久，丈夫就在二战中阵亡，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九四七年再

婚，又生了两女一儿，靠做清洁工之类的粗活贴补家用。

施罗德在二零零六年出版的回忆录《抉择：我的政治生涯》中透露，他们家只有两个小房间和一个兼作厨房的起居室，继父患肺病，咳嗽声不断，一直到去世。二零零三年，施母过九十岁生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五个孩子她“都爱”，当然她为施罗德感到骄傲并称赞，“他自己努力工作得到一切”。就是说，在德国只要个人努力，家境再贫寒，都有出人头地的希望。而在共产党专政的大陆，与施罗德同代的无数中国人却史无前例地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比如遇罗克。

施罗德则可以当上“流浪总理”（Straßenkanzler）。德语的流浪儿（Straßenkinder）一词由街道和孩子两个词组成，有人把孩子换成总理，新造了一个词来形容施罗德的来历。

施密特是烟鬼，可谓夫抽妇陪，白头偕老。当年潜伏勃兰特身边的德共间谍纪尧姆被捕后，勃兰特被迫辞职的一个原因是纪尧姆导致其婚外滥情曝光。正好施密特只有一妻，形象正面，被推出来替补勃兰特。

施罗德一来缺少家教，二来赶上德国的“小文革”。德国的“文革”一代在共产党势力的渗透下，打着反法西斯、反美反战的口号，反传统反道德，大搞“性解放”，女人甚至以杀害胎儿为荣……世风恶劣，导致这一代的德国各界名人多生活放纵，男女关系随便，结四次婚的施罗德就是他

们的代表。

一九六八年，施罗德二十四岁时结婚。

一九七二年，他第二次结婚，在这段婚姻期间，于一九七六年获得律师资格。

一九八一年，他通过社民党组织的活动，认识一位有两个女儿的有夫之妇希露。

一九八四年，他四十岁时，与希露结婚。

一九九零年，施罗德当选下萨克森州州长。施罗德夫妇一度有“下萨克森的克林顿夫妇”之称，就是说施罗德夫妇也是政治夫妻。

一九九五年，施罗德通过社民党的党员大会与一小他十九岁的女记者多丽丝相遇。一九九六年，这段婚外情曝光。希露比希拉蕊有自尊心，立即把负心汉赶出家门，为此宁可放弃当总理夫人的梦想。

一九九七年，施罗德第三次离婚，第四次结婚。

一九九八年，五十四岁的施罗德成为德国的第七任总理，三十五岁的第四任妻子则成为德国最年轻的总理夫人。鉴于四任妻子的结婚戒指正好可以组成德国汽车奥迪的四环商标，施罗德又被称为“奥迪总理”。

嫁给施罗德后，已与他人有一女的多丽丝便辞职在家相夫教女兼尽总理夫人的社会义务。在婚姻过“七年之痒”之际，多丽丝从俄国抱养一女，两年后又抱养一儿。

二零零五年，施罗德因无法如愿继续当总理而辞职回家写书时，表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给我的非常有生气，由

我的妻子多丽丝充满爱心执掌地不小的家庭。现在有三个孩子属于这个家庭：戈雷格，刚一岁，维克多丽雅六岁和克拉拉十五岁。没有他们四人的生活我难以想象。”

二零零九年，施罗德的六十五岁生日时，多丽丝操办一个有二百多人参加的生日宴会。可能也是为了庆祝她与施罗德的婚姻维持的时间比前三任都长吧！她是在施罗德的第三次婚姻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时成为第三者。这之前，施罗德自己在一个访谈中表示，当有压力从外面来的时候，希露笔直地站在他身后支持。可是，这样的老婆还是不及新欢。希露则象她的第一任丈夫一样尝到了被抛弃的滋味。成功夺得别人老公的多丽丝是否能够战胜别的第三者，还是一个悬念。

与共党同辈李嘉廷相似

李嘉廷和施罗德同年同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是：李嘉廷生活在共产极权社会，加入的是共产党。

李嘉廷出生在云南省石屏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是彝族人。父亲也很早去世，靠母亲干粗活供他上学读书。李嘉廷也有几个兄弟姊妹，也只有他一人出人头地。

十九岁时，李嘉廷被选拔进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一九六

四年在大学加入共产党。

一九六八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的一家兵工厂工作。中共被迫搞经济改革后，象李嘉廷这样在共产党专政的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得到重用。一九八一年，他上调到黑龙江省经委，从此“四年四步”，步步高升。第四年他已调任哈尔滨常务副市长。

一九九二年，“少数民族干部”李嘉廷被提拔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副省长，比施罗德晚两年成为州官，但施罗德是民选，必须对选民负责。

李嘉廷最迟从一九九四年起，就开始滥用职权，牟取私利。一九九五年，当施罗德与多丽丝在党代会上相遇时，李嘉廷夫妇被下属领上了徐福英在一个风景区建造和经营不久的游船。徐福英与多丽丝同龄，但只读过四年小学。在中共允许老百姓经商后，她随第二任丈夫从商，后来从开餐馆到开游船，堪称女强人。可惜在无法可依的马列中国，她被迫靠出卖色相来打点生意，获取资金。从一九九六年起，李嘉廷就开始当徐福英的提款机。到李嘉廷被追究时，共涉及金额三千余万元。

在施罗德的婚外情很快被曝光之时，李嘉廷的权色交易却无人追究，连他的妻子王骁都视而不见。这位李嘉廷清华大学的同学可能既被共产党赤化得失去了女性的敏感和自尊，又被情妇们的小恩小惠迷了心窍。

一九九八年，李嘉廷得以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省长。

一九九九年，举办“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不知是否也制

造了冤民难民。

二零零一年，李嘉廷与另外一个贪官成为中共第十五届六中全会制造舆论，欺骗百姓的反腐祭品。王骁在丈夫和两个儿子都被逮捕后，上吊自杀。

二零零三年，李嘉廷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嘉廷共有三位情妇。一个妻子三个情妇堪称奥迪省长，况且他的二儿子正好是奥迪在云南的总代理。

据称李嘉廷被捕后写到，“我入党37年了，为什么在建党80周年前夕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我长期以来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逐步淡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其实，造成他家破人亡的正是共产党，他们一家也是共产党的受害者。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他受到惩罚应该是中共十六大前党内斗争的结果，腐败只是借口，比他腐败的中共高官多的是，比如，与他同年同月生的邓朴方。有意思的是，在中共媒体的报道中，一再强调办案人员在他家中只抄到两本香港发行的禁书，而没有任何马列著作。这再一次证明，中共高官也不信共产党那一套歪理邪说；二来也说明中共还把马列著作用来糊弄读者。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同样腐败，前者与女佣通奸，后者是梅毒患者。

李嘉廷象施罗德一样能说会道，乐于涉足商场，牵线搭桥，八面玲珑。

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李嘉廷做为第一位现任省级官员，参加了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的活动。不到三个月，他就遭到惩罚。他在这次活动中所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云南）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成为人们的笑料，因为在一百六十万云南人还在忍饥挨饿之际，他已收受至少一千八百一十多万元贿款！而针对网友的问题：“您会不会压制媒体？”李嘉廷则表示：“我们对新闻单位的批评要鼓励，要保护，为此我们制定了专门的规定”。

众所周知，在大陆，新闻媒体都是中共的喉舌，不可能起到监督作用；而在德国新闻媒体则是反腐的利器。

一九九三年，施罗德力挺德国企业为中华民国生产军用舰艇时，立即遭到各方质疑。《明镜》周刊于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也发表长文《武器容易让人上瘾》，披露围绕这笔价值十二亿马克订单的相关问题。文章矛头直指施罗德，说“这个社民党强人正在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施密特的角色。象昔日的联邦总理一样他现在也和经济界的尖子们成了好朋友。在他坚决捍卫这笔军用装备生意的前些日子，他在格丝拉的皇帝行宫（Kaiserpfalz zu Goslar）和三百个工业巨头聚餐，其中有博施、宝马、福特和奔驰的头头。”

施密特一九七八年在总理任上时，同意向阿根廷出售潜艇，因此，他象施罗德一样遭到批评，因为他们都违背了社民党自己的准则。而施罗德身为州长，还违背了红绿两党联合的州政府的执政纲领。此前施罗德曾斥责德国出口武器

给海湾战争的商人为“没有良知的奸商”。

施罗德当上总理后，受到的制衡和监督之多，让他无法轻举妄动。德国有一套法规确定总理的权限和职责。德国迁都柏林后，政府专门给他装修了一个总理别墅，但他必须支付房租，他也有总理专车和专机，但不得无偿私用。

不过监督再严，也难免权钱交易。施罗德在总理任上与俄国霸主普京达成协议后才成立的北欧输气管道公司，专门负责修建从俄国把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的管道。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施罗德出任这家由俄国独裁势力操纵的公司监事会主席的传闻得到证实后，《明镜》周刊网络版也发表长文《新工作：施罗德让他的声誉带有卢布味》，报道了各界的反应，德国政府表示要制定相关规定。施罗德不违反现有法规，但显然涉嫌权钱交易因而声名狼籍。《明镜》引述波兰媒体的相关评论，明确表示这是“欧洲最大的腐败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二零零二年，当有人建议施罗德不染鬓发更值得信任时，他居然控告别人，声称自己没有染发。李嘉廷在二零零三年被送上法庭时，已是五十九岁，也象施罗德一样满头“黑”发。请看图片

<http://news.sina.com.cn/z/lijiating/>

施罗德至今头发也既不灰又不白。这也是施罗德和中共官员的相似点。可是比施罗德小十二岁的前德国外交部长施

泰因迈尔，却早已象克林顿一样一头灰发。

http://www.n24.de/media/_fotos/bildergalerien/gerd65/steinmeier_dpa.jpg

他俩的合影十分有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施罗德是否象中共高官比如胡锦涛一样，什么都变，就是发色不变。头发变色是自然规律，人老发白，再自然不过，染发本来无可非议，那是个人的自由。但因此指鹿为马，实在大可不必。

为强权和金钱折腰

如上所述，施罗德在一九九三年还不算中共的朋友。但这次对中华民国军售在中共尤其是时任中共大使梅兆荣的抵制下失败后，可能施罗德就开始不得不重视中共的势力，并折服于中共的强权。

九年后，时任总理的施罗德已经站在中华民国的对立面，开始游说欧盟解除“六四”屠杀后向中共暴政军售的禁令。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德国《世界报》以《施罗德作反对默克尔的宣传》为题报道，“前总理让自己成为‘中国日报’的头版人物。有人让他在那里宣布，联邦政府的政策让他‘不幸福’。施罗德认为默克尔总理会见达赖喇嘛是个错误。北京的领导层为此兴奋。”英语版的人民日报透露施罗德还是西欧一家银行的顾问。其时施罗德被中共外交学

院邀请去参加一个题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研讨会。《世界报》记者无法找到他，但找到外交学院的名誉主席，前中共驻德大使卢秋田。卢秋田对记者表示，“施罗德的访问很成功，我们把他作为老朋友接待”。报道透露这是施罗德在零七年的第二次访问，月底他还会作为温州一家公司的嘉宾第三次到中国。此前这家公司以两百万美元请求克林顿为他们作广告没有成功。就是说，最迟二零零七年，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既沦为中共的宣传工具，又沦为商家的广告招牌。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北京奥运前夕，施罗德在施密特任出版人之一的《时代》周报发表长文《我们为什么需要北京》，为中共违背奥运精神辩护。此文开篇为：“作为总理我每年都去一次中国。现在，自从我的任期结束以来，我每年三到四次在中国。”施罗德象施密特一样以为他到过十多次中国，就是中国专家了。可是，此文透露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对共产极权缺乏了解，只见大陆的表面繁华和相信中共的宣传。

施罗德想当然地宣称，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移民失控、反恐和不扩散大规模灭绝性武器”等挑战时都必须依靠中国才能解决，德国必须为世界接受中国努力和效力。他沿用的也都是中共的宣传，比如，出自花久志的作品，通过张丹红之口引发众怒，遭到痛斥的谬论，“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把近四亿人从极端穷困和饥饿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施罗德也象张丹红一样攻击基民盟的价值观外交，甚至也沿用中共术语“反华”

(antichinesisch)。

大陆是德国在欧洲之外，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施罗德好象担心德国会因捍卫普世价值而失去这个市场。施罗德当年借“以商促变”的说辞支持大陆加入世贸。从此中德之间摩擦点增加，摩擦面加大。施罗德对此避而不谈，却希望读者接受中共特色，并断言“中国在走向民主社会”。他还自吹自擂，一九九九年在他任上开始搞的法制对话和四年以后又开始的人权对话，虽然这两个对话都只起到帮中共抵挡舆论，混淆视听的作用！中共在二零零四年把人权写进了宪法，但人权还是一如既往地遭到践踏。奥运难民和世博难民都是在这之后产生。

施罗德自己不谴责中共暴政，反而诋毁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人捍卫普世价值，还要读者主要是德国政府赞扬人权恶棍，声称“北京希望得到赞赏—我们应对这个国家表示尊重”。施罗德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无视中共的独裁本性，即使中国采纳了德国的法律，但只要法院还接受中共的监控，具体的说是政法委的监控，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公正的社会，法律再好也无济于事。一句话，施罗德一厢情愿地为中共说好话，竭力宣扬“我们必须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对待”，可是愿意象他一样与狼共舞的正常人不多。

文章末尾透露这篇长文的目的，是促使德国政府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说，“我们德国人知道求得认同的愿望：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奥运让德国得以展示一个现代的，对世

界开放的德国，目的是摈弃过去的阴影。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也不只是一个体育盛事，也是一个政治机遇。”

毫无疑问，施罗德很卖力，不过只能得到中共的犒赏，毕竟他的信誉不怎么样。他这篇长文中也回避言论自由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试图用中国老百姓的劳动果实，经济成就来掩盖中共剥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事实。

德国人尤其是默克尔不傻，知道一九三六年的希特勒奥运的目的，没有如他所愿。结果施罗德只好自己前往北京给中共捧场，给中共当花瓶。

与德国之声的女五毛唱和

照理德国之声中文网把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译介绍给中文受众就行了，但是如果这样，五毛就无法为中共宣传了。因为德国记者一般都有批评精神，无法符合潜伏德国之声的中共党员的要求，即使他们只选择左派媒体的评论。

受中共渗透的德国之声中文网象吹捧施密特一样吹捧施罗德，并借他们之口吹捧中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专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谈改革开放30年》。以采访洋五毛为要务的一位女五毛这样介绍施罗德，“他有‘魅力总理’，‘媒体明星’的美名，于1998年至

2005年两度连任德国总理，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008年即将结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中文部有幸邀请到格哈特-施罗德作为VIP-专栏的访谈嘉宾，漫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告别政坛以后，施罗德重操旧业，当律师，并为多家机构担任顾问，其中包括瑞士著名出版集团荣格。他与大名鼎鼎的纽约哈里-沃克演说机构签约，并出任北政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施罗德尤其与中国、俄罗斯关系密切。他不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虽90高龄依旧针砭时弊，‘点评时局’，有人抱怨说，施罗德忘记了曾身为总理，也有人指责他在对待中国新闻自由和人权议题上过于迁就，没有尽到一位昔日总理的责任。”

这位比张丹红还红的女五毛了解施密特与施罗德，也知道相关批评。正是因为女五毛知道他们与众不同，算洋五毛，才会采访他们，吹捧他们。显然施罗德也认识这位女五毛，对此女五毛披露道：“此次采访施罗德是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莱布尼茨著作出版新闻发布会上。《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第四系列第六卷收入了莱布尼茨1695年至1697年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数篇论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通过中西文化与科技交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构想，因此相关新闻发布会受到施罗德办公室的支持，施罗德本人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发布会结束后，在场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我匆忙收拾笔记本和照相机，拿起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和采访包站了起来，这时施罗德已站在了我的面前，向我伸出了手……”

花费纳税人的钱到处采访洋五毛的女五毛这次跑到柏林去，当然也不是为受众带来大陆得不到的自由信息，而是要通过施罗德之口把中宣部论调出口转内销。施罗德的立场大家已经了解。在此只引用女五毛的问题加以证明。她的第一个问题是：“施罗德先生，您在中国被视为最受欢迎的德国友人。您非常了解中国。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您如何看待西方人所说的中国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威权政府领导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

其实女五毛只需要施罗德附和她为中共宣传，因为任何记者谈中共改革三十年不可能忽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转折，只有五毛才会。不仅如此，她还要设法吹捧中共，请看她在提问中多么卖力：“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在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西方人大多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有能力如许多人所称‘拯救世界经济’吗？”这次专访还在三天后以《德国前总统施罗德谈“中国模式”》为标题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发表语音版。

在德国之声中文网对施罗德的报道中，二零零二年有一篇报道标题为《一天遭遇两个红色帝国》。面对德语媒体对专制势力的批评，针对德国媒体对施罗德一天内会见江泽民和普京的批评，德国之声的五毛在介绍时特意加了顶红帽子声称，“从德中两方面都可以听到人们说，德中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已有三十年的历史，现在加深两国关系的机遇

比什么时候都好。但是德语媒体对德中关系却持批评性的保留态度，它们指责德国政府如果不是胆小怕事的话，就是在政治上过份客气了。”随后评述说：“文章批评了历届德国政府总理在德中关系上的立场。时代周报的评论写道：‘绝不进行争论！就象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样，德中关系现在也处于一种戏剧性的正常状态。当年，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与年迈的毛泽东辩论时，曾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谈到世界形势。现在进行国事访问时，政治家们已不再通过哲学建造跨越意识形态鸿沟的桥梁。当年科尔总理的一些错误姿态不禁使人怀疑他与中国领导人同流合污，甚至拜倒在共产党的脚下。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十三年后的今天，施罗德总理与江泽民的政治对话仍然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五毛应该知道施罗德挨批是因为他将人权等议题放在一边，只谈经济。施罗德也不愿因西藏问题惹恼中共，更不会接见达赖喇嘛。施罗德的外交政策一向优先考虑经济利益。

总之，为了配合中宣部的口径，渗透德国之声的五毛要么自己去采访洋五毛，要么只译介洋五毛的言论，甚至公然传播梅兆荣等中共高官的论调。对上述施罗德的挺共长文，德国之声中文网于第三天以《德前总理呼吁不要对抗中国》为题毫不质疑地加以照搬。接着又报道《温家宝会见施罗德称他为中国的好朋友》。一句话，德国之声中文网上不缺对施罗德的赞美，仅从《格哈德·施罗德-改革总理》，《一个贫民的童话：施罗德庆祝六十五岁生日》等标题就足以证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德国当五毛不容易，因为对中共暴政及其施罗德的批评之声都越来越多。

一九九八年，施罗德在联邦议会大会上以52.7%的得票率当选总理，那一次他获得了来自反对党的赞成票。但四年后，他只以50.9%的得票率当选。自己内部有一人宁可当“叛徒”，也不肯把票投给他。

施罗德可能是联邦总理中唯一一个在接受任命书时，拒绝按照惯例宣誓请求“让上帝给予我帮助”，虽然与他同属社民党的总统劳在递给他任命书时，祝愿他得到“上帝的保佑”。

施罗德在任上和任下，在内政和外交，无论是对中共对普京，还是对土耳其对伊朗都堪称见利忘义。他也因此获得赏赐。二零零二年，施罗德获得中共同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三年俄国彼得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五年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施罗德支持侵犯人权的土耳其加入欧盟。

二零零六年六月，一名俄国的普京反对者在德国成功获得政治庇护，《明镜》周刊网络版立即于八日发表文章质疑施

罗德，因为此前他信誓旦旦地担保普京是个“用放大镜都找不到杂质的纯洁的民主人士”。

二零零九年一月，施罗德以个人名义访问“大选”前的伊朗，拜见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再次引发众怒，毕竟这个独裁者还否认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施行群体灭绝的罪行。

伊朗目前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居世界首位。施罗德是由俄国主导的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的顾问，有迹象表明他是去为这家公司与伊朗就共同开发谈判开路。

就是说，施罗德为了经济利益，乐于扮演独裁者的宣传工具。不过，据德国媒体报道，施罗德在伊朗工商会的一次公开演讲的文字稿中指出，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这一史无前例的罪行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政权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那它就必须承认现实，遵守国际规则和懂得让步。可惜不见他这样劝告中共。

二零零九年四月，在施罗德的六十五岁生日之际，《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施罗德，敲门砖》，列举施罗德的所作所为，质疑这位前总理是“在为联邦德国的利益还是在为自己的账户效力”。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号《明镜》周刊驻京记者罗安（Andreas Lorenz）以《聪明的施罗德先生》为题报道，“前联邦总理施罗德乐于前往中国。他利用在那儿的关系

帮助德国企业”。报道透露武汉接待施罗德就象他还是总理一样。施罗德此行是给“德中大道”揭幕。他在面对近三千个听众的发言中赞扬“五千年的伟大文明”和六十年的成就。“从附近的纪念碑闪耀过来的是伟大的毛的红光和金光”，罗安特别描写毛泽东的雕像就在附近，显然是在表明毛泽东的影响还在，可惜，他没写中共六十年的“成就”实际上就是把五千年的伟大文明几乎毁灭殆尽。

罗安认为，施罗德第一次讨得共产党的欢心，是因为一九九九年中共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炸后，他作为西方的第一个政治家前往北京道歉。后来他比别的欧洲政府首脑都经常去中国，并在访问中从不警告中共尊重人权。相反他还建议欧盟放弃针对中国大陆的武器禁运。二零零六年三月以来，按中共媒体报道算，他就到过大陆八次，但罗安认为，施罗德去大陆的次数更多。而且，“施罗德对他个人的生意保持沉默；有时他的反应如此激烈，就好像谁又在说他染发一样。”这篇报道也提到，施罗德甚至会为了高额报酬，不惜参加温州一家公司的活动。

这一次施罗德在武汉的活动结束后，乘坐一个在大陆为地铁打洞的德国公司的私用飞机到成都，目的是帮这家公司赢得开通别的地铁线路的合同。成都当局派了一个由一辆奔驰六百和五辆轿车组成的车队，把施罗德迎接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卢秋田则专程从北京赶来奉陪，陪他参观熊猫，陪他拜访中共的省市领导。下一站是昆明。可惜李嘉廷已经坐牢，否则，奥迪总理可以与奥迪省长一起乘坐奥迪出游！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德新社以《施罗德偷了热霍费尔的秀》为题报道：施罗德和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热霍费尔等，出席在青岛召开的国际新能源论坛的开幕式。但是在与巴伐利亚州有友好关系的山东，前总理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得到热捧，而坐在他旁边的现任州长却被晾在一边。热霍费尔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开幕词中没有被提及，也没有得到致辞的机会。报道结尾说，施罗德表示，“对他来说是‘绝对的新情况’，以‘尊敬的巴伐利亚州州长先生’的名义讲话。”这是德新社发自大陆的消息，德国多家媒体刊发。或许热霍费尔不在乎，但巴伐利亚州的选民肯定有意见，毕竟他们选的不是社民党，更不是施罗德。

从大陆媒体可以获知，二零一零年“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在我国前驻德大使、中国外交学会前会长卢秋田的陪同下，对青岛进行了友好访问”。

总之，施罗德在任上和任下，都见利忘义，与独裁势力同流合污，离任后，更无所顾忌地为强权涂脂抹粉，为商人当敲门砖和广告牌。好在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德国媒体的跟踪，但愿德国媒体的批评能对他有所帮助。

第十章 鲁迅的洋徒弟顾彬

查阅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的资料时，我意外地发现，在上海外语频道为庆祝共产党赤化大陆六十年，推出的十个“中国通”中，排在库恩之前的竟是顾彬。这十个外国人，要么是库恩这样的投机商，要么是基辛革那样的耍政客。顾彬是唯一的大学教授，也是唯一一个德国人，而且我认识。

该频道的网站介绍《中国通》第六集“德国汉学家——顾彬”时声称，顾彬“对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对德中文化交流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顾彬象毛泽东一样推崇鲁迅，不仅把鲁迅译成德文，还继承了鲁迅的作风，怎么可能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正面作用？

一九一八年，鲁迅被象他一样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鼓动起来，为“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落脚点《新青年》写作《狂人日记》，开始发出“听将令”的“呐喊”，诋毁中国文化，为共产恐怖主义开劈思想通道；二〇〇九年，顾彬则被“人民网文化频道”邀请去探讨“儒学的当代使命”，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兜售共产党文化，伪造和谐社会。

所以，值得介绍顾彬在德国和大陆的言行，以说明谁推崇

鲁迅，谁就可能象鲁迅一样，被“共产主义幽灵”操纵，沦为中共的喉舌。

通过“丹红门”输入大陆的“垃圾论”

德国的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屈从中共的旨意，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起，终止传播流亡美国的中国专家何清涟的批评之声后，沦为中共在海外的宣传点，推出了一系列洋吹鼓手，顾彬就是一个例证。

正是德国之声中文网，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对顾彬的专访《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把顾彬的“垃圾论”输入大陆，名扬全球。在德国，汉学是冷门，汉学教授不多，顾彬是其中之一，只有五毛才会把顾彬封为“权威”。

在这篇报道中，顾彬宣称，“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

如果张爱玲不逃离大陆，怎么会用英语写作？华人不都是

因为躲避共产党，流亡到他乡，才开始用外语写作？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红色中国生长起来的华人，用外语写作的不是少了，而是更多！无论是谁，用外文写作，都是因为无法用中文在大陆出版自己的作品。

顾彬却对他们要么谩骂，要么避而不谈。他并非不知道流亡华人和作家的存在。我曾给他打过电话，从他口里获知，他曾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东方向》上评论过我的德文诗集《金莲》和《雪女》。这是我的第二本和第四本德文诗集，分别于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三年出版。面对我的反共诗歌，流亡生涯，顾彬泛泛而论，比别的德国评论者还隔靴搔痒。与他对高行健等的评价相比，他对我还算客气：“作者懂得她的手艺，她也知道，怎样让诗集不在零碎中散架。她算不上大家，但对于北维州来说，她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重要声音。”

“两种外语都没问题”的五四人可能有，但肯定不是鲁迅。鲁迅留学日本八年，虽然没有获得学位，没有用日文发表过作品，但好歹学会了日语。从鲁迅的《滕野先生》来看，鲁迅的表现不象一个学外语没问题的语言天才。从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则可以获知，鲁迅无法用德语交谈。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属于自由世界，鲁迅不需要用外语，就能发表作品。鲁迅作品全是在共产国际间谍比如史沫特莱的推动下被翻译成外文的。而他则翻译了大量苏共的宣传品，比如一九二一年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还有《毁灭》和《浊流》等，达其翻译总量的三分之二。他从日文

翻译过来的代表作则是《苦闷的象征》。

假定顾彬自己主动翻译鲁迅，那正好说明顾彬自觉推广共产党文化在中国的奠基人鲁迅，自觉遵从了中宣部的旨意。鲁迅可能象顾彬一样刻苦，但两人的表现都不象语言天才。二〇一〇年三月，顾彬在学中文四十多年，与一华人生活了二十多年后，还要带着新华字典去接受电视访谈《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窦文涛委婉地问他年龄，他没答，还可说他不愿答，但说到“救世之道”时，顾彬就只好承认听不懂了。

不过顾彬象鲁迅以骂惊人，堪称“骂人冠军”。过去鲁迅诋毁中华文明，颠倒黑白，兜售苏共宣传，把自由的中国诬蔑成“铁屋子”，误导青年；现在顾彬吹捧鲁迅，抹黑独立作家，制造大陆自由的假象，混淆视听。

面对德国之声的红色记者，顾彬骂棉棉、卫慧等的作品是垃圾，骂高行健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垃圾并断定，“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

然而当代大陆作家包括高行健无一不熟读鲁迅，这不正好反证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用毛选鲁集取代古文经典，成为大陆人的教材误人子弟，贻害无穷吗？

可是顾彬执迷于“鲁迅肯定是伟大的”，而无视不被中共“圈养”的大陆作家包括棉棉、卫慧都真实地再现了共产极权专制下的社会乱象。

在这篇让顾彬以“垃圾论”在大陆广为人知的德国之声采访中，顾彬还明确表示，说高行健伟大是“开玩笑”。与哈维尔相比，高行健不算伟大；但与鲁迅相比，高行健很伟大，因为鲁迅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象他自己在一九二二年撰写的《呐喊》自序中透露的那样，是在“听将令”，在思想上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通道；而高行健还没出国，作品就被中共禁止；连他得诺贝尔奖的消息，都被中宣部隐瞒；至今不管是他的名字，还是作品都被中共当局遮蔽。这说明高行健的作品，无论好坏，是个人的思想，超越了中共的思想牢笼。

步鲁迅后尘

顾彬一边在各种场合吹捧鲁迅，一边象鲁迅一样诋毁他人，虽然明知“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并向来“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二〇〇八年，新华网等多个媒体报道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大陆出版发行。在新华网题为《顾彬：40年的爱给了中国文学》的报道中，顾彬说，“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高行健从二〇〇〇年获得诺奖后，就遭到顾彬诋毁。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顾彬一边说和高行健是朋友，一边说，“高的作品总的来说只能算中等”，有比他“好很多和重要很多的”中国作家，诺奖委员会“抓错”了。但另外三个接受采访的德国专家都赞成高行健得奖，其中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瓦格纳（Rudolf Wagner）“称赞也能用法语写作的高是与世界文学关联最大的中国作家”。

顾彬贬低的高行健认同东西方传统，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背道而驰，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顾彬吹捧的鲁迅，反对中国文化，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哄抬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偶像，虽然这尊共产偶像从一开始就被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视为“流氓大师”。

从顾彬的言行也能看出他与鲁迅相似，鲁迅与秋瑾和徐锡麟是同乡，都曾留日，但秋瑾和徐锡麟敢于奋起反抗清王朝，并因此壮烈牺牲。徐锡麟还被剖腹挖心，心肝被刽子手分吃。鲁迅不敢正大光明地谴责清王朝的暴行。清王朝被推翻后，在烈士牺牲十一年时，鲁迅却“听将令”，为《新青年》写作《狂人日记》，借疯子之口诬蔑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吃人”，诋毁中华文化的根基“仁义道德”，首次自暴“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变态心理。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杜塞尔多夫剧院举办中国剧展，主持这个项目的德国戏剧家表示，要研究大陆当代的戏剧绕不开高行健。受慧能启发的《八月雪》在德国

首演，高行健被请到杜市参加活动。据贝岭说，顾彬上前对挨骂者表示要“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也是中共当局对中华民国的要求。可高行健在由鲁迅臆造、共产党落实的“铁屋子”中长大，在“六四”屠杀后“逃亡”，主动退出共产党，不自觉地成为鲁迅的对立面，所以，顾彬那套，高行健明白，而顾彬的现任妻子来自大陆，生长在红旗下，一口共产普通话，她说顾彬冤枉，骂高行健的是媒体，高先生会相信吗？

想来，顾彬亲共与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第二任妻子密切相关，就象《被忽视的中华民国》的作者韦唐仕（Thomas Weyrauch）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与他来自中华民国的妻子密不可分一样。顾彬在另一篇德国之声的采访中，回答说，“我的妻子非常强，她敢说，跟中国作家不一样。另外她什么都不怕。我需要一个强者。如果她觉得她应该说，她就说。如果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我总是反复思考要不要说，所以对她来说我是个弱者。”

面对这位一九五〇年生在大陆，喝中共狼奶长大，一九八五年到德国的女中共党员，顾彬不敢乱说，但在公开场合，顾彬却不谨言慎行，岂不反常？对此了解德国汉学界的流亡学者还学文在点评顾彬的“胡说八道”时，表示，“它们并非无意的‘胡说’，言者是真情吐露；它们并非随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别的”。

遭顾彬诋毁的高行健、贝岭都不为中共当局所容，贝岭还因为想在大陆秘密印刷创办于美国的中文杂志而遭中共逮

捕；棉棉、卫慧和虹影的中文，绝对不比铁凝差，但前三位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可能代共产党操控大陆作协，不太可能为共产党吹喇叭，抬轿子。得到顾彬赞赏的北岛和杨炼，可以在大陆出书，顾彬可以试图用他们来以偏概全，证明极权中国空前自由。

无论哪个华人，都不可能象顾彬那样在红色中国如鱼得水，成为中共媒体的宠儿。就凭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德国一发表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就足以证明身为德国汉学教授的顾彬，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即使是大陆评论界也对他心生疑惑，其中《书城》二〇〇九年七期发表罗四翎的评论《顾彬的可疑与可敬》，明确表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整体评价是非常可疑的”；不过顾彬“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运到中国学界”，是个可敬的“搬运工”。

上海作家孙甘露认为，“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

确实顾彬与接受中共领导的大陆学者没多大区别。他在这本书里除一如既往地挹伐高行健外，还自动过滤了几乎所有的独立写作者，比如，海子和王小波，但提到了八十年代在大陆挨批，后流亡海外的刘宾雁和遇罗锦。与此同时，顾彬换了一种说法肯定毛泽东对鲁迅的吹捧，宣称鲁迅是“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

不仅如此，顾彬还竭尽所能地抬高郭沫若。郭沫若象鲁迅一样诋毁中国传统，投靠共产国际，得到顾彬吹捧，不令人惊讶。惊讶的是顾彬说郭沫若的《天狗》“成功地创造了具有生动形式、热情洋溢的诗篇”。《天狗》与《狂人日记》异曲同工，都是狂人呓语，不过前者没有后者那样隐讳扭曲。郭沫若敢于直接宣泄对现实不满，要砸烂一切的病态野心。

中文网上题为《德国汉学家顾彬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文章则透露，顾彬于二〇〇七年前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讲演时宣称，“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且还能代表二十世纪的德国和欧洲，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跟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模一样”。这让人想起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顾彬如此赞赏郭沫若，却不肯定天狗精神，还反其道而行之，表示，“所以我总是讲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进入了合作的时代。”主张与共产专制合作，这应该是顾彬目前在大陆走红的原因。

这篇讲演还透露顾彬非常清楚，“鲁迅原来是忧郁者”，但顾彬却声称，“他的忧郁或苦闷不是病态，而是一个人对民族、对文化的一种态度”。同时，顾彬还在这次讲演中表示他二十年来做过不少有关“苦闷”的研究，因为它和“现代性”是分不开的。当顾彬在大陆遭到抵制后，为他辩护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文章《波恩的忧郁：罪与对话——我所认识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写到，“顾彬正是将‘忧郁’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生俱来的、被铭定的生活方式’实践于其人生的汉学家”。就是说，肖鹰间接证实顾彬

也是忧郁症患者。

顾彬吹捧者

二〇〇五年，顾彬的文学史在德国出版时，就有著名的羊毛分子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发表好评，称赞顾彬的“伟大行为”，在她笔下顾彬是“书桌前的和尚”。显然毛分子都好大喜功，价值观混乱，不懂顾彬的言行正好与和尚相反。不以和为尚算什么和尚？

魏格林现任维也纳大学汉学系教授。打开该大学网站上她的个人网页，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毛泽东穿着草绿军装，左臂戴红袖章招手的照片。比希特勒造成更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毛泽东，在有黄色五角星的红色背景前，象机器人一样摇动着右手。

在各色独知与红色势力围绕“丹红门”的交锋中，流亡德国的哲学学者还学文，曾撰文《回应49位有色欧洲学者》，特别介绍过魏格林。在此转述如下。一九七五年，二十岁的魏格林获中共当局特准，到北京留学两年，七年后靠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史写作”

（Partei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VR China）获得博士学位，六年后，通过教授资格论文“‘史’和‘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Shi" und

"Lun". Studien zur Methodologie der Historiographie in der VR China), 三十四岁时, 成为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

还学文九十年代中, 去海德堡大学演讲时认识魏格林。谈到“六四”, 魏格林断言中国人不懂民主, 八九民运由西方策动。还学文虽然了解魏的专业是中共党史, 却仍然难以想象, 魏竟有一个中宣部式的花岗岩大脑。魏格林愉快地向还学文讲述, 当年她从西德到大陆留学获得的优待, 以及七十年代, 她的丈夫施威德茨克 (Wolfgang M. Schwiedrzik) 作为德共 (KPD) 中央政治局委员访问中国, 得到邓小平接见的“幸运”等等。

魏格林曾是顾彬的学生, 两人一个推崇毛泽东, 一个推崇鲁迅, 算是气味相投, 毕竟毛泽东自视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 证实毛泽东患“被迫害妄想症”。

静观顾彬反思鲁迅

我不曾见识魏格林, 但我在德国从一开始发表作品就知顾彬活在鲁迅的阴影中。

“六四”屠杀后, 德国文学、艺术和评论季刊《时序女神》

(die horen) 出了两本中国专刊，内容丰富多彩，我的六首德文小诗和一篇短文发表在第一本上。

第二本上则有顾彬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写就的《恐惧的常态》，开篇就说，“在西方，中国享有一个礼貌的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民族的声誉。作家鲁迅却把他的祖国理解为软刀子的地方。整个中国文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屠宰场。在那儿有不同思想的人会被产生于道德观的概念消灭。

这样看来，中国就是个野蛮人的国家，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只是一个证明”。

其时二十三岁的我，对共产党的来龙去脉还不了解，但却否认中共杀人与中华文化有关，毕竟我生长在中华文化底蕴深厚的四川，从小就获知“人命关天”。虽然如此，顾彬所言，“明确的是，德国纳粹曾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人来说就意味着什么”对我却很有启发。

在上述报道《顾彬：40年的爱给了中国文学》中，顾彬说，“1988年翻译完成《鲁迅全集》6卷本后，想到自己才四十几岁，应该还能再做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我开始着手中国文学史研究。”可这套六卷本的鲁迅选集一九九四年才在瑞士出版。依此推断，顾彬翻译完后，花了几年时间才在邻国瑞士找到出版社。

然而二〇〇八年，顾彬却在题为《顾彬：中国文学没希望，鲁迅是德国的》的采访中声称，“对我来说，鲁迅不是一个

中国的存在，他是一个世界文学的作用，完全超越中国文学。所以，鲁迅为什么给德国文学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很多德国文学作家，包括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作家、他们跟着鲁迅写作，所以他是我们（德国）的，不是你们的。”

其实顾彬应该说，鲁迅是共产党的，是他的。我从一九八八年起就生活在西方，认识无数作家，无人提过鲁迅。不过我曾专门去听过一个研究鲁迅，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汉学者的相关报告，并以此断定西方汉学界深受共产党文化渗透。顾彬翻译的《鲁迅全集》可能不是德国人能读到的唯一的和最早的鲁迅作品，但凭此足以断定，顾彬象鲁迅一样堪称“伟大说诳者”（周作人语），象鲁迅一样用狂言来宣泄心中的忧郁。

第一次见到顾彬是在我海归不成，加入流亡华人行列的九十年代末。杨炼被请到科隆开诗歌朗诵会，我去捧场。当时，我见杨炼展示他在大陆出版的诗集，既疑惑又失望。公开活动结束后，我当着忧郁的顾彬指责开朗的杨炼，大意是，要想出名，就写小说，何必这样。我赞赏张戎，用外文写书，揭中共底细。

二〇〇三年，第二次海归不成后，我开始上网。清水君（黄金秋）的力作《鲁迅：汉奸还是族魂？》促使我反思鲁迅，断定以鲁迅为首的五四人诋毁和破坏了以“儒释道”为精髓的传统文化，导致“共产主义幽灵”乘虚而入，祸乱中华。

这之后，我给顾彬去过几个电话，希望他关注张耀杰、孙乃修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我还给他发过两次电邮，向他推荐带着思想成果逃离大陆的辛灏年和袁红冰，以及他们在美国和澳洲创办的《黄花岗》和《自由圣火》，并把我的一篇涉及鲁迅的德文演讲和题为《我看红色文艺及其源头》的中文报告发给他参考。

可惜无济于事，顾彬甘当鲁迅徒，步鲁迅的后尘，象鲁迅一样欺软怕硬，只敢骂遭殃的平民百姓，不敢骂施害的中共当局，沦为“小骂大帮忙”的共产“中国通”。

象鲁迅一样是共运的获利者

作为“文革”的同龄人，我不曾亲身感受共产暴政在中国大陆的血腥和残酷，但在德国的留学和流亡生涯促使我关注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给世界造成的红祸。不仅东德居民经历过梦魇般的“窃听风暴”或曰“他人的生活”，连实行民主宪政的西德也遭受过“小文革”。毛泽东在北京发动的“文革”祸及全球，也在西德肆虐。“停课闹革命”曾被搬到西德大学。

对此用生命反抗“文革”，因“六四”流亡德国的“文革”一代中的佼佼者王容芬在文章《六八年人——德国之声台长拜特曼先生侧记》中概括如下，“‘六八年人’是1968年

罢课造反的西德大学生，其中有些人自称毛分子，他们以北京外文局的外国人造反派输出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红卫兵为榜样，佩戴毛头章，举着毛语录上街造反，与文革并行，坚持10年之久。史学家柯能（Gerd Koenen）总结68年人最活跃的10年，写了一本书，书名揭示了这批人的渊源：《红色十年1967 - 1977——我们的小文革》。这批人后来分化，各自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精明的人入党做官，上了庙堂，愚顽的下了大狱。下狱的是毛分子的中坚，以美茵胡夫（Ulrike Meinhof）和巴德（Andreas Baader）为首的赤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恐怖分子。为要挟当时的西德政府释放狱中同志，狱外赤军旅劫机杀人，制造了腥风血雨的1977年德国之秋。”

被王容芬翻译为“赤军旅”的德国毛分子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然后用东德当局提供的枪支弹药武装起地下组织。美茵胡夫堪称“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洋女民兵。

一九四五年生的顾彬正好在“小文革”中进入大学。别的德国汉学教授比如瓦格纳都在大学的网站公布了自己的生平简历和作品目录，但顾彬却只公布了作品目录。不过在一个名叫Literaturport的德文网站上刊登了由顾彬提供的简历。在此摘译如下。

一九六六年进入明斯特大学学神学

一九六八年到维也纳大学学日本学、日耳曼学、哲学和中文

同年回到明斯特大学学汉学、日耳曼学、哲学和日文

一九六九年转去波鸿大学学汉学、日耳曼学、哲学和日本学

一九七三年获取汉学专业博士学位

二十三岁的顾彬没学过中文，总共只学了五年中文，就用德文写成有关唐代诗人杜牧的论文，并以此获得汉学博士学位。

而一九八三年考上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研究生张枣

（一九六二一二〇一〇），毕业后于八六年到德国留学。张枣从开始学德语到九四年获得在图宾根大学汉学韩语研究所半工半读的资格，历时八年。二〇〇四年，张枣用德文撰写的论文《寻找诗歌的现代性：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中国新诗》问世，才算获得汉学博士学位。

张枣是公认的语言天才。二十三岁出国时，已是大陆民间诗歌界的名星。顾彬是他的诗集《春秋来信》的德文译者。在译后记中顾彬表示，张枣“不仅可以用多种语文交流，也阅读和翻译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学。”

所以，只用五年时间就在德国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只能算是顾彬在“小文革”中获得的“革命成果”。顾彬毕业后，在波鸿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手下工作，并于一九七四年获得德国学术交流总署（DAAD）的奖学金，前去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

从顾彬的简历中，看不出他参与了毛分子的造反活动，但

能获知顾彬象别的毛分子一样自动前往红色中国接受赤化。这些德国人从大陆归来后，就职于德国各个与中国相关的机构，尤其是大学，有的则成为德国各大媒体派驻大陆的记者。不过“六四”屠杀促使很多德国人认清中共的罪恶，与中共拉开了距离，比如，曾翻译了七本毛泽东选集的马汉茂。

顾彬从大陆回到德国后，于一九七七年转到柏林大学东亚专业半工半读。一九八一年，他以论文《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获得教授资格。四年后，顾彬出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时年四十岁。顾彬二十三岁开始学中文，十七年后当上汉学教授；张枣二十三岁开始学德文，十八年后才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一个重要原因是顾彬使用母语，张枣使用外语。

顾彬在这份简历中没有列出自己的作品，但罗列了他在大陆获得的各种奖励。一九九八年顾彬获得红色中国的最佳文学评论奖，由杂志《作家》颁发。到二〇〇九年，顾彬共获得四个奖项，其中包括中共当局于二〇〇七年在人民大会堂颁发给他的“国家奖”。除此之外，顾彬还在简历中表示他不仅在大陆很多大学当过客座教授，还被北京语言学院等十一所大学任命为名誉教授。然而所有奖励和名誉都来自马列中国。

了解共产党执政后大陆情况的人，可以猜想顾彬在“文革”中的北京学到了什么？肯定不是中国文化，不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毛选鲁集或者“马列主义大字报”。

对此顾彬在上海外语频道的访谈录中表示：“当时我对北京的古建筑群，寺庙，花园非常感兴趣，比如圆明园，卧佛寺。当时我都成了一个研究圆明园方面的专家，因为我天天去那里。我那里漫步，尽情欣赏那里的景色和建筑。我有时一人去，因为其他人并不像我这么空闲。那时，我可以说是每天都泡在圆明园和紫禁城中”。“文革”中的北京，在顾彬的口中竟然如此美好，如此古典！恐怕也只有顾彬才能在“文革”中陶醉于古建筑，漫步在美景中。一九七五年，坚持个人观点的张志新被轮奸、割喉、枪毙；而十九岁的德语系大学生王容芬在写公开信给毛泽东，反对“文革”后，被投入红牢，已被煎熬了九年！

二〇〇九年，因大陆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顾彬不仅在五天中出席了九场活动，而且在德国媒体频频曝光。其中，德国《日报》于十月十五日发表《译者顾彬的画像——在中国的明星》。这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也承认：“顾彬是位争强好斗的人。一九七四年，正值“文革”中，他去了中国，开始时让这场残酷的骗局迷惑。今天他对这个错误感到遗憾。”

这篇报道印证顾彬当年算洋毛分子。顾彬至今还时常流露对毛的崇拜。比如，他曾在波恩大学讲《孙子兵法》时说，毛泽东就是靠它打败了日本，幸好在座的一名中国女生指出毛没有打过日本，最多打过国民党。这表明顾彬对中国的了解深受红色宣传的影响，对真实的历史知之甚少。

向我讲述上述情况的波恩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当时在场，对顾彬很有意见，觉得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教授。她说，顾彬讲授汉学，带的都是外文资料；他的应酬太多，不能完成正常的授课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在二〇〇九年把整堂《我怎样解读唐诗？》的课用来宣讲与书展相关的时事和诋毁贝岭；最让这位学生震惊的则是，顾彬教导学生在译书前，要首先评估自己想译的作品能否带来利润。另一位已毕业的博士生则抱怨，曾替顾彬无偿翻译。如此“教售”，在德国实属罕见。

然而顾彬自己却在人民网的专访“儒学的当代使命”中表示，“德国在六七十年代也发生了一种‘文革’，从1968年以后，老师在德国的地位越来越低，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的学生不重视老师。……我们现在的学生是很有问题的”。换言之，顾彬与学生的关系有问题，也知道“文革”对社会的危害并表示，“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再次提高老师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

“译者顾彬的画像”在结尾中说，“二〇〇七年，顾彬获得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中国的国家奖。虽然顾彬翻译的主要是中国异议人士。”

德国电台也因顾彬获“中国国家奖”对他进行专访并强调，他把“很多异议人士翻译成了德文”。顾彬还老提高行健，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因为顾彬只在一九八八年翻译过高行健的《车站》，除了高行健是被禁作家外，顾彬翻译的都是中宣部首肯的大陆作家，包括北岛。顾彬还用北岛的

书可以一个逗号不删地在大陆出版，来证明中共在变好。北岛属“文革”一代，深受共产党文化的毒害，但他在海外这么多年，不大可能还在中共的思想牢笼中，可以一个逗号不删地在大陆出版。顾彬撒谎的可能性更大。

对洋鲁迅的反应

网上显示顾彬贬损高行健的最新报道是：

顾彬：中国文学每况愈下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何乡 2009-08-03 09:50:06 第17期

但在转载过程中，时间提前了，标题也变了：

顾彬炮轰高行健：他的小说差得很

2009年03月13日 09:53时代周报

除了拒绝与顾彬“相逢一笑泯恩仇”外，面对顾彬的谩骂，高行健这十年来用沉默作答。他不愧在对鲁迅的“崇敬”中长大。鲁迅说“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说者没做到，高行健做到了。

在高行健得奖的同一年，贝岭因在北京实践“自由出版”，

被中共逮捕，在国际压力下被驱除出境。从此他也象高行健一样饱受顾彬谩骂。二〇〇九年，贝岭被中共排挤出法兰克福书展前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从而成为德国媒体的焦点，顾彬对他的诋毁也达到高潮。

贝岭在法广中文节目采访时，愤然回击，指出顾彬至少捏造了四个事实诬蔑诽谤他，并斥责顾彬为“逐臭之徒”。这个封号符合顾彬崇拜鲁迅，追求红色名利的事实。

就象鲁迅扣在别人头上的帽子，比如，“流氓加才子”都最适合他自己一样。顾彬骂贝岭“沽名钓誉”，无疑也是他的自画像。顾彬指责中国文人放弃、投降、赚钱，可他们是被迫，而顾彬是自愿。

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让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成为众矢之的，一年后，极权中国借法兰克福书展搞的“文化奥运”既让顾彬出尽风头，又让他丧失信誉。

顾彬固然可以自由地在德国为中共粉饰太平，说什么“今天中国没有人因为写和写什么而进监狱”，“人们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但会被人们耻笑，毕竟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事实，更何况顾彬总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简言之，顾彬作为汉学教授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和学术信誉因此受到广泛质疑，虽然他还不曾用德语讲述他的“代表论”、“双语论”和“一国之声论”等遭人驳斥的“垃圾论”。

了解顾彬及其德国汉学界的还学文，在回顾法兰克福书展时，特意在第四部分驳斥顾彬，表示，“书展前前后后，顾彬教授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和伤害贝岭和流亡的异议知识分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罢休的劲头，但是在捍卫他学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上，却几无声响。”

早在二〇〇九年七月份，顾彬就在德国电台表示坚决反对，因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维吾尔民众而取消大陆作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资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北岛的“所有作品都出版了。他在西方写了什么，就在中国出了什么。一个逗号都没有改变”。即使这是事实，顾彬用北岛的特例也无法掩盖大陆没有出版自由的现实。

针对顾彬的“胡说八道”，还学文还特撰文加以点评，因为顾彬一边用德文对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的德国听众“自由”无碍地兜售他不真实的中国图景；一边用中文对不懂德文不了解德国的中国人倾销他在德国、在西方隐而不言的德国观。而他这种面西言东、面东言西的论说实在离谱，他的妄言太过大胆，以致逾越了虽不说真话但不讲假话这样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还学文明确指出，“这些年顾彬益发地尖锐极端，敢说敢骂，但他狂批滥骂的目标却是高度精确，它可以是当今中国文学的整体，可以是他不能容忍的作家个人，就不是中国官方，它的意识形态、它的言论控制、它的出版检查。这就是为什么批评与叫骂，他还是能常来常往于中国，还是官方中国最受欢迎的西方汉学家，还受到中国政府的奖

励。”

还学文对顾彬的评价与德中两国知识界对顾彬的批评一致。

在“谎言帝国”走红的顾彬难以在德国受到敬重。连亲共的北京歌德学院负责人阿卡曼（Michael Kahn Ackermann）都公开表示，“我跟顾彬很熟，这个人比较激烈，有时候喜欢极端，有时候干脆就是胡说八道”，就更别提那些独立的德国知识人了。

二〇〇五年，顾彬在得不到德国笔会的接纳后，加入奥地利笔会。他为奥地利笔会网站翻译的师涛因“六四”而作的白话诗《六月》成为同行们的笑料。听闻后，我特意查看了它的译诗，也觉得好笑。师涛诗中没有丝毫轻浮之意的“恋人”一词，在他的译诗中变成一个比“情人”还轻浮的昵称。可是顾彬却一再宣称如果不是他，被翻译的作品没人愿读。在上述报道“炮轰高行健”中，他还说“自己在翻译中国诗人杨炼的作品时，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绪冷化，否则，德国读者受不了”，当记者对此表示质疑时，顾彬说：“是。你说得非常非常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它在德国会没有读者。而他是一个不错的诗人。”

这就是顾彬作为翻译对待他称为“世界第一流的诗人”杨炼等的态度，幸好他们读不懂顾彬的译诗。

能读懂顾彬译诗的是张枣，但《“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透露，张枣认为，“诗歌是完全不可翻译的。我非常不愿意翻译。我翻译那些作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朋友需要我做这个事情。我相信诗歌命定是不可译的，所以我会刻意挽留其中的某些部分。翻译是一件比创作更麻烦的事，因为你必须依赖另一个意志，它规定你不能瞎发明。”

二〇〇七年，顾彬在大陆召开的“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上“胡说八道”，遭到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等中外学者学生的驳斥。陈平原也意识到顾彬在“哗众取宠”，而一位荷兰汉学者则断定，顾彬在“在玩儿游戏”。按照学术中华网站公布的《“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现场速记》来看，如在场的一位学生发言总结所说，“绝大部分人认为顾彬教授说的是错误的”。可喜的是这位学生还“认为顾教授涉及的面比较窄，他没有涉及到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家，或者说非主流作家，事实上中国有一大批非主流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想顾教授有可能是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这之后，张枣却出面吹捧顾彬，在专访《顾彬有他的道理》中，他甚至说顾彬“所翻译的中国诗歌都是高段位的，翻译水准非常高，翻译得也很全面”。很遗憾，不知什么时候，张枣放弃了要创造一种“张枣式的汉语”的理想，而开始沿用他曾经突破了的“假大空”的共产党话语。

可能顾彬翻译过他的诗集，张枣要报知遇之恩，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在德国主要在汉学界求学任职，没有脱

离共产党文化，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和鲁迅的危害，象顾彬一样推崇鲁迅，把鲁迅的破坏性当“现代性”诠释与吹捧，甚至在他二〇〇九年主编的《黄珂》一书里，他还在与黄珂的对谈中沿用共产术语“三年自然灾害”，这种中共用来掩盖它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的假话。

张枣的《春秋来信》得到顾彬的青睐，则可能因为原作的颓废与译者的忧郁一致。无论如何，顾彬很难读懂张枣，在译后记中“不得不承认他的困难：真的，在译者漫长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中，这是最难的一次。因此，译者在这儿很想化用和补充评论界评述张枣的一句话：与其说张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更想说张枣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

其实文字晦涩并不意味道理深奥，在上述“一席谈”中，张枣表示，他所在的圈子“写作一开始就不想为这个时代承担什么，没有意识形态针对性，而是想要为整个中国诗歌帝国做什么……我们那时觉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无用的文学，写作就是一件无用的事，是浪费生命、青春年华的颓废行为，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追求失败”。

与张枣同龄的虹影，虽然也曾对鲁迅不无崇拜，在一九九六年还“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不过她也能断定鲁迅有“忧郁症”，况且虹影天性开朗，有苦就倒，有泪就流，有话就说，有福就享，不会被鲁迅的阴影笼罩，不会象张枣一样借酒浇愁，借烟抒怀，在美食中，挥霍才华，慢性自杀。在大陆同行渴望自由时，张枣放弃自由，因为

他更爱故国，代价则是自我束缚思想，大肆吃喝玩乐。

虹影获知顾彬在《锵锵三人行》中再次把她的作品斥为“垃圾”后，愤然在博客上加以驳斥。虹影质问顾彬“张大口时，读过我的作品吗？”

虹影有五本作品被译成德语，其中《背叛之夏》可能是第一本以“六四”屠杀为背景的小说。虹影的自传《饥饿的女儿》好评不断。英文版出来时，就有德国同行向我推荐，后来我向民运志士、《悲怆的灵魂》的作者张林提到虹影时，他答复在大陆的铜陵监狱里读到《饥饿的女儿》并表示，“我当时特别惊诧，大陆怎么会出版她？这本书文笔流畅，非常真实地再现了70年代中国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我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又推荐给别人。我认为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对红色中国的一幅细致的白描，反映了那个悲惨时代的普通中国城里人的苦难处境。该书的冷灰色语调与书中情境特别吻合，读来令人感伤、震动、愤怒。这本书的特别意义还在于，她揭示了中国人的实际精神状态，那种麻木的、介于人和猿猴之间的、与文明人类距离遥远的生命状态。”

简言之，虹影是位难能可贵的当代作家，因为她落实了鲁迅的空话，敢于直面人生，真实地披露她及当代大陆人在极权专制下的非正常生活状态。对此，二〇〇九年她在大陆《时代信报》的专访中，披露新作《好儿女花》背后的心路历程时，表示，“真实往往是很残酷的。你也看到了，小说里家族中的人的变态和多面性，人性的残酷，男女关

系的丑恶……生命中最能伤害你的是谁？不是别人，而是你最亲的人，你的亲人！这就是生活的残酷。生活本来如此，不能回避”。

虹影还问顾彬“干吗板着脸学那种喝棒打死人的中国文革遗风”。不过顾彬不是什么“文学上的种族主义者”，因为他最推崇的是鲁迅，而不是歌德、席勒或哪位德国作家。不过如还学文驳斥的那样，顾彬“反美”，这是共产党文化人的共同点，鲁迅如此，顾彬也一样。

总而言之，顾彬象鲁迅一样，用文字造假，迎合共产党，这与高行健、虹影等用文字追求真实，揭露真相背道而驰。贝岭则关注被中共遮蔽的传统极权中国的地下文学。顾彬回避的写作者，被贝岭视为同道。

所以，虹影与贝岭会不约而同地撰文，“祝高行健生日快乐”，“高行健荣开七秩”，虽然他们既为名缰利绳羁绊，也没有认识到顾彬以他们为敌与鲁迅的关系。不过虹影在驳斥顾彬时，透露他确实象鲁迅一样睚眦必报。

德国纳粹通过宣传，通过语言控制民众，德国纳粹破坏德文就象鲁迅、毛泽东破坏中文，控制读者一样。这些知识顾彬显然掌握，因为他在《锵锵三人行》也说，“如果马克思没有翻成中文的话，没有什么新中国”并承认，“普通话和中国四九年以后的那个发展是分不开的”。

顾彬再一次证明只有知识，缺乏良知，必然象鲁迅一样沦

为共产党的工具，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他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注释：

顾彬现任妻子张穗子是中共党员来自她当年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社会科学咨询室的同事的回忆《斗转星移说顾彬》。文中说，“忽然一次，德国来信炸了希特勒没做成的原子弹，信是两份，一份是穗子所写，称将与顾彬结婚，要开证明。全信没有解释，至今我只记得一句：希望不要开除我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交了两年的党费。另一份是顾彬所写，……先回家离了婚。有如此这般把戏并不是想骗大家，而是出于无奈。”

网址：

http://blog.zhiji.com/blog/readblog_1376926.html

第十一章 与共党一起糟蹋奥运的萨马兰奇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西班牙人萨马兰奇第一次踏上被共产党霸占的中国，三十二年后的这一天，萨马兰奇追随邓小平去见马克思。同天玉树地震，似乎在展示这位配合共党，践踏奥运精神，颠覆正统价值的奥委会太上皇造成的祸害。

萨马兰奇之死让邪恶势力如丧考妣，胡锦涛和江泽民都致唁电表示哀悼。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也送了花圈。

独立知识人则借机痛斥萨马兰奇。连大陆的《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评论《萨马兰奇的中国遗憾》，也不乏对萨马兰奇的不满。作者李承鹏能在大陆出名，说明他还不算体制外的反对派，但他也认为萨马兰奇最大的遗憾该是：“他推动中国主办08奥运，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金牌大国，却没有让中国成为哪怕前五的体育强国。萨马兰奇做到所能的一切，让中国运动员堆金如山，让中国老百姓喜笑颜开，但他还是没有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能力长期从事体育运动，懂得独立的体育精神。至今，中国体育设施人均占有率在世界五十名开外，体育人口占有率在八十名开外。”

就是说，身在大陆的李承鹏也认识到，大陆居民体育设施人均占有率不高，大陆民众参与体育的数量更低。金牌越多，越说明中共当局违背奥运精神，金牌成了专制政府的

遮羞布，虽然萨马兰奇声称“中国人民需要奥运会”。

萨马兰奇不是一个致力于推广奥运精神的体育专家，而是借奥运向专制政府邀功请赏的投机分子；萨马兰奇只帮中共暴政粉饰了太平，让中共能以奥运的名义剥夺北京市民比如叶国柱的基本人权，甚至法轮功学员比如于宙的生命。进一步说，萨马兰奇是中共当局借助奥运金牌遮掩其丑史恶行，转移民众视线，骗取国际承认的帮凶。

二零零九年十月，美籍俄裔历史学家尤利·费尔琴斯基（Juri Felschtinski）、两位俄国国际象棋大师维克托·库尔切诺伊（Wiktor Kortschnoi）、鲍利斯·古尔科（Boris Gulko）和前克格勃高级特工弗拉基米尔·波波夫（Wladimir Popow）合写的《克格勃下象棋》在莫斯科出版。他们一起用亲身经历和史料包括苏联的解密档案，披露苏共如何控制体育界尤其是象棋界。此书也透露萨马兰奇因贪财在苏联走私时被克格勃抓获，在威逼利诱下成为苏共的秘密代理人。

萨马兰奇于一九七七年，出任西班牙驻苏联和外蒙大使。因为他也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奥委会）副主席，对苏共有极大的利用价值，从而受到严密监视，最终沦为苏共的代理人。

正是在莫斯科，萨马兰奇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在中共驻苏联大使的安排下，以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到大陆访问，为中共进入奥委会，渗透奥运铺路。

一九八零年，萨马兰奇借助红色势力出任奥委会主席后，从内部颠覆奥运价值观，将奥运变成了权钱交易、追名逐利的工具。他自己则从反共的佛朗哥的追随者变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客，与中共狼狈为奸，至死方休。

来自西班牙的墙头草

一九二零年，萨马兰奇生于西班牙的一个富人家。其时西班牙也象中国一样在列宁篡夺俄国政权后，成为第三共产国际企图赤化的国家。最迟从一九三一年起西班牙也开始遭受红祸。赞成废除君主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流亡。

在财产、信仰和祖国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威胁后，西班牙人被迫武力反抗。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军官比如佛朗哥也介入政局，内战在西班牙全面爆发。共产国际打着反法西斯的口号，招揽白求恩等各国共产党员组成国际纵队，前去西班牙与反共势力作战。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西班牙共产党把国库储存的黄金大部分运往苏联，请求援助和保存，可一年后斯大林就减少甚至中断援助。而佛朗哥却从一开始就得到反共的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无偿援助。共产势力内斗不断，而反共一方纷

纷支持佛朗哥，最终在佛朗哥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九年四月打败共党，取得胜利。这场抵挡红祸的内战导致西班牙近百万人丧生。而前往西班牙作战的乔治·奥威尔在一九三八年就发现，他上了共产党宣传的当。这一经历与他后来创作《1984》和《动物庄园》不无关系。这两部作品都深刻揭露了共产邪恶主义。

佛朗哥在西班牙的作派与蒋中正退守台湾后的立场一致，捍卫传统，坚决反共，属于威权政府，虽然不尽人意，但与共产极权相比有云泥之别。共产党势力在西班牙不到四年时间杀害的有名有姓的天主教信徒就有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名。共产党在大陆杀害的善男信女更是不计其数。曾以国民大会主席的身份领衔提出《戡乱条例》的胡适，是中共比日本侵略军还凶残的见证人，他曾说，“我的家乡抗战八年未遭破坏，而共产党占领三日，即洗劫一空。”

可惜不了解红色恐怖的西方左派却象共产党一样把佛朗哥和蒋中正的反共举措分别贬为“蓝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被迫用武力抵制红色恐怖，否则，西班牙人和台湾人都会象大陆人一样遭受史无前例的红祸。

萨马兰奇的经历就足以印证佛朗哥不是老百姓的公敌，而是共产党的死敌。

佛朗哥于一九三九年打败了共产党，执掌西班牙政权。在德国进攻苏联时，西班牙曾派部队支援，可能是想夺回苏共霸占的西班牙黄金，不过仅此而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西班牙基本没有参与。老百姓多能自谋生计，安居乐业。富家之子萨马兰奇既能到英国又能到美国留学。二战结束后，一九四七年，佛朗哥恢复西班牙皇室的地位，自己终身摄政。

在佛朗哥的统治下，不从事红色恐怖活动的老百姓都能自由地生活，对此萨马兰奇表示，“佛朗哥政府让我们国家经历了最长的富足与和平的时期”。要不是佛朗哥带领西班牙人打败了共产国际，富家子弟萨马兰奇绝对没有好日子过，但在佛朗哥的“蓝色恐怖”下，萨马兰奇既有钱又有闲从事旱冰球等体育活动。作为旱冰球运动员，萨马兰奇曾进入过西班牙国家队，并于一九五四年成为西班牙国家奥委会成员。

一九五五年，萨马兰奇与佛朗哥女儿的朋友结婚，并从这一年起开始担任西班牙体育官员，后来一再带队参加奥运。一九六六年他被佛朗哥任命为西班牙的最高体育官，也成为西班牙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九六七年，成为佛朗哥的国会议员。一九七五年，佛朗哥辞世，西班牙前国王的孙子卡洛斯一世登基，在他的支持下，西班牙和平过渡到与英国相似的君主立宪制。

佛朗哥辞世后，共产势力在西班牙死灰复燃，党派开始混战，政局开始混乱，类似蒋经国辞世后的台湾。西班牙也开始搞去佛朗哥化。萨马兰奇属被清算的对象。换言之，萨马兰奇在西班牙属反共势力，没有佛朗哥，可能他也会成为西班牙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敌人。

从内部颠覆奥委会

萨马兰奇以西班牙大使出任莫斯科后，却因贪财被抓住把柄而沦为共产党的傀儡，并在其扶持下出任奥委会主席，从此脱离西班牙政坛，投身国际体坛。

在萨马兰奇的领导下追求理想的体育界变成了追名逐利的黑社会。

在德国，萨马兰奇是舆论批评的对象。即使是德国的左派媒体比如《时代》周报都不缺相关批评。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克格勃下象棋》问世不久，《时代》就发表评论《奥林匹亚举办权：萨马兰奇—莫斯科的间谍》。文章开篇就表示，“奥委会经常被称为‘黑帮’。它管理体育如此不透明，确实赢得了这个称谓。二十年来坐在它尖上的是可以在黑箱操作上获得奥林匹亚冠军的萨马兰奇。

现在证明他在克格勃的要挟下从事间谍活动，不令人惊讶。值得惊讶的是，如果萨马兰奇是奥委会里唯一的间谍。

在苏联当西班牙大使时，萨马兰奇就为莫斯科能在八零年

举办夏季奥运出过力。

两年前，已于二零零一年不当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可能也一样插手让索契（Sotschi）象谜一样获得冬季奥运举办权的游戏。克格勃间谍萨马兰奇和克格勃间谍普金——对无人能敌的搭档。”

萨马兰奇的死讯公布后，《每日镜报》在当天发表评论《权力和比赛——前奥委会主席死了》，对他盖棺定论，评语同样尖锐。评论说，“奥委会在八零年后很快表明，那儿在展示一个搞关系的奥林匹亚冠军。” “萨马兰奇被选上一年后就在台上领导了第一个革命”。这个革命指的是萨马兰奇取消了奥运选手必须是业余运动员的规定。

《明镜》周刊当天发表的评论标题为《萨马兰奇之死——奥林匹亚的拯救者，奥林匹亚的出卖者》，文章导言是“萨马兰奇完全改变了奥运。他把奥运通过商业化领入现代，让奥委会致富，为腐败铺路。当他结束作委员会的头时，一个老男人的俱乐部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力”。

萨马兰奇没有拯救奥运，而是出卖了奥运，他搞的革命导致体育运动职业化和商业化。“金牌挂帅”和“金钱挂帅”从此大张旗鼓地入侵国际体坛，奥运精神沦丧，奥运名存实亡。

在这之前，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派出专门培训的选手出席奥运，与自由世界的业余运动员竞赛，虽然不公平，

不过世人也明白来自共产党国家的运动员都身不由己，共产党需要他们夺得金牌来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可这些运动员一有机会便奋不顾身地投奔自由世界，则一再证明共产党国家不得人心，虽然它用“资本主义”国家来吓唬本国百姓。比如罗马尼亚的体操运动员科马内奇。她十四岁时，就在一九七六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令人称奇。一九八零年又在莫斯科奥运上继续夺冠。科马内奇的英姿和奇才暂时遮掩了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暴政。可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她二十八岁时却与朋友一起逃到奥地利，向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在罗马尼亚则于同年底崩溃，执掌罗马尼亚的第二任共党领导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可是萨马兰奇却给齐奥塞斯库颁发过奥运奖牌！

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存在给以奥运为首的国际体坛造成破坏。而萨马兰奇却主动迎合共产党国家的不良行径，违背奥运精神，变业余为职业，助长共产歪风全面入侵国际体坛。在自由世界，各项竞赛和运动健将，也因此大多沦为商家用以牟取高额利润的招牌。为了追名逐利，服用禁药的“毒品化”也接踵而来。

背离奥运精神

古希腊距今已有四千年历史。那时举办奥运是为了“让神

灵高兴”。表达对神灵的敬意是古希腊人经常举办各种各样活动的动力和目的。体育竞赛也是祭祀奥林匹斯山众神的一种活动。其中祭祀主神宙斯的体育盛典最有名，乃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现代奥运的开创人顾拜旦男爵（一八六三－一九三七）已忽视了古奥运的神性。不过他心怀理想，希望借助奥运，把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凝聚在一起，使大家相互交往，增进了解和友谊，促使世界和平、友好与进步。奥运精神首先体现在民间体育活动，通过体育运动影响个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

为此顾拜旦于一八九四年创建国际奥委会，主要职责是实现奥运理想。通过国际奥委会和各个认同奥运精神的国家奥委会，促使奥运精神在世界各国传播和实践。两年后，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召开。

奥运会在民间体育的基础上举办，进一步发扬和实践奥运精神。

就是说，奥运精神需要民间体育和奥运会互相促进，才能体现。

身为世袭贵族的顾拜旦曾为了实现奥运理想而出钱出力，呕心沥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在心灵和经济上都遭受打击。一九一八年他离开巴黎，移居瑞士洛桑，一九二五年辞去奥委会主席。

德国纳粹刚开始反对奥运，因为种族主义与奥运精神相背离，但很快就发现可以借奥运搞宣传，蒙骗世人，遮掩真相。德国纳粹因此向顾拜旦示好，一穷就志短的男爵接受了贿赂。当德国精英比如亨利希·曼在流亡中抵制柏林奥运时，顾拜旦却站出来支持柏林奥运，给自己和奥运带来耻辱。

德国纳粹在柏林奥运前举办到希腊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前点燃奥运火炬的仪式。表面上遵循古希腊的传统，由美女扮演祭司在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前朗诵致太阳神的颂词，然后将太阳光集中在凹面镜的中央，产生高温点燃火炬，随后进行火炬传递活动。这一仪式和活动被奥委会保留至今，在二零零八年则成为世人抵制中共践踏奥运的机会。

德国纳粹借柏林奥运大搞宣传，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希特勒还委派女导演烂泥（Leni Riefenstahl）借有五十一个国家运动员参与的奥运会为背景拍摄大型宣传片《奥林匹亚》。片首字幕一为：“献给奥运会的缔造者皮埃尔·顾拜旦”，可惜顾拜旦在纪录片问世时已撒手人寰；字幕二为“向世界青年致敬，以世界青年为荣”。

参赛的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在柏林奥运上获得四枚金牌。《奥林匹亚》不缺他和别的美国黑人选手的精彩表现；影片中也有黄人选手包括一名掷铁饼的中国男选手的英姿，还有一名日本选手破记录的镜

头，所以，有评论者说，与其说它是在宣传种族主义，还不如说它在反种族主义。可惜在场的希特勒却没有受到教育。《奥林匹亚》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在希特勒的四十九岁生日这一天首映。这部影片曾获当年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可是这一切都无法洗刷烂泥被希特勒借用来粉饰太平，掩盖真相的事实。因为在柏林奥运前后，希特勒都在迫害犹太人，修建集中营。

萨马兰奇出任奥委会主席后，不以顾拜旦和烂泥为诫，反而积极讨好极权专制，完全偏离正道，更令人不齿。顾拜旦当初制定“业余原则”，有着崇高的理由，但萨马兰奇却为了媚共，先废除“业余原则”，后为了牟利，肯定“商业原则”。一九九二年，萨马兰奇修改奥运宪章，正式走向违背顾拜旦初衷的邪路。顾拜旦倡导的奥运精神不再，只剩下了萨马兰奇用以迷惑世人，牟取暴利，遮掩真相的奥运奖牌。

萨马兰奇让奥运沦为共产党国家的宣传道具，自由世界商家的广告招牌，名利之徒的战场赌场。本该自己运动的大众成了看客；参与奥运在共产党国家更是沦为一种需要共产党批准的专利。

奥运精神所蕴含的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观从此沦为奥运会践踏的对象。

萨马兰奇掌控的国际体坛就象当今中国大陆一样，表面光鲜，实则污秽。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各种罪行

层出不穷。萨马兰奇难辞其咎。

与中共共同流合污

共产党篡夺中国政权后，将民间体育组织中华体育协会改组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从此全面操控大陆的奥林匹克运动。一九五二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时，中共政权还没有获得国际承认。当时的国际奥委会认可的是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

但一九四七年在担任中华体育协会总干事期间，被国际奥委会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留在了大陆，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他出面向国际奥委会抗议，促使国际奥委会向中国大陆发出邀请。

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的荣高棠带队出席赫尔辛基奥运会。随后，荣高棠前往苏联，把苏共掌控体育的模式搬到了大陆，从此设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体育被中共彻底管起来。荣高棠自己担任中央体委第一任秘书长，成为中共操控体育的黑手。“文革”时，荣高棠免不了“受到严重迫害”。

一九五六年墨尔本奥运会召开前，因为国际奥委会顶住中共的压力照旧邀请中华民国奥委会派团参赛，中共于十一

月六日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那时国际体育界面对三个被共产党分裂的国家：德国、朝鲜和中国。国际体育界遵守不干涉政治的章程都予以承认，并根据各自的要求称呼之。然而，中共坚决不接受现实，否认中华民国，因而先退出国际田径联合会。在国际奥委会拒绝接受中共要中华民国奥委会改称中国台北奥委会后，中共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宣布，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董守义也被迫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九七零年中华民国的徐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其时萨马兰奇当选为奥委会执委。

一九七一年，中共成功用阴谋诡计取代中华民国，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后，国际奥委会还承认中华民国。国际奥委会最终满足中共的无理要求就多亏萨马兰奇。

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受到中共的关注并被请到大陆，就是因为中共想借助他达到重返奥委会的目的。一九七八年，萨马兰奇就开始与共产党的体育官僚荣高棠、何振梁等一起商讨如何重返国际奥委会。

被霸占的中国和被绑架的人民成为共产党的最大筹码，因为国际奥委会也希望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中国大陆成为奥运的一员。

助中共入奥委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以卡特为首的美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正式承认中共暴政。卡特还没来得及以总统之尊出访中国大陆就被美国人选下了台，上台的是反共的里根。但卡特显然因此成为中共的朋友，曾多次到大陆作红色之旅，并出席中美建交三十年的庆祝活动。

美国承认红色中国为萨马兰奇游说国际奥委会委员开了绿灯。为此萨马兰奇在同年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的第八十一次全会上，发言声称：“国际奥委会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来；我认为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求中华民国奥运会改名，因为台湾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我不相信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会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占全世界人口总数23%的中国被排斥在外，奥运会还能成其为真正意义的奥运会吗？”同时，萨马兰奇还安排何振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组织的代表面对国际奥委会的与会委员，兜售中共对中华民国的矮化。

对此国际奥委会的一系列委员十分不满，新西兰委员质问何振梁，“中国大陆和台湾事实上有两个政府，他们各自管辖自己的地区，两者已经并存多年；为什么你们两个政府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却要到国际奥委会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何振梁却以歪歪理作答：“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承认一个国家奥委会时，应该考虑领土范围的传统。说起政府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做出回答，119

个国家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按照这个原则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共无法用武力消灭中华民国，只好用各种阴谋诡计在国际上排挤中华民国。对于大多数奥委会委员来说，中国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他们很难驳斥何振梁的谎言，比如：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章程，在一个国家只能承认一个奥委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单独承认台湾的某个体育组织是违反国际奥委会章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3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体育组织都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开展体育活动；在台湾地区发展体育运动的任务可以由台湾的体育组织负担。但是，对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和一切国际体育活动，只有一个全国性的国家体育组织才能代表，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不能设想，中国所有的省、市和自治区都成立一个奥委会同时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

国际奥委会英国委员问：“就英国而论，香港有权利单独加入国际奥委会，为什么台湾不能单独加入？你们说香港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难道台湾不是历史的遗留？”何振梁则诡辩到：“这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目前争论的是代表权的问题，而不是管辖权的问题；国际奥委会所要明确的既不是开除一个会员，也不是承认一个新会员，而是由谁来代表中国的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政府只是地方当局。”

对萨马兰奇来说，中华民国和共产中国就象芝麻和西瓜一样，他不会为了正义，拒绝西瓜，捍卫芝麻。中共没能在国际奥委会的全委会上达到目的，但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名古屋会议上通过相关决议，并把决议提交给委员进行通讯表决。在萨马兰奇的游说下，绝大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表决支持中共的无理要求，要中华民国放弃自己的国旗与国歌，作为共产中国的地方性组织，以中华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加奥运会，并使用有别于以往的歌曲、旗帜和会徽。

中华民国奥委会委员徐亨状告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传》中有相关内容并透露，萨氏对此极为愤怒。可惜洛桑法院无法主持公道。不久，一九五四年加入共产党的何振梁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共得以渗透国际奥委会。而萨马兰奇却好意思自我吹嘘，“一九八零年我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所做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在恢复中国在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之后，完成了一个创举：即让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会。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一个中国、而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都能参赛的难题。”

互相利用的大小黑帮

萨马兰奇从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到大陆访问，开始为中共渗

透国际体育界而效力。一九七九年，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就成功获得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

半年不到，萨马兰奇就在邪恶势力的支持下在莫斯科当选为奥运会主席。其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抵制苏共践踏奥运精神。那时，中共已不买苏共的账，而支持自由世界的义举对它更有利，因而中共也参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莫斯科奥运会结束后，萨马兰奇开始全面投身于革奥运的命，包括为四年后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作准备。

一九八二年三月，萨马兰奇以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到大陆访问，得到邓小平接见。当苏联报复美国，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时，中共派代表队参加。大陆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红色中国在奥运会上第一枚金牌，萨马兰奇作为奥委会主席为他颁发首枚夏季奥运会金牌。中华民国因反对矮化，缺席两届奥运会后，接受了中共的无理要求，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

萨马兰奇负责的第一届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靠奥运发了大财的奥运会。洛杉矶的示范效应，使得奥运会的主办权从此成为萨马兰奇的诱饵。

洛杉矶奥运会后，萨马兰奇应邀到大陆参加中共的三十五周年国庆。他趁机向何振梁建议考虑申办奥运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申办奥运的国家和城市越多，萨马兰奇越

能中饱私囊。

与此同时，萨马兰奇也为四年后将在汉城举办的奥运会与中共磋商。因为，中共一直支持共产专制的北朝鲜，与反共的韩国没有外交关系。北朝鲜已宣布抵制在韩国举办奥运会。当年中共支持金日成侵略韩国，欺骗和强迫中国人给金日成当炮灰，让百万中华儿女命丧朝鲜。然而这一次，中共却没有支持北朝鲜抵制汉城奥运，可见萨马兰奇与中共的关系特殊。

但汉城奥运会就已经笼罩在运动员参加奥运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名利，因而不择手段的阴影下。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服用禁品的丑闻震惊世界！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后，中共在世人面前暴露了凶残的真面目。为了遮掩罪行，转移视线，中共开始在萨马兰奇的协助下申办奥运。对此何振梁的《申奥日记》有记载。萨马兰奇还专门修改章程，以便何振梁能当上奥委会副主席。

一九九三年五月，在二零零零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揭晓前四个月，中共当局邀请萨马兰奇带着一个五十多人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团，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

中共浪费了不少民脂民膏，还释放了魏京生等共产囚徒，以示在中共的暴政下人权得到改善，但是“六四”血迹未干。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都

通过决议，反对在北京或在中国其他地方举办二零零零年奥运会，中共没能如愿以偿，以两票之差输给大陆难民的聚居地之一悉尼。

在二零零零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共体操代表队靠谎报年龄获得个人奖牌和团体铜牌。

科马内奇在十四岁时获得奥运金牌后，国际体操联合会在一九九七年提出国际体操出赛年龄为十六岁。培养出科马内奇等奥运冠军的体操教练贝拉·卡罗里等人经过十年举报和抗议，终于促使国际奥委会在二零一零年四月宣布收回相关奖牌。卡罗里了解共产党国家的体育界，他也因此在一九八一年就逃亡美国。他抨击中共野蛮落后的集中营模式和举国体制，推崇美式体制。他还认为，参加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体操比赛的大陆女选手除队长外，其他均不足十六岁。

中共发言人表示被追回悉尼奥运会铜牌的董芳霄篡改年龄是个人行为，但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挑选和培训运动员的目的是给暴政涂脂抹粉，全然不顾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前途。一九八六年，董芳霄生在一个希望靠女儿脱贫的人家，四岁就被迫练体操。十岁时被选拔到国家体操队，从此每天早上八点开始训练，一直到晚上八点结束，重复枯燥单调的动作。一九九八年，十二岁时，因运动量过大，股骨头坏死，然而却靠打封闭针缓解痛苦，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奥运金牌。

二零零一年在全运会前夕，董芳霄已经疼得不能走路了，但还是靠打封闭针参加比赛，直到终于倒下。二零零二年，十六岁时，董芳霄已经病退。她先后进行了八次大大小小的手术，靠植入一块软骨才保住行动能力，但从此双腿粗细不均，不能久站。董芳霄为奥运奖牌付出巨大的代价，到头来成了一个替罪羊。

与共产极权专制下的运动员和教练相比，自由世界的运动员和教练显然日子好过很多。不过由于国际体坛的堕落，运动员都可能沦为牟取暴利和虚名的商品。年龄门、禁药门、受贿门等丑闻不断，都是奥运在萨马兰奇的领导下误入歧途后产生的乱象。

申办奥运的费用逐届提高，举办奥运的费用也翻番不止。因此，大陆记者赵牧在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就发表评论《奥运会是怎么肿起来的》，透露奥运项目也成了交易的对象并表示“奥运会项目要是这样朝着‘更贵’的路子走，那些小国穷国不要说举办奥运会，参加奥运会大概也力不从心了。以顾拜旦的名义，以奥林匹克宪章的名义，他们是不是应该被鄙视”？文章末尾犀利地指出，奥运会越来越肿的根子在国际奥委会。

准确的说根子在萨马兰奇！正是萨马兰奇为造假、服药、贿赂等恶行提供了机会，开辟了通道。

萨马兰奇的罪责

一九八零年，萨马兰奇靠邪恶势力的支持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国际奥运沦为萨马兰奇窃取名利和向专制势力讨好的工具。虽然《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

萨马兰奇一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就把奥运当作他牟取暴利的手段。过去的奥委会主席全都只干活不拿钱，但萨马兰奇每年从奥委会领取一百万马克的纯收入。过去的奥委会是每个成员都要交费的俱乐部，但在萨马兰奇的领导下，奥委会变成了一个资产数亿的康采恩。举办权、转播权等等都成了萨马兰奇的摇钱树。

萨马兰奇变体育为商业，变奥委会为黑社会，抛弃了古希腊奥运虔诚的竞赛传统和顾拜旦的奉献精神，但发展了德国纳粹利用奥运的卑鄙手段。萨马兰奇不仅与苏共和中共合作，还给齐奥塞斯库和昂纳克颁过奖牌。

一九九八年，美国曝光盐湖城为获得零二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贿赂国际奥委会的丑闻。

大陆记者赵牧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在《新民体育》上发表评论《萨马兰奇可以例外吗？》，文中写道“《盐湖城论坛报》指责萨马兰奇至少两度违反有关规定，接受赠枪和印第安人的饰物……自几年前两名英国记者撰写的《五环

旗下的罪恶》发表以来，有众多迹象表明，国际奥委会的腐败已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因此它的神圣权威也受到强劲挑战。当奥运会申办已成为耗资惊人、风险巨大的金钱战时，众多惨痛的失败者不可避免会将愤怒转化成强大的反对力量。瑞典城市厄斯特松德联络其他申办城市，争取要回为申办二零零二年冬季奥运会花掉的钱就是最好的证明。原来收受礼品‘可以例外’的萨马兰奇，眼下已经被质疑为是否能够‘例外’了。”

《德国电台》在萨马兰奇死后三天播报的评论《谁是五环王》中说，“盐湖城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尖。”“萨马兰奇的名字会永远成为奥运腐败的同义词”。

靠腐败治国的中共官员对此却见怪不怪。在萨马兰奇面临巨大压力时，大陆奥委会发言人出面为萨马兰奇减压，声称，悉尼和盐湖城已经为承办奥运会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做了积极准备，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良行为使这两个城市受到损失，使市民受到伤害。在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的后面有什么黑幕只有萨马兰奇和中共当局知道。总之，没有中共等邪恶势力的扶持，萨马兰奇很难靠替罪羊逃过惩罚。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主办权后，十五日晚，与江泽民在中共驻俄大使馆相会，狼狈为奸是也！

萨马兰奇违背奥运精神，将国际奥委会变成了他的独裁王

国，自任主席长达二十一年。为了连续四任主席，他改变相关规定。在他以八十一岁的高龄下台前，还安排他的儿子进入奥委会。他也象江泽民一样退而不休，直到被迫终止。

中共封萨马兰奇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象斯诺等红色笔杆子一样萨马兰奇只是中共的好朋友。也因此中共媒体上，到处都是对萨马兰奇的吹捧，比如二零零七年中共凤凰电台的采访《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奥林匹克梦想》。准确的标题应该是《萨马兰奇与中共对奥林匹克梦想的践踏》。中共上海外语频道拍摄的十集纪录片《中国通》里也有萨马兰奇。此片在中共六十周年之际播出，还伴随有相关的报道和图片展。

被中共渗透的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也在萨马兰奇死后专门翻译了一篇萨马兰奇粉丝的评论《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逝世》。不仅如此，编译者居然在译文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在末尾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小标题加了一段原文没有的文字，声称“在中国，萨马兰奇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得以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这主要归功于萨马兰奇在退休前的最后努力。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三天后，萨马兰奇从国际奥委会主席位置上卸任。”

萨马兰奇在中国的很高声誉无疑是中共及其五毛吹出来的。早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五日大陆《新民体育》就曾发表

赵牧的《萨马兰奇与一只苍蝇》，被视为苍蝇的萨马兰奇显然与很高声誉相去甚远。

海外独知淳于雁则在《萨马兰奇终于“万寿无疆”——兼议其一生的正负两面评价》一文中，把萨马兰奇与菲律宾的马科斯、北朝鲜的金日成、中国的邓小平、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等独裁者相提并论。

无论如何，在国际奥委中，在当了委员四年后又担任执委会委员并接连担任副主席的只有萨马兰奇、俄国委员斯米尔诺夫和中共委员何振梁。这也是奥委会早已是专制腐败势力操控的一个证据。

二零零九年十月，萨马兰奇亲自出面请求奥委会委员投票支持马德里获得二零一六年奥运会主办权，但还是没有成功，这证明萨马兰奇确实不德高望重，而是靠权力和金钱收买人心。

对此《德国电台》的评论说，“在他当主席的八零年到零一年期间，萨马兰奇不必问。他可以操作。就象他八六年做到让奥运到他的家乡巴塞罗纳一样。”

萨马兰奇自己表示，他最大的成就，是让共产中国举办了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为此付出的努力贯穿了他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二十一年。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萨马兰奇到大陆二十九次。

萨马兰奇在世人抵制中共象希特勒一样践踏北京奥运时，象五毛一样站出来无耻地宣称，“体育世界是美妙的，国际奥委会是一个由204个不同种族、不同传统、不同社会制度的成员组成的大家庭，大家和平相处，因此奥运会是青春、体育与和平的盛会。西藏事件不应成为抵制奥运会的口实。”

萨马兰奇还象施罗德一样为上海世博撰文，表示，“我相信，像北京奥运会那样，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将再次向我们展现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对和平与进步的热爱。上海世博会一定会成功”。

萨马兰奇真可谓为中共摇旗呐喊，致死方休，这应该是他的最大恶行。

无论共产党和五毛党如何哄抬萨马兰奇，改变不了他名列历史耻辱柱的下场。

萨马兰奇耗费巨资在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修建了一个奥林匹亚博物馆，想让自己永垂不朽，可是洛桑市政府拒绝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他死前，西班牙国内一直有人要求取消他的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的称号；他刚死，便立即被中国人推荐为“可耻的洋人”。这就是为了一时的虚名实利，而践踏道德伦理的国际名人的归宿！

第十二章 中了美人计的沙博理 (Sidney Shapiro)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计是中共的一贯伎俩。热爱中华文化的美国人沙博理中了共产党的美人计后至今浑然不觉，他居然觉得生活在共产党的监控中比在美国好得多。

美人计

有位六四屠城后名列中共发布的全国通缉令的民运志士，在经受住了中共的种种迫害包括六年红牢后，于1996年逃到美国，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2007年通过交友网站结识一位美人，半年后英雄求婚成功。感人的婚礼举办不到一年半，英雄就在被美人称为“哥哥”的上海来客走后，“陷入连续不断的灾难，从此家无宁日”。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不久，英雄勇敢地在网上自报家丑寻求解脱。对此流亡作家遇罗锦评论说，“对海外屈指可数的男性民运精英们，老共又有新招儿了：若给你们一枪子儿，让你们死得太爽快太英雄了，岂不是太便宜了你们？你们梦想的年轻小美人儿，让你们生不如死。”

无论这位英雄是否中了中共设的美人计，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美人计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不是什么新招儿。这位没过美人关的同胞让我想起两个中了美人计的洋人。

1994年上映的电影《蝴蝶君》（M.Butterfly）就是一位在北京中共共产美人计的法国外交人员的梦魇。1964年，敬仰中华文化的法国青年伯纳德·博斯克特（Bernard Boursicot）被派往法国驻华使馆工作。象梅兰芳一样擅长花旦的时佩璞在中共的操控下，让20岁的博斯克特迷上了他。常人难以想象时佩璞居然能让博斯克特痴迷到相信他是女儿身，相信他们有了“爱情结晶”。法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经时佩璞抵达中共手中。1982年，博斯克特还把时佩璞和他们的“儿子”办到了巴黎，好在法国警方不迷。当法庭向博斯克特宣布时佩璞是男人时，他拒绝相信。最后警方把他俩关在一间囚室，让博斯克特自己去证实时佩璞是男是女。博斯克特面对真相，绝望地割喉自尽，被抢救过来。可惜这却改变不了他中了美人计而沦为中共牺牲品的事实。1986年5月，博斯克特和时佩璞因向中共政府提供约500多份情报而被判处6年监禁。时佩璞已于2009年6月30日在法国去世，但博斯克特仍生活在中共的美人计给他造成的伤害中。不过与他相比，另一个敬仰中华文化的美国人沙博理更可悲可叹，因为他大半辈子都生活在中共的操控中，至今不知自己中了美人计，沦为中共的宠物。自己坐在中共的牢笼中却宣称，“尤其是跟美国的生活比，我觉得还是我们好得多”。

1915年，沙博理出生在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后成为律师，二战时应征入伍，服役期间被派去学中文，结识潜伏美国的共产国际势力。1947年沙博理带着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女儿杨云慧的介绍信到了上海。用沙博理自己在2008年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的话说就是，“一张三百元的小货轮船票带着我，从纽约经巴拿马运河，抵达了中国。在一幢破败的五层公寓楼‘万岁楼’的顶层，一个三十来岁非常漂亮的女人为我开了门，她穿着一身简单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凤子”。

凤子（1912-1996）原名封季壬，书香门第出身，可惜三十年代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被共产国际间谍赤化，投身中共“文委”领导的红色文艺。在当时的中国，有教养的女生是不当戏子、不上舞台的。封季壬改名凤子的一个原因就是怕她家人知道她公然在洋剧（话剧）中表演令人不齿的角色。凤子在生活上也象江青、韦君宜等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新青年、新女性一样，实践共夫共妻的杯水主义。中日战争在共产国际间谍地挑动下爆发后，江青尾随昔日情夫黄敬（俞启威）投奔延安，凤子则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其时凤子的伴侣是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孙毓棠（1911-1985）。但这并不影响她与有妇之夫曹禺发生关系。王先金在《曹禺的婚恋始末》中甚至写道，凤子“好像犯‘花痴’”。

在国民党主导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凤子在中共的安排下，以《新民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接收大员汤恩伯一起乘飞机首批抵达上海，投入中共渗透国统区的红色宣传工作。当沙博理找到她时，凤子刚在上海中共组织领导下开始主编红色刊物《人世间》。其时共产国际间谍路易·艾黎也在上海从事非法活动，也成为沙博理的朋友。

从中共媒体对沙博理的采访，比如《我的中国：翻译家沙博理》（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4月26日）

中不难了解沙博理如何在凤子的影响下借美国人和律师的身份协助共产国际渗透和颠覆中华民国。沙博理自己承认，

“原来就看她外形很好看，后来也慢慢地知道，她干的是什么事了。一个年轻女孩子，搞那么危险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就首先是佩服她这个人”。凤子当时已经三十五岁，比沙博理至少大三岁，可是这个情场老手居然会让沙博理视她为“年轻女孩子”。以冯亦代为首的红色卧底则于1948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制造凤子将和美国律师沙博理结婚的舆论，促使语言不通的两个人结婚。沙博理后来回忆说，

“只是说话并不太方便，她的英文水平跟我的中文水平差不多，她是破英文，我是破中文”。

沙博理在1997年凤子死后写作的《金婚别》中表示，凤子介绍他“认识了几个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他们在上海做文化工作。我开始明白革命的大道理，也参加一些革命工作。比如，把国民党当局要抓的同志藏在我们家里；让地下党的同志在我们家用短波偷听延安的广播；与《密勒氏评论报》的舒子章一起，帮助学生出一个进步的英文杂志，在我的办公室秘密安排，把孙夫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一些药品送到解放区，等等。”

中共中央电视台则在上述采访节目中宣称，“1948年5月16日两人在上海文艺界朋友的帮助下结婚了。在亲密爱人凤子的影响下，沙博理不仅理解了革命，还以他律师的身份做掩护，使地下党避开了当时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目光”。

沙博理自己在采访中说：“国民党不能够随便来，查我们的房子什么的。此外呢，我自己那个办公室，一个律师办公室，在高楼大厦里，相当讲究了，好像很绅士的样子。下班了以后，从解放区出来一些人，跟我们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在那开过会”。在中华民国的天下，居民享有人权，警方不能随意闯入民宅，所以，共产国际得以滥用中国的自由从事支持用暴力颠覆民国政府的共产恐怖主义活动。1948年的11月，沙博理夫妇在共产党的安排下搬去北平。

中共在各国共产党徒地支持下打败中华民国后，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参加了中共的开国大典。沙博理从此定居北京，成为中共用高薪奉养的几名“外国专家”。这位支持中共的律师变成听从中共领导的翻译，专门搞对外宣传，1956年就在美国出版第一部讴歌共产党的译著《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遵照中共的意志翻译了大量的红色宣传品，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女儿给他这位六四屠夫立的伪传。

笼中鸟

在中共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后的1962年，中共赏赐给沙博理一家三口一个剥夺来的四合院。受宠若惊之余，沙博理申请成为中共的臣民。1963年，经周恩来批准，享受特权的沙博理加入红色中国籍。沙博理从1971年起可以每两年去美国一次，路费由纳税人报销。1979年他第四次去美国时才能带上凤子。

从沙博理的红色传记《我的中国》中可以获知，“由于凤子，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她已成为我的中国。凤子，Phoenix，凤凰，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

凤子在我的文学翻译中，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国际活动中，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她使我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我深深地感激她”。

就是说，中共通过凤子利用沙博理对中华文化的一往情深成功将他套上了马列政党践踏中华文化的战车，让他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党文化的传播者，因为他自己承认，“政治方面，马列我并不是太懂，可是中国文化、历史、艺术，这些方面我很喜欢。”沙博理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全然不觉自己错把霸占中国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的赤龙当成了中国龙。1983年沙博理作为高干离休后，被中共任命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一直连任。

从沙博理的讲述中，明言人也能看出中共如何祸国殃民。沙博理在上述《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表示，“在我眼中，50年代初期的北京无与伦比，没有哪个城市比它更富于中国传统，古老，威严，优雅。有石狮子守卫的王公住宅，十字路口绘有美丽图案的石牌坊、木牌坊。整个城市包在一重厚厚的带雉堞的城墙中间，在一定的间隔处设置有厚重的、饰有大铜钉的结实大城门，上面是用砖瓦盖顶的城楼要塞”。最后他却表示，“现在中国的物质文明是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却落后了，官僚资本主义、贪污腐败，罪行每天都可以在报上看到。”

综上所述，身为红色娘子军的凤子嫁给沙博理必定需要得到中共的指示和批准。种种迹象表明凤子对沙博理的感情很成问题。1950年1月，沙博理和凤子唯一的女儿亚美出生，但中共派兵支持金日成攻打南韩后，1951年凤子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凤子不恨共产党强迫中国人给金日成当炮灰，却仇恨支援朝鲜人反对金日成红色恐怖的美国人，并迁怒沙博理。可是中共需要沙博理出面诬蔑美军在东北搞“细菌战”，沙博理“揭露美帝侵略”有功，因此凤子无法抛弃沙博理。而1937年就加入中共的美国人马海德（1910-1988）也劝告凤子说：“沙博理是爱你的呀”！这可能是沙博理日后为马海德作传的原因之一。

凤子也象所有的拥共和亲共的文艺界人士一样受过迫害，况且她与江青在上海共过事，彼此知道底细。毛妾江青当道时，凤子被批斗、坐牢、进五七干校，受尽折磨、摧残。1976年才回到北京。其间，沙博理对她一直不离不弃。沙博理得以幸免，是因为中共需要他翻译《水浒传》。另一位因嫁杨宪益而与沙博理一样沦为红色翻译的英国人戴乃迭则坐了三年红牢。

1993年10月，凤子因撰写《迎接金婚——八十自述》而第一次提到她的洋丈夫，虽然离金婚还有五年。她在此文中说，“我们爱过，怨过，只有今天才似乎有所相知。才相互了解彼此的为人、脾性、喜、怒、哀、乐。漫长的岁月，战争，‘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人的性情有时几乎被扭曲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才发现彼此的长处和弱点。”对

此沙博理在上面提到的《金婚别》中表示，“我想起在我们婚后所有这些年的生活中，在她这篇回忆录之前的任何文章中，她从来没有提到过我。当她写到我们一起做的许多事情当中的某件事情时，我简直就不存在。”

与韦君宜（1917-2002）相比，凤子对她投身中共的反华事业几无反省，也因此得以当上中共剧协书记处书记。她去见马克思后，中共在《封凤子同志生平》中宣称：“封凤子同志是有名戏剧家、作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凤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象凤子这样听从中共领导的笔杆子没有资格当戏剧家和作家，因为独立、自由是每个艺术家和作家的追求。但毫无疑问凤子算中共的优秀党员。象她这样用美貌和才能令一个美国人臣服中共的女共产党员毕竟不多。如此成功的美人计在中共的历史上罕见，值得披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后记 身在夏天心系梅花

二零一二年是我离开中国大陆的第二十四个年头。我很庆幸在“六四”屠城前就留学德国，否则，我要么继续被中共欺骗而不知；要么象孙宝强等中国精英一样会因说真话而成为“红楼女囚”。孙宝强不仅因抗议“六四”屠杀被囚禁被侮辱三年，而且出狱后还遭受监控和迫害。

而我因身在德国，“六四”屠杀后，不仅可以连续两次去中共驻西德大使馆前抗议，以解胸中怒火，而且还能发表演讲和作品，谴责共产暴行，声援大陆同胞。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德国宪法保障的人权。可是在中国，我们却被共产党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二零零四年，我被迫申请加入德国籍，虽然德国本不是我乐于生活的国度。我赞同生在中华民国，亲历红祸的李一民在《我的宣言》中所说，“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遭受最大劫难的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全世界也深受其害”。可是德国人至今却只把希特勒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马克思在二零零三年还在德国电视二台（ZDF）的节目“最伟大的德国人”中名列第三， he 之前是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统阿登纳和天主教改革者路德，科学家爱因斯坦名列第十。这是“共产主义幽灵”还在德国游荡的一个证据。

我曾数次企图离开德国，可惜每次都不成功，德国成了我今生的宿命。既然躲不了，我就只好留在德国，一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的知识骗子或曰洋五毛唱对台戏，一边为海内外的各国精英当啦啦队。

共产党虽然企图剥夺身在大陆的中国精英的话语权，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无国界，我既听到了孙宝强的呐喊，又读到了李一民托人带到国外的反共宣言。

身在海内外的中国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获知中共推崇的马恩列斯是什么货色，毕竟共产阵营已经解体，苏联的秘密档案已经公开。

非我族类

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协助下开创了蔑视道德、颠倒黑白、传播仇恨的共产党文化。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后，红祸开始泛滥。恩格斯认识到马克思“就像有一万个魔鬼通过他的毛发捉住了他”，但他却支持万魔附体的马克思，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的“革命理想”。马克思曾向其女儿劳拉透露，他对幸福的理解是斗争，他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这正是共产党成立后的行径和表现。

列宁把马恩的仇恨学说、阶级斗争落实到了行动上，于一九一七年创建了第一个以共产邪说为国教的红色暴政，并开始渗透和颠覆各国。

列宁还开创了滥用文艺作品篡改历史，美化自己的共产歪风。如果《震撼世界的十天》是共产马屁文学的先锋，那么《列宁在1918》则堪称红色宣传片的样板。斯大林用这部影片伪造历史，抹黑对手，美化自己，走在了毛泽东之前。共产偶像鲁迅的崇拜者总是把共产罪恶算在中国文化的头上，他们不知中国历史上存在独立的史官，连皇帝都不被允许阅读正在撰写的历史，以防皇权干扰书写真实的历史。

一九九一年，用谎言和暴力维持的第一个共产极权终于在民众的抗争中瓦解。被列宁篡夺的二月革命的果实——俄罗斯共和国复活。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经受了七十四年的血雨腥风后，又重新在俄国天空中飘扬。

而共产国际虽然在大陆颠覆了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的国旗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台湾迎风招展，象邓丽君演唱的《梅花》一样慰藉着共产难民冤民、感化着共产愚民暴民，激励着几代中华儿女。

中共照搬马恩列斯那一套，强行用它钳制中国人的心智，异化中国人的本性，但是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抗争，因为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根除中华民族的血脉和中华文化的神根。共产党的假恶斗不可能征服人心。

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都不会甘愿做马列子孙，因为共产党违背敬天重德的中国文化，无论共产党如何破坏中国传统，都无法铲除五千年的文明留下的印记。

中华儿女

在今生走过的四十六年里，我有二十九年以外文为业，不过这非但没有影响我吸收中国文化的精髓，相反还促使我通过外文和外族获知被共产党覆盖的文化根。

当年我在四川即使被强迫学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但左耳进，右耳出，因为它不符合人性，而邓丽君的歌声却能打动我，引起我的共鸣，因为她来自中国传统，表达中国人情，带着民族特色。中共当然会把邓丽君的歌曲当“靡靡之音”批判和禁止。可是这不能阻止邓丽君的歌声在大陆传播，虽然邓丽君本人从未到过大陆。

八九民运时，邓丽君在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义演。她胸前挂了一块上书“反对军管”的牌子，演唱了歌曲《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六四”屠城后，一九九一年她还最后一次去金门慰问国军，并到广播站表达她身为中华民国公民的幸福，并希望大陆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可惜四年后，一代歌星陨灭他乡。

当年我在大陆听邓丽君时，还不知道大陆人在邓丽君的眼里是需要解救的共产人质。如果没有“六四”屠城，我或许也不会一下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到过大陆的邓丽君不仅与我的大陆记忆紧密相连，而且还是我流亡生涯的精神伴侣。

我身处德国大都市，但俨然象生活在“小城的故事”里；铭记在心的也是邓丽君的“梅花”。一来邓丽君就是梅花的化身，二来梅有三蕾五瓣，颇能象征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且梅花凌冬耐寒，表现的坚贞刚洁，足为世人效法。梅开五瓣，好比五族共和，与敦五伦、重五常、敷五教一致；而梅花枝横、影斜、曳疏、傲霜让人联想到《易经》中的“元、亨、利、贞”之四德。因此，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于一九六四年将梅花订为国花。

事实上，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中国人流亡世界各地，确实象梅花一样，有土地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和梅花的品质。因此流亡德国的我以“驱除马列，弘扬中华”为写作宗旨。我乐于将我在自由世界上下求索的心得体会，奉献给读者，供大家了解被共产党掩盖的真相和受共产党操纵的人物。欢迎大家阅读我的网上文集，
谢 谢 读 者 批 评 指 正 。

<http://blog.boxun.com/hero/xupei/>

德国科隆，2010年夏草，2012年夏定

E 书在线简介

E书在线(<http://bookepub.com/>)是一个电子书在线分享和营销平台，**E书在线**保护图书作者和出版社的版权和正当收益，让出版社和作家直接面向数量庞大的全球网友销售电子书。

E书在线秉承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立旨成为全球网友和海内外出版社、海内外异议作家、禁书作家的互动平台。

E书在线平台让广大的中国大陆网友免除海外邮购或出国购买的麻烦、风险和高额成本就可以享受到被中共禁止的自由出版物。

欢迎海外禁书出版社、杂志社及海内外禁书作者联系我们洽询合作：bookepub.com@gmail.com